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10月號 總52期

No.52 NOV. 1987

專訪趙紫陽幕僚：趙紫陽必要時將採霹靂手段

內幕揭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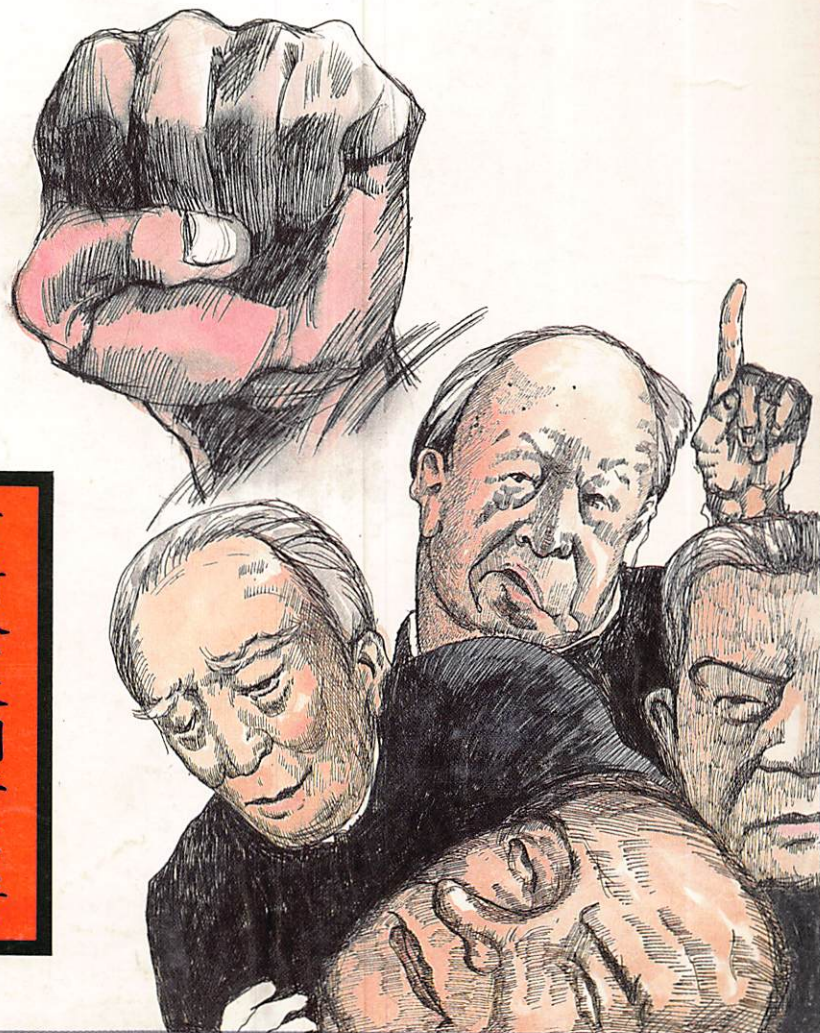
粉碎 彭 薄 胡 鄧 新四人幫

蘇紹智等被整

保守派砍掉趙紫陽理論助手

《論言論自由》

重新發表胡平名著



中國民主長跑

DEMOCRACY MARATHON FOR CHINA

金門大橋迎郭城

Golden Gate Reception For Kuo Chen



地點：美國舊金山金門大橋

時間：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二日

聯絡：P. O. Box 390730

Mountain View, CA 94039

電話：(408)259-5056 (415)969-2835

歡迎各界人士

熱烈響應！

「人治」鬧劇又一幕

以規章制度治理社會，領導人服從規章制度的約束，稱為「法治」。反之，以領導人的意志管理社會，規章制度因領導人的意志而隨時變更，則稱為「人治」。

過去，「人治」在中共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老百姓也嚐夠了「人治」的惡果。現在，中共要員雲集北戴河，又在上演一幕「人治」鬧劇。這幕戲的起因在於鄧小平要「退」——他聲言要退出政治局，但同時宣稱，他要保留中央軍委主席和中顧委主任兩職中的一職位。這樣一來，就與黨章產生了矛盾，因為黨章規定軍委主席和中顧委主任必須由政治局常委擔任。

自然，這點困難是難不倒善於變通的中共領導人的，大不了修改黨章就是了。為了迎合鄧小平「人治」，各種各樣的修改黨章、修改黨的領導體制的方案紛紛出籠，北戴河熱鬧非凡。其最絕的一招是乾脆取消政治局而以中央委員會常委代之，這樣一來，鄧小平的地位就不違背黨章了。

類似這種領導結構取決於領導人意志的「人治」鬧劇，在中共歷史上不乏其例。

中共「九大」之前，毛澤東為除掉劉少奇，設立了「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把政治局拋在一邊。

中共「十二大」之前，鄧小平為搞掉華國鋒，扶持胡耀邦，設立了中央秘書長一職。

今天，在中共「十三大」前，中共領導人又故技重演了。也許個別人會為取消政治局的高招而拍案叫絕，可是大多數人們會感到忐忑不安。黨規國法只不過是他們玩於股掌之上的魔方，可以變出千百種花樣，而且因人而易，變幻莫測。這樣治黨治國方式，怎麼叫人放心？難怪在中國，高層領導擔心鄧小平脾氣變，一般幹部擔心風向變，百姓擔心政策變，香港人擔心制度變。

北戴河大修黨章、改變共產黨領導結構之議，是中共沒有「制度化」的反映。沒有制度化，黨、國家和社會就不可能安定。

中共這新一幕的「人治」鬧劇，必將使人們對中共的領導進一步喪失信心。

文科留學生，你打算怎麼辦？

最近，國內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又起強風，中共改革派理論家和作家蘇紹智、王若水、吳祖光、張顯揚、孫長江、于浩成和戈揚等被整肅。其中特別引人注目的是蘇紹智和王若水，前者為趙紫陽的智囊人物，後者曾為胡耀邦的理論助手。

新的反資強風，吹醒了人們的頭腦。五月份在波士頓召開中國留美同學政治學會時，國內突然掀起了一陣反左的輿論，有些與會者便以為反資已過，可以高枕無憂了。蘇紹智等人的被整，把這些人從酣睡中驚醒。在海外學習文科的留學生們，不寒而慄地問道：「我們怎麼辦？」讀一讀王若水、蘇紹智的代表作，就會很容易發現，他們的思維模式，並未脫離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範疇；他們的改革主張，並未抵觸四項基本原則（四個堅持）；他們的理論架構，並沒有違背經典的馬克思主義。他們的論著，只不過是站在維護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對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篡改和曲解馬克思主義的地方做了委婉的糾正。

可怕之處在於：儘管蘇紹智和王若水等人尚未跳出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他們仍不能見容於中共。保守派打擊他們，改革派為保自己也拋棄他們。

蘇紹智和王若水的結局是一面鏡子，可以用來照照海外文科留學生、研究生和訪問學者的命運。在海外學習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人類學、心理學、教育學和法學等，大家學習、研究的，多半是非馬克思主義，甚至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讀讀我們每一篇習作、每一篇碩士和博士論文、每一篇學術著作，哪一篇不比蘇紹智、王若水走得遠？哪一篇沒有跳出馬克思主義的窠臼？滿腦子裝着非馬克思主義理論，帶着在西方取得的學術成果回到大陸，與胡喬木、鄧力群和鄧小平的思想怎能不發生抵觸？與極權專制的制度怎能不發生矛盾？一位文科研究生說得好：「除非回國後合上書本，閉上嘴巴，停止思想，否則，比蘇紹智、王若水更不幸的命運正在等待着我們。」

除了被現有的制度吞噬之外，還有另外一種選擇，那就是：改變現有的制度，使之能夠允許我們的思想和學說盡情地發揮。

文科留學生，你打算怎麼辦？

中國之春刊頭係中國民主運動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墨跡

中國之春 China Spring

P. O. Box 243, New York, N. Y. 10185.

Tel: (718) 507-6442
(718) 429-6777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辦·中國大陸留學生創辦的第一份民運刊物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創刊·一九八七年九月號總五十二期

一九八七年十月號總五十二期目錄 ■一九八七年九月一日出版■

"CHINA SPRING" (ISSN 0735-8237) is published monthly for \$24 per year by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 Second-class postage paid at Flushing, NY. POSTMASTER: Send address changes to CHINA SPRING.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

社論

3 ■文科留學生，你打算怎麼辦？·人治鬧劇又一幕

讀者·作者·編者

6 ■特權階級無本事走多元化道路等

本期專題 粉碎彭、薄、胡、鄧新四人幫

9 ■粉碎彭薄胡鄧新四人幫——趙紫陽幕僚隨訪記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 徐坤泉

14 ■「五·一三」事件——趙紫陽與新四人幫的一場鬭爭(國內) 詩南

18 ■溫州人的喜與憂 (國內) 馬立誠

20 ■彭真訪日的受賄枉法行徑 (日本) 賈保羽

21 ■胡喬木——一個無行文人的悲哀(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楊漫克

23 ■他從哪裏來的特權？ (中國大陸留學生·日本) 鄭振毅

25 ■「他媽的」王震 (美國) 微雲

27 ■彭真的不知政策與法律誰大嗎？(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 綠荷

特輯 保守派強攻 趙紫陽理論助手 蘇紹智等挨整

33 ■蘇紹智、王若水、吳祖光等遭整肅(中國大陸研究生) 黃韻

37 ■打破一些社會政治理論上的教條 蘇紹智

39 ■對社會主義再認識 蘇紹智、王逸舟

43 ■政治體制改革芻議 蘇紹智

46 ■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若干理論問題 蘇紹智

特輯 反資新靶——王若水、吳祖光、于浩成文選

49 ■智慧的痛苦 王若水

52 ■我們受到的迫害至今沒有停止 吳祖光

54 ■「第三梯隊」提法質疑 于浩成

民運報導

59 ■「北大，不怕」——北大學生天安門遊行紀實(北京) 龍秋堯

民運論壇

66 ■論言論自由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胡平

編者的話

正在大家認為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已經剝奪之際，國內突然傳來信息：蘇紹智、王若水和吳祖光等知識份子又被整肅。保守派的新進攻，使我們編輯部大忙起來——忙着打印、編排蘇紹智、王若水、吳祖光的文章，撤下原來的文稿。正好，蘇紹智的禁書「民主化與改革」的文稿，已轉到我刊編輯部，我們決定選擇刊登，以使人們了解這些被整的知識份子的理論和思想。

十三大召開之前，中共高層內鬪加劇。國內有關人員帶來信息：趙紫陽目前工作困難重重，需要海外的聲援。「支持改革」，是我們的既定方針，為此，我刊組織了一批稿件，對保守派毫不留情地進行了批判。與此同時，我們也對改革派的軟弱、無原則的妥協及犧牲知識份子的作法，進行了批判。因為，「批評改革」，也是民主運動的既定方針之一。

胡平的「論言論自由」，原文較長，本刊決定分期刊登。

因臨時編排介紹蘇紹智等人的專題，大批文稿被推遲發表，本刊特此致歉。

越來越多的讀者向本刊提供各種內部資料，本刊特此致謝。

下期預告

紀念美國憲法二百周年的專題，將移至下期。

下期還將刊出「整風反右卅周年」專題。國內著名「大右派」、原大公報總編輯徐鑄成老先生的血淚回憶錄，已轉至我刊，下期將重點刊出。徐老雖已年過八旬，但文思敏捷，文筆生動感人。他為歷史所做的見證，將給我們年輕一代很大啟發，並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多元

縱橫談

79 ■ 先從尊重隱私權開始

王炳章

● 人物專訪

80 ■ 馬克思主義應該丟棄——方勵之答西德「明鏡」周刊

鄒天諾

● 兩岸風雲

85 ■ 王若望的風骨·中國大陸將發行新彩票

· 台灣留美學生將有醫療保險· 大陸文壇有人批評郭沫若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娜欣等

● 大陸專欄

88 ■ 數學家張廣厚之死和大陸中年知識分子問題 (美洲) 柯奇

90 ■ 老美科學家給中共出難題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草民

● 台灣專欄

92 ■ 台灣需要民權，不要民拳 (台灣新移民·美國) 鄒國仁

94 ■ 台灣應在政治上對大陸實行反燒法 (美國華僑) 周立仁

96 ■ 春風化雨·薪火相傳

——國府教育改革開始邁出第一步 (台灣研究生·美國) 凌天鳳

● 留學生郭城舉行民主馬拉松長跑

98 ■ 「民主才是我的終點」——記郭城在奧市與洛城

(本刊記者) 雪映

● 留學生園地

17 ■ 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旅美分會成立 (加州) 李雲

● 思想論壇

32 ■ 暴力革命還是和平轉變?

程實

● 文藝園地

45 ■ 「毛主席語錄與意大利犯罪活動」(小品) 哈真實

78 ■ 長城的復活——給郭城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西圖



特權階級無本事走 多元化道路

王炳章先生認為中共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須給特權階級多元化的出路。本人認為這作為遠景的策略根本行不通。

中共虎將葉飛，官居海軍司令、交通部長等職，但對「革命」一詞作何解也鬧不清，居然在接見紅衛兵的講話中，留下了「革命不是繡花針」的笑柄（他搞錯了「革命不是繡花針」的毛澤東語錄）。這些都還是中央級的領導人水平尚如此，下層幹部那就更不用說了。

例子實在是不勝枚舉。這裏，我來隨便選一實例讓讀者增加見聞：

福建省某縣有個人人民檢察院院長，並兼法院法官（大陸的怪事就是這樣，檢察官可以兼法官）。有一次接一個少數民族婦女的離婚投訴案，該法官見是少數民族，以為可欺，竟然當着那個婦女的面前，拿出手槍來開這樣的口

：「你同我睡一夜我批准你離婚，不然我將妳打死！」此案後來通報全省、家喻戶曉，成為群眾茶餘飯後的談資。像這樣的流氓地痞當上高官的彼彼皆是，他們靠慣槍桿子渡日，你想給他們來個多元化的出路，對他們說：「你可以從政，做政治家，也可以從商，做企業家，還可做學者、佈道家、律師、說客、運動員、歌星、影星及各種各樣的專業人員。」他們有那種學問和本事嗎？

由于中共官僚特權階級的文化水平與道德修養的特殊性，不能同文化教養高的西方國家相提並論。所以我認為對中共特權階級給出多元化的設想，在這一代人之中是行不通的，這也是中共改革阻力為什麼特別大的原因所在。

（國內）包致雲

鄧小平對高幹特權無可奈何

我五年前曾回中國探親，耳聞目睹，祖國情形尚稱滿意。但也發現甚多特權壓迫案件未予平反。我以為是鄧小平精力有限，以後會逐步改善，但情況并非如此。我表兄趙中君原係國民黨軍校畢業，在上海曾任國軍上校，他為人熱心開朗，親友多受其惠。但趙對中共頗存幻想，國軍撤退時，衆多親友邀其赴台赴美，均為所拒。中共到達上海時，他起義立功。但後來仍被清算關押掃地出門。他現近七十，孤苦無依、貧病交加，在滬之房產財物悉被特權幹部侵佔瓜分，但並無法律裁決。他曾多次上書鄧及各階層領導，要求平反。據聞鄧曾下令處理。但次層之領導均用拖推方式置之不理。趙現在山西貧病交加。有同學章鶴榮在嘉定縣徐聯群紗廠工作，與趙友情甚篤。趙在台在美

親友十餘人非常憤恨，曾於近年託返國旅行友人經滬時往訪章鶴榮。章亦不敢發言。此系中國之「仁政」也。特予報導，望國人對中共勿存幻想。

（文中為使中共知趙通信處，特寫章鶴榮之工作地點。）

美國華僑金大文

留蘇派應「一分為二」

今年第六期「中國之春」上楊漫克先生的文章（「訪蘇受挫，李鵬前途透陰影」），對「留蘇派」提出了新的看法，我很贊同。目前中國政壇上，一些當年留學蘇聯的人相當活躍。這些人大多傾向於中國走蘇聯式計劃經濟的道路，甚至希望中蘇恢復六〇年以前那種「蜜月」關係，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應該引起人們的注意和警惕。然而，絕不是所有留蘇學生都持這種政治經濟觀點。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裡所描寫的陳世忠，就不屬於這一類「留蘇派」。楊漫克先生說：「留蘇派是因留蘇傾向於計劃經濟還是因深知其弊害而厭惡之，尚屬未定之天，不應以出身論定這個問題。」這確實是客觀持平之論。反過來看，當年留學西方國家的人，現在的政見也非清一色。例如「留美派」錢學森，其政見應歸於中國傳統的馬列主義者即毛澤東主義者之列。由此看來，「留蘇派」這一名稱，不可隨便濫用，最好以其它更為適當的名稱代替。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邢凱

二歲的幼兒作人質

我們夫妻都在美國攻讀學位，僅有一個二歲的孩子不被允許帶來，現留在國內無人照顧。我們思念自己幼小的孩子，晚上做夢也想到她；我們的孩子也渴望父愛與母愛，常常哭叫要媽媽。為此我們多次托人向公安局及有關部門申請孩子來此，但均遭拒絕。很明顯的，國內政府把我們的孩子當作人質。這使我們非常憤怒與傷心，我們有一顆報國之心及滿腔熱血，但國內領導却如此對待我們，扣留我們二歲幼兒作人質。這不是對我們明顯的不信任，對我們人權與家庭公然踐踏麼？我們非常擔憂留學生今後的回國前途，現在就如此對待我們，今後前途有何可言！心中憤怒，特寫此信抨擊這種不人道作法，希貴刊刊登。希望感同身受留學生們能團結起來，為爭取留學生及家屬的人權而奮鬥。

留學生 謝明德

王美美 於北美

蔣之個人設計？

我昨天收到中春第五十期，忙即閱讀，見到林樵清先生「踏著舖滿先烈骸骨的道路前進」一文，我基本同感。但文中提到吳稚暉老先生事，雖用「據說」一個不定詞，但以他的玩世不恭的為人，不會如此做法。這完全是蔣之個人設計。

吳本認為孫中山、陳炯明、汪精衛三人合作才能完美，缺一不可。他甚至認為孫也只是裝扮式的領袖，請林先生讀一讀、星島報出版

的「江山人物」，也述及吳老和其他要人的瑣事，我們後輩應一讀之。

又第五十期第七十九頁上欄（編者評論）有「馬寅初本人被迫害致死」之句，這也與事實不符。批馬是五〇年代初期，還未極左，且馬先生等學者還是受保護的，似乎文革結束才辭世，享年近百歲。

我愛中春，由第一期保存至今，願你們對歷史核實才發為文。

杖朝 於夏威夷

一派胡言

看完貴刊經理林樵清在中春五十期上所寫的「踏著舖滿先烈骸骨的道路前進」一文，內中提到有關我們總統蔣公的地方，真是胡說八道，令人氣憤。

衆所周知，總統蔣公與宋美齡女士是自由戀愛結婚，因為蔣公的原配毛福梅女士乃由父母之命而撮合的，並無愛情基礎，故蔣公選擇了他所愛的美齡女士，這有何不可？蔣公一生之中，也只有這二位夫人。何況，蔣公與美齡女士結婚後，恩愛逾常，至死不渝，造就了一段人生美好的佳話。同樣，蔣公之子經國先生，也是擇偶有方。自娶俄籍夫人蔣方良女士後，一生不二色。所生幾子，也都聰明有加，各人幡然有成。蔣氏一家，夫妻恩愛，父慈子孝，兄弟弟恭，實乃一典型的中國模範家庭。而今竟然被林樵清譏為「爭正統」，真是豈有此理。

總統蔣公讓經國先生繼位，也是一睿智的決定。經國先生追隨蔣公多年，一生隨侍左右，深得蔣公經世治國及領導之術，實乃繼位最佳人選，父位子繼又有何不可？而今林樵清又

譏其為「做皇帝」，真是幼稚得可以！在此奉勸林樵清先生，很多事情要深入去觀察，去分析，然後再做出結論。如果不然，如先生此文，只是一派胡言而已！

張造於加州

「人民日報」又在鬧笑話

「人民日報」海外版八七年六月廿七日在頭版右下角登了一條消息：中國駐美國大使館臨時代辦唐樹備約見美國代助理國務卿威廉·克拉克，對美眾議院最近通過兩項中國人權問題的修正案一事，表示強烈反對，要求美方立即採取有效措施，消除修正案所造成的嚴重後果，並防止今後類似事件發生。

第二段中說：「這兩項修正案同另外幾十項關於其他問題的修正案混在一起，於六月十八日同時付諸表決，結果在許多議員不甚瞭解修正案詳細內容的情況下獲得通過。」在此，且不說美國的議員難得像中國大陸的「人大」代表那樣糊塗，而讓我們來看一看，同條消息中的另一段報導：「值得指出的是……：在羅斯提出該修正案後，唐樹備臨時代辦又分別給一百一十八名眾議員和七十名參議員寫了信，逐條批駁了修正案的內容，呼籲他們對此採取公正和正義的立場。但美國政府和眾議院未採取措施制止這兩項修正案在眾議院的通過。」

區區小文，上下矛盾，結論是：議員們在付諸表決前了解修正案的內容，而且是唐樹備寫信逐條批駁幫助他們瞭解。唐樹備真是該打屁股。不僅如此，他還以為能夠像黨中央指示「人大」通過決議一樣，「教導」美國政府制止眾議院通過議案。真乃無知之極，實屬海外奇談。

中國大陸留學生 莽雨於美國

大陸「宗教自由」點滴

●我們不要神的領導

七九年到八二年之間，爲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大陸上逐步採取了一些恢復宗教自由的措施，例如開放數所關閉已久的教堂，釋放幾位因宗教活動獲罪的神職人員等等。

在沿海的閩浙地區，長期被殘酷手段壓制着的群眾性宗教熱情，却像火山般地爆發了出來。基督教、天主教的信徒數目與日俱增，使得缺乏準備的當局既感到驚慌失措，又不敢輕易造次地破壞宗教界的統戰工作。一些有恃無恐的宗教領袖想趁機掀翻黨對教會的控制，這就導致了後來的「反革命事件」。

相當多的信衆自稱「呼喊派」，否定黨對宗教的領導權，提出「共產黨是人不是神，我們不需要人的領導，我們要神的領導。」

八二年底，該地區大街小巷出現了官方「取締反革命組織呼喊派」的佈告，並宣佈該運動爲逃亡香港的李常受等人所指使。接着各級黨政機關抽調了大批幹部奔赴「鬧事」區域控制局勢。隨後還在各單位發動清查運動，搞得很兇，類似當年清查「五·一六」。這，就是當前大陸的「宗教自由」。

●和尚入黨

一九八二年前後，在某些單位內招錄「和尚」。條件是，必須剃頭、受戒、唸經。待遇是，可入團入黨，娶妻生子，放假回家，高工資。主要任務是接待國際友人。

(中國大陸留學生) 傳來德於北美

由學運看民主的道路

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七年的數月間，中國大陸有很大的變化，洶湧的民主潮流像秋風橫掃落葉，在整個中國大學生中漫延，使中共的專制制度和保守派受到猛烈的衝擊。改革派也是手足無措。

保守派和改革派在他們的政權未動搖之前，爲自己的既得利益，是不會真的搞民主的。中國的民主只能靠中國人自己來爭取，中國現在有兩條路，一條是執政者自己實行民主改革，第二條可能有一個「孫中山」的革命者出現。而且要有一個像華盛頓的人物，領導美國的革命，那樣，民主的政權才會愈來愈進步並與世長存。

偉大的學生運動是民主運動的先聲，令人憶起五四運動愛國學生的豐功偉績。在此我要呼籲海外留學生、國內學生及民主人士要大大提高警覺，要和開歷史倒車的人鬥爭到底。民主政治是人人渴望的。孫中山先生曾說過「順民者昌，逆民者亡」。我們要把孫中山先生未竟的事業，繼續完成。

唐人 于荷蘭

用「我」字代表個人立場

於貴刊總四十七期，第二十二頁最後數行「……上述二個演講會的發言人只代表其個人的立場和觀點。」次頁(二十二頁)王先生講詞開頭第三段「我們認爲，至少……」其實，很多刊物，很多文章都有類似現象，文章作者爲某一人，單個的人，而文內則多有「我們……」。

當然，也有寫「我認爲……」的，我每看

到這裏，就很有意識地多注意該作者，並對該作者尊敬一些。我一向尊敬、佩服王博士，如果他個人的文章不用「我們」，則更能使人敬佩。

俞輝生于溫哥華

回國做火種

八六年年底到八七年初，中春雜誌連續報導了國內大學生要民主、爭自由、保人權的示威遊行，使我們看到了中國的未來和希望。隨之而來的中共黨內高層鬥爭的尖銳化及保守勢力的猖狂反撲，又一次地對中華民族的精英——要求改革的知識份子舉起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屠刀，從而充分暴露了中共黨內的守舊勢力是一羣萬惡不赦的，給中華民族帶來災難的劊子手。那些自稱爲最先進的階級的先鋒隊的代表們，實質上不過是一羣死抱着封建主義的腐朽思想，掛着「馬列主義」「羊頭」賣「社會封建主義」的「狗肉」的竊國大盜，終究會被中國人民押上歷史的審判台。

儘管我們曾經看到了中國走向民主、自由、富強的曙光，但是血的事實又告訴我們，路途還很遙遠，而且將是一條充滿荆棘和艱險的路。每當想到有幾千年文明的中華民族就因爲這個沉重的包袱，使得人民在近百年來屢遭塗炭。如果我們不進行堅持不懈的奮鬥，我們的子孫後代就會永遠處於貧窮落後的狀態。

每次看完中春雜誌，我們除了在一起議論外，更多的時候是深深地思考，怎樣才能無愧於前人和後人？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投身於民主運動的行列，爲中華民族的覺醒和崛起發出我們每一個人的有限光和熱。我們決心在完不成學業之後，回到國內去做火種，讓民主運動的熊熊烈火燃遍祖國大地。

吳祥功及一羣關心中國命運的青年於北美

必要時趙紫陽將採霹靂手段

粉粹彭薄鄧胡新四人幫

——趙紫陽幕僚隨訪記

關於趙的經濟思想

△問：您能否談談您印象中的趙紫陽的經濟觀點和經濟思想？

▲甲：應該說，在我見過的各位高級領導人中，趙紫陽是接受市場經濟理論最徹底的一個，是對中國現存經濟體制的非理性了解最深的一個。

△問：是否能說得具體些，趙紫陽接受了現代經濟學中哪些市場經濟理論？

▲甲：比如，商品市場的理論，勞動力市場的理論，資金市場的理論，紫陽同志基本上都接收了，甚至可以說，都消化了。

△問：對所有制問題、特別是私有制問題呢？對私有產權的問題呢？

▲甲：所有制問題在我國、或者說在社會主義國家，都是極為敏感的問題。就連我們在公開場合——特別是有保守派領導和保守派理論家在場的場合——說到私有制都是非常小心的。我們儘量不用私有制這個詞，而是用個體戶、專業戶、個體企業、獨資企業、合資企業、集體企業這些用語。一談到「制」，就系統化、制度化、普遍化了。不點出私有制，給他們（指保守派——編者）的印象就是：私有企業目前只是個別現象，只是起輔助作用的。當然，在私下，在半公開場合，在志同道合



趙紫陽在蓄精養銳
準備與保守派大鬪？

者之間，我們都是公開談論私有制的。我們心裏清楚，私有產權制度的確立，是自由市場經濟之基礎，也應該是中國經濟改革的指導思想。可在中國，你不能公開這麼宣傳。這也算是改革的一大特點吧。我歷來認為，叫什麼名字、稱什麼制度沒太大的關係，關鍵是內容。

△問：我是在問趙紫陽的觀點，你的意見能代表他嗎？他對私有產權的理論接受嗎？

新四人幫否定溫州模式

▲甲：一般來說，我們的觀點，紫陽同志多半是接受的，對私有產權理論的基本觀念，亦是如此。不知你到溫州去過沒有？那裡的個體企業非常有活力，是全國個體企業蓬勃發展的典型，而蘇南是集體企業發展的典型。對這兩個典型，紫陽同志非常重視。對溫州模式的肯定，就是對個體企業優越性的肯定，對私有產權制度的肯定。但在對外宣傳上，沒必要提私有產權這些敏感的字眼，只說溫州模式就行了。

△問：據說，彭真、薄一波、胡喬木、鄧力群這伙人非常痛恨溫州模式，說那是資本主義復辟，並以此做為反對「經濟領域內資產階

中春編輯部：

在國內就久仰貴刊大名，但僅在友人處讀過一期。出國後讀了多期，感觸頗多。

我在出國前的幾個月內，曾憑個人的一些關係，與趙紫陽幕僚班子的幾個人見面談過話。在談話中，我有意識地記錄下一些有價值的內容。出國後，我重新做了整理，刪掉了大量過於敏感的具體內容，並把問答題目進行了歸納，以幕僚甲、乙、丙來代表與我接觸過的全部幕僚。現我把它交給貴刊，目的是使貴刊編輯部和貴刊讀者對趙紫陽和他的幕僚班子們有進一步的了解，對國內政局發展有進一步的思索。請酌處。

凡記錄不確或有曲解被訪者之處，由本人負責。

大陸學者 徐坤泉

一九八七年七月

級自由化」的根據，以便打開缺口，全面擊潰改革派。趙紫陽是如何應付這一挑戰的？

▲甲：你聽說了嗎？現在北京機關大院中，有「新四人幫」的說法，「新四人幫」指的就是彭真、薄一波、胡喬木、鄧力群。自今年元月份反自由化運動以來，這四位異常活躍，他們是想把溫州模式貼上資本主義的標籤，向改革的班子進攻。對於這樣大的問題，紫陽是不會糊塗的，他採取了斷然措施，穩住了溫州，堅決制止了「批判經濟領域內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歪風。

凡是好的都是社會主義

△問：那溫州模式到底是姓「資」，還是姓「社」？

▲甲：我們當然認為它姓「社」。事實是，溫州的經濟搞上去了，市場活了，人民的生計水平提高了。這樣大的事，為什麼有的人要給它扣上「資本主義」的帽子呢？難道好事都姓「資」嗎？這不是明目張膽地給「資本主義」塗脂抹粉嗎？那些口口聲聲反對「資本主義」的人，却處處把好东西往「資本主義」那邊推，他們才是給「資本主義」張目的人。

我們的邏輯是，凡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凡是好的，就是社會主義，就姓「社」；另一方面，凡是社會主義的，凡是姓「社」的，就應該是好的。在這一邏輯下，溫州模式就是姓「社」，就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模式之一。

我們一定要堅持這個邏輯，宣傳這個邏輯。否則，情況就變成：凡是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就給貼上資本主義的標籤，就姓「資」；凡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才姓「社」。以此邏輯

，不就等於自我承認「社會主義永遠趕不上資本主義」了嗎？那麼，四個堅持中的「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不就變成了「堅持落後道路」了嗎？

因此，我們和紫陽同志的看法是一致的：一定要保住溫州模式，而且堅稱溫州模式是姓「社」的，是社會主義優越性的體現。如果溫州模式這個缺口被打開，改革成果便將毀於一旦。

不必掉進概念坑裏

△問：你的這種邏輯雖然可以自圓其說，但有些強詞奪理的味道。一般公認，自由市場理論，私有產權理論，是當今資本主義經濟的



溫州個體企業繁榮，這是溫州一角。

理論支柱，更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你怎麼能把它們硬貼上社會主義標籤呢？這不是有點不講理嗎？

▲甲：不能這麼說。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是「平等」，社會主義原則中並未否定自由商品經濟。北歐的一些國家，如瑞典、挪威，實行的是自由商品經濟，是尊重私有產權的。然而，其相對平等的原則（注意，我沒說絕對平等），亦獲得實現。世界上很多人把瑞典和挪威等國家稱為北歐式社會主義。實際上，如果認真研究一下，就會發現，當今執資本主義世界牛耳的美國，其社會性質已和一百年前馬克思所描述的早期資本主義的社會性質有很大不同。像IBM那樣大的公司，股票持有人上千上萬，本公司普通雇員也持有股票，你說是資本家所有，還是集體所有？所以，如果我們完全照經典馬克思主義來解決今天的問題，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今天中國的現狀，叫「社會主義」，還是「國家資本主義」，誰都說不清楚。爭論概念，我們可以爭論幾年、幾十年，但這種爭論與事無補。我們搞改革、開放，首先一條就是不要掉到「概念」坑裡，困住自己的手脚。改革，就是要和過去不一樣，否則，還叫什麼改呢？任何改革方案，只要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都要鼓勵。

當然，社會主義的平等原則，我們是不能摒棄的。我們要防止嚴重的兩極分化，做到這一點要靠兩個辦法來保證：一是對特別的戶要加重稅收，二是要對弱者實施福利政策。這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至於絕對平均主義——大鍋飯制度，不是社會主義。

△問：這些觀念，趙紫陽接受嗎？

▲甲：上述觀念，完全是常識。在紫陽同志的決策班子中，認識是共同的。

下一步改革措施

△問：下一步趙紫陽總理的戰略部署是什麼？

△乙：首先要鞏固現有的改革成績。這一點很重要。現有的鞏固不住，就不能再出發。

△問：這就是說，連鞏固現有的改革成績都有困難了？

加強改革的宣傳工作

△乙：問題不見得有那麼嚴重，但高層對前段改革存在不同看法是確實的。有些人把成績看得不夠，而毛病看得却很多；有的人更專門挑毛病。其實，改革的成績是顯而易見的，伴隨出現了一些問題，也是難免的，但這是支節。問題是，我們的宣傳沒有跟上，改革、開放的成績宣傳的不夠。這一點沒有做好，就出現了「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的現象。只有大張旗鼓地宣傳改革的好處和成績，我們才能理直氣壯地搞改革。應該說，我們的宣傳部門在這個問題上沒有很好地配合經濟改革工作。過去，朱厚澤同志主持宣傳工作時，情況好一些，但也不夠。現在，宣傳部門的配合還不如從前。關於這個問題，趙紫陽同志找過小平同志專門談過，取得了一致意見。就是：宣傳部要成為改革的宣傳部，不是別的什麼宣傳部。

比如，農村生產責任制的成績，鄉鎮個體和集體企業的成績，星火計劃的成績，城市小企業承包制的成績，等等，報紙上宣傳得都不夠。這方面的工作，紫陽同志已做了指示，小平同志已決定胡啓立同志主管宣傳工作，中央

宣傳小組包括鮑彤、陳俊生、高揚和王忍之。以後你會看到，報上關於這方面的工作會加強。我們還有一個替代方案，就是：如果中宣部的宣傳工作跟不上，紫陽同志的班子——如體改所，將自行加強宣傳。

△問：我已明白你的意思，那就是先鞏固成績，站穩腳跟，再進一步出擊。那趙紫陽有沒有具體的宣傳工作計劃呢？

△乙：具體的計劃由胡啓立他們擬訂。有一點是我們一貫的建議：用數字說服人，教育人。體改所近二年搞了不少調查報告——八五年的那十四個調查報告你大概早就看到了，這些調查報告，特別是那些數據很能說明問題嘛！有些報告可以公開發表，大張旗鼓地宣傳，沒什麼可保密的。像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幹部和群眾支持物價改革，這類數字就是民意，就是選票，我們要好好利用。十三大不是要搞政治體制改革嗎？可先搞個調查，讓群眾講話，看看哪些是群眾最要求改的。一公布出來，就是民意基礎。搞這種調查，可以反映民意。這種民意反映的方法，比大學生上街喊口號強。我是反對大學生上街的，一上街，群眾情緒激發起來，非常難控制。去冬的學生遊行示威，一下子把改革部署打亂了，讓那些老傢伙們抓住了把柄，幫了倒忙。

城市企業的包、租、賣

△問：在宣傳現有改革成績的基礎上，下一個經濟改革的步子打算怎麼邁？

△乙：目前，城市經濟改革的重點就是一個「包」字，通俗一點兒說，叫做老「包」進城。農村一個「包」字——包產到戶解決了問題，這個經驗要推廣到城市。城市的承包制，

先從小企業、特別是服務業開始，如理髮店、副食店、小吃店、小旅館和照像館等。東北關廣梅的經驗就是小企業承包成功的經驗。租售小企業，租者以個人家產和存款為抵押，與國家簽下合同，經營權則完全游離出來。這樣，企業不再是政府的附屬物，而具有獨立法人的地位。承包後，小企業自負盈虧，承包者多得分，也承擔風險。

上述「包」字的核心，是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所有權仍是國家的，而經營權歸了承包的個人或集體。

經過試點，這種承包很奏效，目前正在往大中企業推廣。承包大中企業，需要抵押的個人或集體財產數額較大，目前能拿出這麼大數目的人不多。然而，小企業承包已使一部分先富了起來，承包者也有了小企業的經營經驗。這批富人就可以接着承包中型企業，個人財富進一步積累，最後有能力承包大企業。

在租售和承包見效的基礎上，國家準備把一大部分的小企業賣出去，成為真正的私有企業。這樣，一方面國家從拍賣中回收資金，另一方面小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合二而一，可進一步調動經營者的積極性。

我們還有一個考慮：企業的轉賣要開放。中小企業承包之後，肯定要出現一些盈利的富有企業。這些盈利的企業可以收購虧損的企業，使後者轉虧為盈。這叫固定資產市場開放。

總之，企業自主、經營承包和企業自由買賣，是城市經濟改革的三部曲。當前是在第二波——經營承包的浪頭上，但第三波——企業買賣即將開始。主線為：包、租、賣三字。

△問：那股份化的改革方案呢？

△乙：關於股份化，改革班子中存在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大中企業的根本出路在於股票化，並建議立即上馬搞。我是唱反調的

。我這一派觀點認為當前主要是推廣承包，承包見效快。現在反對城市經改的勢力不小，要消除反對勢力的疑慮和阻力，只有讓事實說話，要儘快收到實效。

關於股票化，我們比較同意用股票集資建新廠，而不是急於把現有大中企業的固定資產分股賣出去。當然，股票化有它的優點，但要一步一步走，現在不宜全面鋪開，但可以搞試點，積累經驗。

△問：趙紫陽決策層的意見呢？

△乙：紫陽同志和決策層當前傾向於支持我們的方案。

關於權力鬥爭

△問：趙紫陽在倒胡之中到底扮演了什麼角色？

△丙：應該說，在胡處境困難時，紫陽同志對胡耀邦既沒有出面力保，也沒有落井下石，他是順其發展，做得比較得體。

△問：我們下面的看法是，打掉胡耀邦是打掉改革派的一翼，使得趙紫陽務實派失掉保護層，行動更爲困難，你是怎麼看的？

△丙：問題不一定像你說的這樣。胡耀邦



胡耀邦不懂中國政治？

對中國實際問題的了解以及對改革的認識並深，因此，胡耀邦同志的工作與紫陽同志的工作配合得並不好，有時甚至干擾改革。胡耀邦去職而由紫陽同志統領黨政，幹起來可能更順手些。

△問：一般印象，趙紫陽同志雖然有一個幕僚班子，但缺乏一個幹部班底。胡耀邦不然，他在黨內和各省市，有一大批實力幹部——人們通常說的團派。以團派實力之強，胡都沒有逃過挨整的命運，趙紫陽的前途樂觀嗎？趙的實力能與胡的實力相比嗎？

趙不拉幫結伙

△丙：你有些過慮了，我們有另一種分析。在中國的政治圈子裡，明顯地拉幫結伙是最危險的，是遭人忌的。在這一點上，胡耀邦做得並不高明。相比之下，紫陽同志就頭腦清楚得多。當大政治家、做第一把手，就要有超脫的氣質——超脫於各幫、各派之上，並能統馭各幫、各派。小平同志有這種才能，紫陽同志也有這種氣質。

你說得對，紫陽同志從不拉幫結伙，他與各方都保持着相當好的關係。長期相處，各方都會把他看成是自己這一派的領袖。

你應該看到，胡耀邦辭職後，團派群龍無首，他們自然而然地倒向趙紫陽。紫陽同志做得不聲不響，但是很高明，施了一下小計就把胡耀邦的人網羅起來了。比如，朱厚澤、阮崇武被撤職後，紫陽同志都把他們安排進了國務院。他們的職務雖不如從前重要，但把人保護起來，很有凝聚作用和吸引胡耀邦班子的作用。

△問：趙紫陽與胡耀邦的最大差別是什麼？

△丙：趙紫陽懂中國政治，胡耀邦不懂中國政治。由於懂中國政治，趙紫陽極爲重視與各方面的關係，尤其重視與那些對改革有看法的保守派人士之間的關係，他藏鋒匿露，不明顯樹敵。胡耀邦不一樣，他把中國政治看得太簡單了。

△問：在個性上有何差別？

△丙：趙紫陽「穩」，胡耀邦「毛」。

注意與保守派拉關係

△問：你剛才說，趙紫陽十分注意人際關係，而且特別注意與保守派人士的關係。這倒是很有意思的問題，他與薄一波的關係如何？

△丙：紫陽同志跟我們說過，要爭取化阻力爲助力。這是很高明的策略。越是保守的人，趙紫陽就越是爭取他們對改革的支持。如中小型企業的承包制，趙紫陽就請教過彭真、薄一波的意見。那些老傢伙們需要人尊重，他們最怕的就是被遺忘、被忽視。你抓住了這個心理，改革的事多向他們請教，徵求他們的意見，事情就好辦得多。其實，彭真、薄一波他們沒什麼高見，拿不出什麼具體的方案。你提出方案，向他們匯報一下，他們覺得你仍然是個下級，仍然很尊重他，他就同意你的方案了。我們舉辦活動，如交流會、座談會之類，都找薄一波，爭取讓他出席、講話。他一講話，起碼說些「改革、開放」之辭。我們出版什麼材料，也都爭取先讓薄一波過目，他不提明顯的反對意見，我們就發至全國。這樣做，最大的好處是安撫他們。堵住他們的嘴。因爲改革方案、宣傳材料你事先得看過，都點了頭，那事後就不便公開提出異議了。

胡耀邦在這一點上做得很不夠，他對那些

老傢伙們不夠尊重，觸犯了他們，給自己找上了麻煩。

△問：趙紫陽與楊尚昆關係怎麼樣？楊尚昆好像越來越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丙：紫陽同志十分重視與楊尚昆的關係，重大問題都與楊尚昆商量，取得他的支持與諒解。你說的不錯，楊尚昆的作用非常重要，可以這麼說，沒有楊，胡耀邦這次就倒不了。

△問：北京不少人在傳，趙紫陽與保守派的對立越來越嚴重。前幾天，北京出現了一「打倒彭（彭真）、薄（薄一波）、胡（胡喬木）、鄧（鄧力群）新四人幫」標語。我聽一個接近彭真的人說，彭真和胡喬木等人，懷疑這條標語是趙紫陽手下的人幹的，因此對趙紫陽十分痛恨。你怎麼認識這個問題？

和胡喬木鄧力群矛盾公開

△丙：其實，不同觀點的對立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但我不認為紫陽同志和彭真、薄一波的矛盾已經公開化。紫陽同志和胡喬木、鄧力群、熊復的矛盾已經公開，或者半公開了。但是，這個責任不在我們這邊。本來，紫陽同志告訴我們，遇事要沉着，要有自我節制。我們並沒有去涉足胡、鄧的地盤。沒想到，樹欲靜而風不止，那些人就是要侵佔我們的地盤，提出「資產階級自由化最深刻的根源在經濟領域」、「商品經濟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根源」、「說資本主義的挨批、幹資本主義的不批」等論調。這一下，經濟領域內立即出現動盪，改革有被完全扼殺的危險。紫陽同志不得不利用這股風，否則，幾年的改革成果可能會毀於一旦。

△問：胡喬木、鄧力群、熊復這些人如此猖狂，是因為他們有後台，彭真、薄一波就是

他們的後台。此外，他們也有軍中左派高級將領的支持。我的朋友們都說，把彭、薄、胡、鄧稱為新四人幫並不過份，他們是不會甘心的。不知趙紫陽和你們這些人有沒有警惕？

△丙：我說過，紫陽同志很重視同楊尚昆的關係。他也很注意與軍中其他高級將領間的關係。

趙目前處境困難

△問：目前趙紫陽的處境怎樣？

△丙：坦白地說，當前紫陽同志的處境比較困難。這並非說趙紫陽的地位受到什麼威脅，而是工作起來很不順手。我們提出的很多可行方案，紫陽同志拿到高層，都被拖住了。至於十三大的人事安排，更是討論來，討論去，一天一個改變，很難定下來。還有黨的組織結構，黨與政的關係……，原則上的問題大家都同意，一落實到具體方案來，就達不成協議。當然，紫陽這邊遭到困難，那邊也同樣受到困難。他們提出的有關十三大的方案，同樣通過不了。這樣，很多小問題消磨了不少寶貴的光陰。凡定不了的問題，都要小平同志拍板。可是，很多問題小平同志也不能一下子拍板。於是就拖，讓時間解決問題。軍隊中的軍銜制，是最明顯的例子。

必要時採取霹靂手段

△問：老是拖，把我們整個民族都拖垮了。你強調，趙紫陽的地位未受到威脅。現在你可以誇這個口。但是，老鄧百年之後，就很難說，中國的政治又複雜、又殘酷，搞得不好，老鄧生前趙紫陽就有可能遇到麻煩。胡耀邦就是最好的前車之鑒。原來人們以為他在鄧死後

會倒台，沒想到鄧還沒死他就被整垮了。

我今天來，不瞞你說，是因為我聽到一個可怕的話——這個說法是從我的一個同學那裡聽來的，這個同學現在在軍隊中做參謀。他說，一幫高幹子弟背景的中青年軍官私下常議論趙紫陽和你們這些幕僚。他們說什麼：「讓老趙他們折騰吧，早晚會捅漏子，到時候一個連就解決問題，着什麼急，天下早晚是我們的！」這些人野心極大極大。聽說他們和薄一波、王震、陳雲等人都有線。這，你們總不得不防吧？

△丙：我們這些人也不是吃乾飯的。特別是，紫陽同志的政治手腕非常幹練。我可以告訴你，紫陽同志曾暗示：大家君子相處，都過得去，井水不犯河水，也就算了。但如果實在不給面子，或用胡來的辦法，我老趙不會束手待斃，必要時也會使用霹靂手段。

△問：你們頭腦中有這根弦就好。兩軍對陣而僵持不下時，往往是先下手為強，這是我提醒你們的。

△丙：可紫陽同志往往採用後發制人之策……
後記：閒談到此，雙方都沉默了很長時間，大概都不願意設想那殘酷的鬥爭場面吧！後來，我們的話題就轉了。

專制的政治，充滿了詭詐與陰謀，其結局往往是血跡斑斑的。「霹靂手段」，我反覆思考着這幾個字，不知為什麼這麼耳熟。我忽然想起，戊戌政變時，譚嗣同等會想用「霹靂手段」震服老保，但沒料到，老保們却使用了「霹靂手段」，殺害了戊戌六君子，斷送了變法維新。

歷史，你真的會不斷重演嗎？

（一九八七年七月）

「五·一三」事件

——趙紫陽與新四人幫的一場鬥爭

(國內) 詩南

七月十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在頭版頭條位置，顯著刊登了中共代總書記趙紫陽於今年五月十三日在中共宣傳、理論、新聞、黨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全文。讀者不禁要問，堂堂中共代總書記的講話，為什麼時隔二個月之後才得以公開發表？據接近北京高層人士透露，圍繞這篇講話的公開發表，以趙紫陽為首的中共改革派與彭真、薄一波、胡喬木、鄧力群「新四人幫」為首的保守派之間展開了一場尖銳的鬥爭，引發了一場引人深思的風波。

一次預謀的「反資」動員會

彭、薄、胡、鄧「新四人幫」年初借助鄧小平的支持，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為名整垮了胡耀邦，後又集中火力打擊趙紫陽，妄圖徹底摧毀改革派營壘。胡耀邦被迫辭職後，彭真、鄧力群一伙多次公開叫嚷：「要反政治上的自由化就必須反經濟上的自由化」，「不能只反說自由化的，不反幹自由化的」。五月十三日召開的這個會議，原本是由胡喬木、鄧力群一手策劃的，目的是要利用這個會議進一步部署「反資」，掀起「反資」新高潮。召開這樣重大的會議，胡喬木、鄧力群竟根本不向代總書記趙紫陽匯報，擅自指令中宣部長王忍

之等人匆匆籌備。會議正式召開前，首先開了二天的預備會議。在預備會議上，胡喬木、鄧力群先後講了話；北京市委副書記徐惟誠重點介紹了北京「反資」以來的經驗以及今後的部署。出席預備會議的共有三十五人，這個會實際上是定調會、吹風會。預備會議召開之後，他們才不得不向趙紫陽做了匯報，也就是說，在正式會議召開前二天，趙紫陽才知道這個消息。而且，大會也未邀請趙紫陽到會講話，反而安排彭真、薄一波做「重要講話」。趙紫陽曾當面質問鄧力群：「開這樣的會，我怎麼不知道？」

趙紫陽毛遂自薦要講話

當天晚上，趙紫陽把預備會議的紀要以及胡喬木、鄧力群、徐惟誠的講話稿調去看。第二天一上班，趙紫陽就指示秘書通知胡喬木、鄧力群：他要在會議上講話。正是因為正式得到了趙紫陽要講話的通知，所以原定五月十一日召開的會議推遲到五月十二日下午才召開。五月十三日上午九點四十分，趙紫陽正式來到會場。五月十二日趙紫陽曾向鄧小平匯報工作，談到了五月十三日的這個會議。鄧小平贊同趙紫陽到會議上講話，並指示趙紫陽：「不要

把會議的調子定的太高，不要讓大家誤解，好像我們開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其他工作可以一風吹。」

趙紫陽在會議上發表的這篇「即席講話」，從根本上扭轉了會議的極「左」方向，初步挫敗了胡喬木、鄧力群的預謀。趙紫陽的講話受到絕大多數與會者的歡迎。因為趙紫陽講了話，彭真、薄一波才沒有講話。在分組討論會上，四川省委、貴州省委、吉林省委和廣東省委的宣傳部長們紛紛發言，表示支持趙紫陽的講話。據參加會議的人介紹，趙紫陽在會議上談笑風生，而且以自嘲的口吻說：「今天我是毛遂自薦要來講話的。」

短兵相接，怒斥「左大王」

據可靠消息來源，五月十三日，上午趙紫陽講話之後，下午又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趙紫陽再次明確指出：「改革、開放的方針不能逆轉，這是我們的國策。」針對徐惟誠提出的「北京市的工作要比中央快半拍」的怪論，趙紫陽批駁說，快半拍、慢半拍都不行，要和中央保持一個步伐。堅持改革開放，堅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同時反對僵化，這是我們黨當前中心的、首要的任務。

趙紫陽還在會議上對胡喬木、鄧力群說：「要組織力量、組織隊伍研究新任務下的新理論，決不能再搞那種大批判式的鬥爭了。」「左大王」胡喬木當眾反駁說：「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還是要堅持嘛！」趙紫陽反駁說：「基本理論是要堅持，當前要解決的是實際問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結論十一屆三中全會就肯定了，難道現在非要讓全國上下一起學習『反杜林論』才叫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嗎？」萬里、習仲勛、余秋里也相繼講了話，表示贊同趙紫陽的意見。



保守派頭目薄一波、胡喬木、鄧力群

鄧力群分組會上吹陰風

五月十四日、十五日趙紫陽還參加了宣傳、理論、新聞、黨校幹部會議的分組討論，向大家進一步解釋中央政策，聽取下層意見。當時不少代表向大會反映，希望能儘快公開發表趙紫陽這篇講話。而胡喬木、鄧力群對趙紫陽的講話却極爲不滿。五月十六日，鄧力群在河南省、陝西省的分組會上說：「趙紫陽的講話是即席講話，不能公開發表，什麼時候發表，要由書記處、政治局討論決定。」在發言中，當陝西省委宣傳部一位副部長談到「今天又是五月十六日，一九六六年的今天發表了『五·一六』通知」的時候，鄧力群馬上插話說：「是啊，今天又是五月十六日了，雖然實踐證明五·一六通知是一個錯誤的通知，但是這個通知是經過當時中央委員會集體討論通過的……」代表們對鄧力群的這番陰陽怪氣的議論頗感困惑。

在會議過程中，鄧力群多次指示要蒐集對趙紫陽講話的反應，蒐集帶有傾向性的言論。趙紫陽的講話，很快由專人根據錄音整理出來了。由於胡喬木、鄧力群是黨內負責意識形態的官員，趙的講話整理出來之後，在送趙紫陽審定的同時，也分送到這兩位左王手上，以及書記處、政治局成員的手上。

代總書記下令 扣發「反資」怪文

據中共高層人士透露，五月十三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日上午趙紫陽所作的即席講話，實際上是趙紫陽向「新四人幫」攤牌，這一天是改革派開始掌握主動的歷史性關鍵的一天

。隨後香港「文匯報」首先發表了「謹防左毒誤國」的重要社論。鄧力群得知後氣勢洶洶地打電話質問中宣部：「『文匯報』的社論審過沒有？」中宣部回答說：「沒有審過。」隨後鄧力群又親自打電話追問「文匯報」，「文匯報」回答說：「中央審過。」鄧力群沒有再追問下去。在此期間，他一面頻繁活動，多次登門拜訪胡喬木、薄一波、王震；另一方面，針對「文匯報」的社論，他親手撰寫了一篇題爲「論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歷史必要性」的社論，原定五月二十八日由「人民日報」發表。趙紫陽得知這個消息後，立即從「人民日報」調來清樣，過目後，下令不准發表。鄧力群十分惱火，又給徐惟誠打電話，讓「北京日報」發表，徐惟誠口頭答應，最後也未敢讓「北京日報」發表。

鄧小平出面干預， 講話得見天日

爲了抵制趙紫陽的講話，胡喬木、鄧力群硬是扣住趙紫陽「五·一三」的講話不發。在此期間，不少省、市、自治區宣傳部和新聞單位多次來電來函，詢問中宣部，趙紫陽的講話何時公開發表？鄧力群指示王忍之：「要穩住，這是一種不正常的積極性。」直到「七·一」前夕，萬里、胡啓立多次要求書記處、政治局討論趙紫陽的講話，薄一波、胡喬木、鄧力群才不得不把他們的意見拿出來。薄一波簽署的意見是：「該篇講話是否可緩發」，胡喬木的意見是：「紫陽同志的講話，我意可緩發或分二次發。」鄧力群只在趙的講話上畫了個「○」，而在私下說什麼：「我就心這篇講話會衝淡『反資』。」七月四日鄧小平在這篇講話上批示：「紫陽同志的這篇講話很好。我完全

贊同這篇講話的立場。反資不能影響改革、開放，不能擴大到經濟領域，不然又要走回頭路。這個道理要給大家講清楚。」七月五日、七月六日政治局擴大會議根據鄧小平的批示，一致同意立即公開發表趙紫陽的這篇講話。七月十日，也就是距趙紫陽「五·一三」講話近二個月後，由於鄧小平的直接干預，趙紫陽的這篇講話才得以見天日，並配發了由趙紫陽智囊團起草的社論：「進一步提高認識」。

老人黨四出活動，竭力保自己

據中共高層人士分析，國內的政局儘管十分複雜，但首要人物鄧小平支持哪一方，哪一方就可能暫時居優勢。自四月中下旬以來，鄧小平明確改變姿態，突出支持趙紫陽，因此可以判斷，在中國政局中，特別是在「十三大」上，改革的路線會佔上風。據可靠消息來源透露，五月中旬，鄧小平首先單獨找彭真談話，鄧對彭說：「人大開完了，其他事情讓國務院、書記處去管吧。」與彭真談話之後，鄧小平又和薄一波、王震做了長時間談話，再次表示：「我是決定退出政治局常委了。」薄一波說：「代表們不同意，你怎麼退？」王震說：「小平同志要退，我舉雙手不贊成。」鄧小平說：「代表們不同意沒有什麼問題，反正我是決定退下來了。」鄧小平還問王震：「十三大我決定退出政治局常委，你準備怎麼樣？」最近彭真、薄一波、王震、鄧力群、胡喬木等十幾位老人，或聯名或單獨給鄧小平本人或政治局常委寫信，再次要求鄧小平不要退下來。信中讚揚鄧小平是中國新時期的「革命舵手」。信的複印件已經分送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和幾個主要部委的領導人手裡。北京的知

情人透露，這些老人黨希望鄧小平留在政治局裡，他們的真正意圖，是爲了保他們自己。

彭真情緒低落，竟和兒媳吵嘴

由於近來鄧小平多次宣佈將在「十三大」上退出政治局，彭真、胡喬木、鄧力群等人發覺大勢已去，個個情緒變得異常低落，前幾個月那副春風得意的笑臉都不見了。這幾個「左」王中，情緒最壞的要算彭真了。前些時候，他到深圳等地視察一番，大談改革、開放，妄圖挽回自己因「反資」而造成的形象損失。一回到北京，彭真就發現大勢已去，再唱改革的調子也無濟於事了，就乾脆輪倒不幹。從此彭真對一般活動多不參加，長期在家「養病」。然而，彭真的所作所爲在自己家裡也不得人心。據知情人說，彭真的兒子、兒媳曾多次當面數落彭真說：「快奔九十的人了，還嘮什麼呀？您知道老百姓怎麼說您？您出去前呼後擁的，我們可給您背不起這黑鍋。瞎蹦了半天能得



新四人幫之首——彭真

什麼好？」有一次彭真情緒不好，聽了兒媳婦一席話，頓時火冒三丈，「啪！」的一聲把桌子拍得蹦蹦響，憤憤地說：「在自己家裡也不讓我心靜。你們給我滾！」彭真的警衛聽到彭真發脾氣，以爲出了什麼事，趕快竄進屋。一看是老公公和兒媳婦拌嘴，剛要勸幾句，彭真臉一沉說：「這裡沒你的事。」警衛自知沒趣，趕緊退了出來。

鄧小平左右搖擺

保守派伺機反撲

儘管鄧小平本人目前對外形象是支持改革、支持趙紫陽，但他的內在心態是非常矛盾的。他既對「彭薄胡鄧」的「新四人幫」妄圖篡權的野心極爲不滿，又對以趙紫陽爲代表的改革派不放心。最近鄧小平也曾多次批評趙紫陽「耳根太軟」。趙紫陽出訪東歐五國前夕，曾與萬里一起向鄧小平彙報工作。當趙紫陽向鄧小平談到他本人對胡喬木、鄧力群等人的不滿意見時，鄧小平會說：「總不能不讓他們講話吧！他們現在一個是中央書記，一個是政治局委員嘛！」接着鄧小平還說：「我也贊成黨內有幾個唱反調的。西方有反對黨，我們沒有反對黨，留下一、二個唱反調的也不一定完全是壞事！」鄧小平的這番話傳到胡喬木、鄧力群耳朵裡後，他們立即又顯出神氣，爭着搶着要參加一些外事活動。胡喬木還與鄧力群相勾結，在彭真、王震等人的支持下，利用趙紫陽出訪東歐五國的機會，指令新華社播發文章，攻擊國務院及各部委官僚主義十足，借以向趙紫陽發難。新華社的批評在國務院及一些部委引起很大思想混亂。爲此，趙紫陽專門從國外打來電話，拍來電報，指示代總理萬里在國務院碰頭會上「議一議這件事」，並指示新華社

播發此類文章之前，要認真聽取部委領導的意見，不要「火上加油」。新華社接到趙紫陽的電報，立即召開編委會，研究補救措施。在編委會上意見分歧很大。胡喬木、鄧力群安插在新華社的一位親信堅持要向胡喬木、鄧力群請示，理由是他們係黨內主管宣傳的領導。最後編委會的集中意見是，趙紫陽同志是黨的代總書記，按趙紫陽、萬里同志的指示精神辦，同時編委會還決定迅速反映一些部委的改進情況，方針改為「以表揚鼓勁為主」。鄧力群得知新華社編委會的「集中意見」後，暴跳如雷，斥責新華社主要領導：「『十三大』還沒開！我還沒下台！你們的情緒不正常！」胡喬木也在電話中陰陽怪氣地說：「批評也是一種支持嘛！批評一下有什麼了不起？老虎屁股摸不得了？我們黨歷來是歡迎批評的！沒有批評就沒有進步！社會就要倒退，黨就要變質！這個道理恐怕十歲的娃娃也是明白的。你們都是有幾十年黨齡的老同志了。怎麼？是老眼昏花？還是怕丟官？」當新華社主要領導詢問何時播發趙紫陽「五·一三」的講話時，胡喬木說：「我向你們重申：趙紫陽的講話，在書記處、政治局沒有討論並做出正式結論之前，不能發。通知各省市，不要催問。這是個原則問題！」末了，胡喬木又問：「鄧力群同志修改過的社論『論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歷史必要性』，為什麼遲遲沒有見報？這篇社論我看過。」新華社的主要領導說：「鄧力群同志是專門為『人民日報』寫的社論，最後的清樣在趙紫陽同志處，我們沒有清樣。」胡喬木說：「好吧，那大家都等，等趙紫陽回來再議。一個是社論，一個是講話，你們都不要動。原則問題不能通融！」

老百姓自有公論

普通老百姓對彭、薄、胡、鄧「新四人幫」的倒行逆施，對他們一伙鼓噪的「反資」，極為不滿。市民嘲諷說：「當年張助是辯子黨復辟，今天是眉毛黨、鬍子黨復辟不過一百天，一雙很長的眉毛」。辯子黨復辟不過一百天，眉毛黨、鬍子黨翻天也好景不長。」最近以來，趙紫陽辦公室每天收到成千上萬封的群眾來信，群眾在信中紛紛支持趙紫陽，支持改革，紛紛要求胡耀邦在「十三大」上復出。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北京街頭發現多起「反對標語」，內容主要指責彭真等保守派。六月廿七日清晨，在崇文門、西單、東四同時發現「打倒彭、薄、胡、鄧『新四人幫』！」、「清算『新四人幫』禍國殃民的歷史罪行！」、「要民主、要自由、不要獨裁專政！」、「反資是一場政治大騙局，反資不得人心！」等標語。

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旅美分會成立

編輯先生：

最近讀到貴刊九月號，發現其中增添了不少中國學生會社活動的內容，很有意思。在美國學習，有利之處不必說了，有個重要的不足之處是國內同行之間的切磋砥礪機會少了，時間一久，對我們研究學術的同行間就會產生隔膜。

我想給貴刊提供一個消息：在美國和加拿大學習文學的中國學生，早在去年（一九八六年）年初就成立了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旅美分會，此會社雖然是與國內「掛鉤」的，但一切經

據接近公安部門的人士透露，事後北京市公安局接到一個電話，一個自稱「青年民主、自由、進步先鋒隊」的組織為六月廿七日的標語負責。這個電話使北京市公安局大為震驚，因為這些做案者於事後通知警方，這在一黨專政的中國還是第一次。公安局內部據說對此案尚有爭議。分析，這可能是幾位激進的青年學生所做，目前公安局正組織力量偵破。

通過趙紫陽「五·一三」講話公開發表所引起的這場風波，可以看出，以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派仍處於艱難時期，以彭真為首的「新四人幫」的勢力仍不可低估。目前國內出現的所謂改革派佔上風的局面還十分薄弱，整個局面完全由鄧小平一手支撐。倘若鄧小平真的退出政治舞台，根深蒂固的保守勢力必然會捲土重來、反攻倒算；多災多難的中國將會陷入四分五裂的狀態；千千萬萬的普通中國人，又會遭受一場新的災難。目前的這場風波難道不發人深省嗎？

費、活動選舉等都是獨立的。最初的會長是伯克利加州大學的趙毅衡。今年年初，在國內反自由化風聲鶴唳之時，比較文學分會舉行了由四位候選人參加競選，近百名會員投票的通訊選舉，選出新任會長為印第安納大學陳小肩，副會長為西北大學吳北玲同學。目前該會正在籌備出版自己的季刊。在美國和其它國家學習文學（不管哪種文學）的同學都歡迎參加。通訊地址為：

Chen Xiaomei
Comparative Literature
Ballantine Hall 402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IN 47401

加州 李雲

圍繞「溫州模式」的鬥爭

●本刊評論員●李豪杰

本刊轉載了人民日報八月六日的一篇報導和人民日報所加的編者按（見下頁）。從這些材料中我們可以看出，在今年上半年圍繞着要不要繼續進行城市經濟改革，在國內進行着多麼激烈的鬥爭。

溫州這種發展城市個體經濟的試點模式，在今年上半年首當其衝地受到保守派的攻擊。王震等人就曾大罵溫州的經改：「溫州還是不是共產黨領導？主持經濟的人應為溫州負責！」在保守派人物的制肘下，溫州的局勢總是風風雨雨，令人捉摸不定；溫州人的心也總是七上八下，時而憂愁時而喜；真是賺點錢不容易，賺了錢心裏也不踏實。在保守派看來，個體戶多起來，市場活躍起來，東西也豐富起來，這都是「資本主義」，只有大家都懶着、都閒着、都窮着，才是社會主義。

今年五月十三日，趙紫陽在宣傳、理論、新聞、黨校幹部會議上做了講話，試圖阻止反資運動擴大到經濟領域。二個月後，趙紫陽的講話公開發表，溫州人才由憂轉喜。但人們總不理解，為什麼生產力發展了，人民生活提高了，大家腰包裏有錢了，就總有人看着别扭，在那裏變着法子搞破壞呢？為什麼他們就不去調查調查人均收入增加了多少，市場的東西增加了多少，人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沒有，却反覆糾纏那些「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陳詞濫調呢？馬克思和恩格斯經歷過文化大革命嗎？他們領教過「四人幫」的「窮過渡」的滋味嗎？

溫州人的喜與憂也正是全國人民的喜與憂。儘管目前城市經改遇到一些困難，但總的來看，城市人民的生活還是比十年動亂時期要好多了。人們害怕一旦改革夭折，保守派翻天，中國就會再回到林彪、四人幫時期的極左路線上去。

溫州是個體經濟、即私有經濟發展的典型，被廣泛稱為「溫州模式」。我們提醒大家：圍繞着「溫州模式」的鬥爭剛剛拉開帷幕。黨內保守派揮舞「四個堅持」的大棒，隨時都可能以「堅持社會主義」、「堅持馬克思主義」為理由，向「溫州模式」強行出擊。改革派一方面發展私有制，另一方面又擁護「四個堅持」，已陷於不能自圓其說的境地。如果不克服理論與實踐的矛盾，改革派就永遠不能「名正言順」而可能隨時受到保守派的攻擊。

圍繞着「溫州模式」，還將有一場惡鬥。

東湖



HUNAN EAST RESTAURANT

● (LEESBURG PIKE PLAZA)
3501 S. JEFFERSON ST.
BAILEYS CROSSROADS, VA 22041

TEL: (703) 820-3901
(703) 820-3902

● 9546 OLD KEENE MILL ROAD
BURKE, VA 22015
TEL: 703-567-7600

● FOX MILL SHOPPING CENTER
RESTON, VA 22071
TEL: 703-476-1666

名廚主理 · 豪華筵席 · 有口皆碑 · 近悅遠來

溫州人的喜與憂

本報記者 馬立誠

七月上旬到溫州，就感到一股振興經濟的熱浪迎面逼來。環城東路長達八九里的服裝夜市萬頭攢動、熙熙攘攘。蟬街、五馬街、公園路上，飲食服務通宵達旦。我在蟬街問一家二十四小時連續營業的小吃店主人葉榮：“你什麼時候睡覺？”這個二十三歲的年輕人回答：“我夜裏兩點到四點趴在櫃台上睡一會兒，有客人來，叫醒了照舊賣。”

這就是改革、開放、搞活中的溫州人的幹勁。

溫州玻璃鋼建材廠廠長滕增壽也是靠這種幹勁，再加上信息和管理，使這個只有三百多人的小廠一九八五年產值上了千萬，為國家上繳利潤三百二十七萬元，勞動生產率和經濟效益名列溫州前茅。現在，他還不滿足，要趕上“東京水平”。

但是，滕增壽也有一怕，用他的話說：“就是怕政策變，一變就全完了。”

在溫州採訪了幾天，深深感到了這句話後面溫州人的憂慮。在溫州，也有個長期未了的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每當這種爭論一起，溫州人的心頭就罩上了一層捉摸不定的陰影，經濟的發展就受到干擾。在這方面，溫州大戶的感受是最為敏銳的，一些大戶在今年上半年經歷的波動，很值得深思。

樂清縣萬岙鄉有個跑電器供銷的“萬元大戶”，去年蓋了樓房。蓋樓時他就多想了一層，特地在五十平方米的書房中掛起了一塊匾表明胸襟：“我非財奴”，並且自費訂閱了二十三種報刊。遠近客人看了這塊匾，點頭稱道。今年春節前後，“自由化的根源來自經濟領域”的流言一起，這塊匾擋不住風了。一些人散佈說他的錢“來路不正”，是“幹資本主義掙的昧心錢”。流言日漸凶猛，有關方面還查了查，結果沒有問題。但他閉門在家，再也不敢出去聯繫業務了。今年三月，一家小報載文介紹了他的事迹。照過去，

他要把這篇文章複印，寄給有業務聯繫的客戶，以證明自己的信譽。可這一回他卻把報紙藏了起來，而且還責怪作者為什麼在文章中標明他是個體戶。他覺得世道似乎要變，個體戶有點危險了。本來他打算今年買一輛上海桑塔納轎車的，驚恐之下不但沒有買桑塔納，反而把僅有的一輛摩托車也給賣了。直到七月十日，報紙上發表了趙紫陽同志在宣傳、理論、新聞、黨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鮮明地批評了那種把有利於解放生產力的措施說成是資本主義的東西，批評了要把反自由化擴大到經濟領域的錯誤觀點，他的心頭才煙消雲散。這一天，他買了甲魚河鱉，請遠近鄉親和朋友們在這塊匾下喝酒慶賀。過去的計劃又上了桌面，重新運籌。

更有意思的是樂清縣啞叭洞道觀有一個二十八歲的年輕道士。前幾年下山還俗，先幹建築隊，後來又跑供銷，賺了些錢，也蓋了一座小樓。他徜徉其中，慶幸自己的選擇，認為現實生活的魅力實在勝過“羽化登仙”。天地造化豈能獨享？於是他發大誓願，要把自己的獨得之秘寫成一本介紹公共關係的書，讓更多的人在商品經濟的漩流中學會游泳。不料今年年初，“經濟上也要反自由化”的論調一時莫辨真假，他的心也涼了。“冥心湛然，乃道之基”又向塵世中的他招手了。他想來想去，還是服了輸，打點細軟，準備了十年生活費，重新回到啞叭洞道觀修行。過了幾個月，他下山看了看，似乎沒“鬧”起來，心又動了動。趙紫陽同志的講話發表之後，他才重下決心，告別道觀，回到商品經濟中幹了起來。

傳說多端的那幾個月，溫州幾乎沒有一個人敢說自己有多少錢了。人們懷着別樣的心情熱心起公益事業來。捐款辦學、建公園、修路，一邊拿錢一邊看幹部的臉色，心裏打鼓。而幹部心裏的苦衷又有誰知道？樂清縣縣委書記對來訪的一位作家說：“過去，四面八方的人到溫州來參觀，都說好。今年頭幾個月，外地來溫州參觀的人少了，而且都不說話了。尤其是頭頭，一是看，二是吃，一問三不知。”這種氣氛怎能不使縣鄉幹部和大戶“警覺”呢？

七月一日，我和十多位記者、作家一起去溫州市鹿城區一家大戶家裏做客。主人吳邑，四十多歲，他經營建築材料，住的就是自己蓋的樓。我們樓上樓下，一一細看。高級護牆板、流綫型現代家具、茶色玻璃隔斷和大幅藝術裝飾，很講究的。我們向主人祝賀，主人卻舒展不起來，臉上淡淡的一層憂鬱。後來，他才說了些心裏的憂慮：經濟改革使生產發展了，生活提高了，為什麼有人非要把它說成是資本主義？難道非要大家都窮着，才是社會主義嗎？我們離開溫州的時候，聽說吳邑心裏邊的這塊石頭終於放下，人也變得開朗了。他還捎信讓我們再去玩，並且說下次再去不會冷場了。大概，他也讀了趙紫陽同志的講話了。

原人民日報編者按：這篇報導反映的溫州大戶今年上半年一段時間喜和憂的波動，使我們看到了一些對改革、開放持懷疑、保留態度的錯誤論調給實際經濟工作造成的干擾和影響，值得我們注意。趙紫陽同志在宣傳、理論、新聞、黨校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嚴肅地批評

了這些錯誤觀點，代表黨中央再次重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不能聯繫經濟改革的政策、農村政策，以及其他等等。對此，必須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在當前深化改革的形勢下，億萬幹部群眾正在發展商品經濟的拼搏中大顯身手，為推進

四化建設努力做出貢獻，怎能再讓他們套上無形的繩索，提心吊膽，無所措手足？衡量是非、判斷進步還是倒退，主要看它是否有利於解放社會生產力，有利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個認識，是我們吃了不少虧才得到的

編者按：這是一名旅日華僑給香港「爭鳴」雜誌的投書。文中有理有據，打中了彭真的要害。

就訪日大醜聞致彭真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彭真先生：

值此全國人大即將召開年會之際，我冒昧發出公開信，向您提起一件使您煩頭的事，希望您能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諸位代表作出解釋。

身為海外中國人，我時刻關注着祖國所發生的一切，尤其對從祖國來的友誼使者倍感親切。您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至四月二十八日率領人大代表團訪問日本，令我興奮和自豪。每當我回想起中國和日本的歷史悲劇，看到您——一位國家重要領導人在日本享受到國賓待遇，我真的吐氣揚眉了。毛澤東先生關於「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聲音，常在我耳邊迴盪。

從前，中國貧弱，中國的代表到國外，屢遭外人奚落。外國人根本就不把中國代表的人格、國格放在眼裡。這些苦澀的往事，相信您比我更清楚。所以，從您以堂堂中國人大委員長身分蒞臨東瀛的第一時刻起，我這顆海外赤子之心一直沒有平靜過，我相信其他旅日炎黃子孫亦是人同此心的。

然而，在您結束訪問，踏上歸途之後，我們這些曾為祖國親人自豪過的人，却從興奮的峯頂跌落沮喪的深淵。您知道嗎，人們說您的訪問是「東瀛出醜記」，說您一行的所作所為丟盡人格國格。我起初對傳聞將信將疑，經過核實，才感到無地自容。

彭真先生，您一定知道，按照國際外交慣

例，您的人大委員長之銜，相當於國會議長，不能享受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待遇。而按日本的接待規格，您一行必須限制在十五人左右。您不僅携夫人張潔清、女兒傅彥，還有私人秘書、秘書助理各一人，醫生兩人，護士兩人，警衛兩人，隨員三人，加上代表團其他隨員，人數竟多達三十四人，遠遠超出限額。日方礙於禮儀，被迫照單接待，勉為其難。

如果僅是代表團成員超編，還不算太過分，因為您年事已高，需要多點人侍候，日方是能夠理解的。但您彭氏家族在日本期間，竟然肆無忌憚地伸手索物，致使日本國會議院全年招待費超支百分之六十。此事日本報紙均有披露，難道您不覺得丟醜嗎？

尤為可氣的是，您閣下的眷屬和代表團其他成員，不僅在日本以遊玩享樂為快事，還採購了足足四卡車的用品，您甚至指示中國駐日大使館，要挑選「政治表現好」、「思想覺悟高」的留學生十餘名，去整理搬運這四卡車東西。

據我的記憶，您曾多次教育別人要「為人民服務」，您還在胡耀邦先生倒台後，侈談「延安精神」，「勤儉樸素」。言行對照，多麼不協調啊！

您身為中共元老，又是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主持中國的法制建設工作，理應珍惜羽毛。可是，竟然跑到日本來做出有失身分的事。中國有句俗話，叫「上樑不正下樑歪」，高官如您者，尚且如此，能怪那些比您低的幹部在國

外不顧廉恥嗎？

聽說香港人稱大陸幹部為「表叔」，顯然沒有恭敬之意，這酸溜溜的稱呼是大陸幹部本身的形象造成的，並非香港人有意刻薄。而在日本，人家說您攫取了日本人的納稅錢。旅居日本的海外赤子則稱您為「山西土財主」。

記得「文革」前夕，您曾在家中邀集一些朋友，向朋友拱手作揖道：「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雖然玩的是江湖把戲，却也道出了您的人生哲學。日本之行，您和您的同行者撈了四卡車東西，不就是一「出門靠朋友」得來的嗎？

您在中國，一向給人以嫉惡如仇的形象。一九八三年九月至一九八四年二月，您執行鄧小平的指示，領導一場「嚴打」運動，半年時間裡，在全國捉了約一百萬罪犯，其中數萬人被處死。一些犯輕微罪行的人，均在打擊之列。於是，您得到了「執法如山」的美譽。可是，像胡喬木的兒子胡世英，罪行疊疊，罄竹難書，您為何不敢動他一根毫毛？像您自己在日本幹了丟人格國格之事，您又如何用法自律呢？

這次倒胡成功，您和您的戰友薄一波、胡喬木、鄧力群等人彈冠相慶，顧盼自雄。但在我看來，您現時的形象與您剛踏上日本國土時的形象是大不一樣了。我真切地看到您的形象是醜陋的中國人的形象。

您訪日醜聞的傳言至今未息，為您搬運四卡車用品的中國留學生仍都健在，您如何為自己辯解呢？衷心盼望您向全國人民作出回答。順致問候。

旅日華僑 賈保羽

一九八七年三月廿日
（原載於「爭鳴」一九八七年四月號）



胡喬木

一個無行文人的悲哀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楊漫克

在中共政壇的紛復演變中，胡喬木是一個十分奇特的人物。他一生做過毛澤東、劉少奇的私人秘書，一度輔佐過鄧小平重建權力體系。目前，胡喬木已雄居中共「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正統理論權威」的位置。文革後中共掀起的數次政治運動，他都是始作俑者，故有「左王」之稱。時值中共十三大屆臨之際，中共高層權力鬥爭日趨激化、複雜。胡喬木還將充當何種角色？他不得民心的名聲，是否會使其政治生涯戛然而止？本文雖未回答這樣的問題，但希望通過其一生的幾個片斷，讓世人對在中共制度下文人無行的必然性有所體察。

毛澤東的代筆捉刀人

胡喬木係江蘇鹽城人，早年在北平讀大學。後投身中共革命，調往江西蘇區。胡喬木參加過紅軍長征，革命資歷非淺。中共中央到陝北後，胡任毛澤東的私人秘書，另兼中共青年訓練班教務長。平心而論，不管胡喬木的人格怎樣，其文彩極佳，在中共一干文人中，是屬上乘的。他不僅馬列理論造詣很深，英文、俄文水平很棒，詩寫得尤其出色。故胡能被喜歡吟詩唱絕的毛澤東所器重，也捉刀代筆地為毛澤東寫過許多理論文章。毛澤東在延安時的許多文章，內行人一看便知有胡的筆法滲雜其間，特別是那篇禍害了中國大陸文藝界數十年的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尤為明顯，因此胡喬木對這篇「講話」寵愛得出奇，視同己出。最近又大呼要捍衛這篇「講話」，其精神要繼續作為今後大陸文藝界的指南。

與陳伯達對調的疑案和影響

中共在陝北時期，胡喬木一直是毛澤東身邊的得寵人物。不過到了四十年代末期，胡喬木突然與劉少奇的秘書陳伯達對調位置。陳伯達做了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做了劉少奇的秘書。至於這種調整安排的幕後玄機為何？仍是一個尚未解開的歷史疑竇之一，有待專家們考證。筆者以為，胡陳的對調，反映了毛澤東與劉少奇兩個中共巨頭間的矛盾與鬥爭，並對日後毛發動文革，搞垮劉的黨政系統有十分微妙的影響。

可能的原因是：毛在四二年徹底搞垮王明，扶植了第一個接班人劉少奇；但毛對劉並不信任，故派親信胡喬木去做劉的秘書，以便監視控制。但劉在抗戰勝利後，又借故加強白區工作，將胡派往上海，在一家出版社作事，領導白區鬥爭。建國後復又回到劉少奇的身旁，並任中宣部副部長。

在中共的黨內鬥爭中，胡喬木、陳伯達、張春橋這些內宮文人，曾起到十分重大的作用，史家對此尚無相應的充分重視。從五十年代

末的廬山會議，直至文革前，陳伯達一直在毛的左右工作。文革期間又投靠林彪，最終身敗名裂。可見陳是一個慣弄是非、野心勃勃的文人。從胡喬木的性格及一生表現來說，如果有與陳伯達的調換，胡繼續留在毛的左右，他亦可能在後來扮演陳伯達或張春橋的角色，在毛劉、毛林兩次殘酷路線鬥爭中，成為替罪羔羊，其政治生命，或許也不會延至今日。

毛澤東不喜歡胡喬木

儘管胡喬木做過毛澤東的秘書多年，不知為何毛一直不喜歡胡氏，其中的奧妙尚無法瞭解，可能與劉少奇、江青有些關係。但在一九六四年，也是文革前夕，却發生過一件很突兀的事情。當時的「人民日報」以很顯赫的位置，發表了毛澤東與胡喬木相互唱和的詩。這樣的安排多意味着某人政治行情看好，或與毛有特別親密的關係。可能的情形是，毛已經考慮發動文革倒劉，想把胡喬木從劉少奇的系統中拉回來，康生還特別去做胡的工作。但自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上毛作了檢查後，劉少奇的勢力與聲望都很高，又是毛的法定繼承人，中共黨內許多人都想和這位未來的領袖保持良好關係，沒料到毛會倒劉。我想當初胡喬木也存有此念，故並未與毛親近，仍留在劉的系統裡，這一錯誤判斷，導致胡喬木在文革中的失勢。

胡喬木勾結「四人幫」的一段秘密

文革期間是胡喬木一生最不得志的時期，由於做過劉少奇的秘書，胡喬木自然是一「黑司令部」的走資派，被陳伯達一脚踩了下來。陳與胡同屬權力上層的個中翹楚，素來相輕不合

。陳伯達得勢，胡喬木定要倒霉。

七一年，陳受林彪反黨集團牽連倒台以後，胡同鄧小平的心態一樣，想借機重返中央，東山再起。可是張春橋、姚文元在台上，也就沒有胡喬木出頭的機會。儘管如此，胡喬木並未氣餒，進行了一系列勾結「四人幫」的活動，意圖擠入「四人幫」集團，分一杯羹。這段歷史，外間尚不知情。

要敘述這段歷史，還要從胡喬木的女兒談起。文革初期，胡女因父親的牽連，從北京被謫往遼寧鞍山市，在鞍山鋼鐵廠做工。遼寧省在文革期間是毛澤東侄子毛遠新的勢力範圍。毛遠新當時任瀋陽軍區政委，省革委會主任，集黨政軍權力於一身。毛遠新在遼寧的黨羽有四個聲名顯赫的傢伙：李素文、尉鳳英、魏炳奎、楊××（名字已忘記），人稱毛遠新的「四大金剛」。其中魏炳奎是主管工業、交通系統的省委副書記，文革前是鞍鋼的「勞動模範」，故也是鞍山市的土皇帝。

胡喬木在陳伯達倒台後，稍有轉機，立刻想把女兒女婿從鞍鋼調回北京。這本是人之常情，無可指責。然而當時中國的情況是，不搞政治効忠，也別想辦任何私事。況且胡急於再起，就乘機與毛遠新的死黨拉關係。請客、送禮、走後門等無所不用其極。魏炳奎每次進京，胡必請他吃飯，極盡阿諛奉承之能事。這樣，胡喬木不僅通過魏炳奎，把女兒女婿調回北京，還通過魏氏，與毛遠新搭上了關係，托毛遠新上奏老毛，讓他復出。

胡通過毛遠新、魏炳奎，將女兒女婿調回北京後，又和毛澤東的姪女王海蓉搭綫，要把女兒安進外交部。胡喬木通過夫人谷羽在科學院的關係，與王海蓉拉關係，多次請王海蓉吃飯。這樣，胡女又通過王海蓉的首肯，進了外

交部做事。

如前所述，父女情本無可指責。筆者本意絕非抓胡喬木活動女兒工作，與「四人幫」黨羽來往的痛腳，來對胡作人身攻擊。問題在於，胡喬木總是以正統的道德家自居，以堅定的無產階級理論家的面目出現，教訓、打擊異己，故有必要將這段歷史交代出來，看看這位滿口革命詞藻，到處揮舞大棒的正統理論家，人格到底清高到哪裡？是否真是不食人間烟火，「用特殊材料製成的」共產主義者？其實，胡喬木以權壓法，干涉法院對其公子胡世英的審判（胡世英犯有重大刑事罪），早已讓世人認清他的虛妄、偽善之本色了。

七五年鄧小平復出後，一度壓過江青的氣焰，提出著名的恢復國民經濟的「三項指示」。據說胡喬木也參與了這三項指示的制定。故批鄧期間有「鄧小平拉二胡」（二胡為一種民族樂器）之說。二胡一指胡耀邦、一指胡喬木。可是在毛澤東「四人幫」的淫威之下，胡耀邦骨頭很硬，始終不檢討，不批鄧；而胡喬木的骨頭就很軟，又是檢查錯誤，又是揭發鄧小平，批判鄧小平。這些事，在當時便為人所曉了，不作贅述。

此文僅就胡喬木一生中的某些重要片斷，加以評述，希望人們對他有個客觀、真實的看法。他在中共仕途的政治浮沉中，做過些好事，更做過許多壞事。客觀地說，在中共這架不正常的權力機器中，一介文人若要仕途通達，躋身權階的層峯，許多人生轉折往往身不由己。胡喬木在毛、劉、鄧、林、「四人幫」之間的險惡政治環境中求生存、求發展的歷史，能說明很多問題。一個才氣橫溢的文人，其人格、文格發展到現在這樣可惡又可憐的地步，實在是一代人的悲哀，一個時代的悲哀！

建議遷「毛堂」

徐松林

天安門廣場上的「毛堂」最近又發生了爆炸案。數片玻璃窗及一尊雕像被毀，這已是今年第三起了！

自從「毛堂」開放以來，每天都有人前去「吐痰」及丟「煙頭」，以解心頭之恨！一個為紀念偉大人物而建的「堂」，落到如此地步，人民政府的確有必要去好好驗討一番。長此下去，總會有一天變成毛屍粉身碎骨無尋處，如何向「忠黨」之士交待呢！

一九八三年，傻徐去遊北京，深入曹營大廣場，突然全身發冷，一眼望去，城門上掛着「毛像」！心想，歷代的城門上那有掛「帝王

」像的！倘若敵軍殺來，那個位置不是正好成為「箭靶」！走到廣場中間，招待員問我是否想去見見「毛堂」？當時傻徐真「傻」，沒有進去吐一口痰，為我慘死的爺爺出一口氣！不過，我立刻給中共一個建議：把「毛堂」改為「中山堂」。孫中山不僅能保經紀念堂，他的理論更能使中國早日統一，不是一舉二得嗎。台北也有「中山堂」，將來和談之日，兩岸的「中山堂」是最理想的地點不過！

另外毛堂若想「安存」，不仿以湖南老鄉的要求為名，遷回老毛故鄉。不要拖到粉身碎骨時，那共產黨的面子就全完了！

他從哪裏來的特權？

（中國大陸留學生·日本）鄭振毅

星期六晚間A君來電話，問我能否託熟人幫助出售幾件中國古董？A君是我在國內時的朋友，前兩年他到日本留學。在這人生地疏的異國他鄉，我們經常互相解決一些困難，所以友誼也日益加深。受他所託，我當然要盡力而為。

星期天一早我就冒雨趕到A君的住處。他住在一間四帖半榻榻米的斗室，屋內陳設簡陋，顯然，主人過着在大陸留學生中常見的那種樸素的獨身生活。

我進屋時，A君室內已坐着一位三十來歲的男子，大臉盤、高顴骨、中上個頭，他滿臉堆笑地望着我。A君首先拍着我的肩膀向他介紹說：「這是我的老朋友B君，古董的事請他幫忙。」隨後又指着那位男子對我說：「他姓張，是中國國防部長張愛萍的兒子。」顯然A君事先已徵得了張君的同意，才能如此從容、公開地向人介紹一位當今中國顯赫高幹的子弟。果然，張君不但不迴避，反而向我自報姓名，說：「我叫張啓剛，請關照。」說話間仍是面帶微笑，這使我忽然想起張愛萍部長的照片，父子倆的相貌着實有些相似，大概不是一「冒牌貨」（事後證實我的判斷正確）。

張啓剛給我的印象是，性格比較直率，說話滔滔不絕，你問一句，他能答五句，幾乎毫無顧忌。可能由於「後台」硬，所以他胆大氣壯，他是屬於那種外向型並帶點孩子氣的纨绔子弟性格。正因為這樣，使我有機會瞭解到中

共特權階層的一些陰暗面。我按捺不住要將這些有損國家和人民的不法行為昭然於世；同時也給某些道貌岸然的大人物們敲一下警鐘。

張啓剛在國內時名叫張岩，是張愛萍第一夫人所生。前兩年，在大陸幹部子弟爭先辦企業、建公司的潮流中，張岩伙同彭真之子傅亮等人辦了一家公司。借助他們老子的威勢，公司像氣吹一樣地膨脹起來。他們向銀行貸款，獲得數十萬圓人民幣巨額資金。當然銀行也是看在他們老子的面上。不料，正在他們得意之際，中國開始整頓機關幹部辦企業的問題并取締「皮包公司」。經查張岩、傅亮等人所經營的公司不合法，而且巨額資金的去向也有問題，為此還牽連了銀行的一名科長跳樓自殺。因此，他們經營的公司不僅倒閉，而且還要追究他們的法律責任。但畢竟因為他們的老子官居高位，聲勢顯赫，同時彭真又執掌着公檢法大權，有關方面豈能心無忌憚？很快就有識時務者將消息送進張家的將軍樓和彭家的深宅大院。於是，張岩與他的同父異母弟弟（化名叫朱小軍，張愛萍的二夫人所生，也參與了非法經濟活動），以及傅亮等人，通過關係網以最快的速度辦妥出國手續，張岩、朱小軍逃到日本，傅亮則跑到香港去了。

張岩和朱小軍抵日後，隱姓埋名住在東京高田馬場一帶一座廉價公寓中。兩人白天去日本語學校學習日語，傍晚則去餐館打工。用以往他們嬌生慣養的標準來衡量，生活真是苦了些。但用張岩自己的話來講：「咱是逃難來的

，有什麼辦法？」然而辦法是有的。

有一天，兩個陌生人登門造訪，自稱是中國駐日大使館派來的，一名姓溫，一位姓盧。當時只有朱小軍一人在家，他心中納悶：「莫非國內派使館人員來調查我們的問題？」他志忑不安起來。可是，使館的兩位「同志」却非常和藹可親，問寒問暖，關懷倍至，說是有困難提出來，一定幫助解決。同時還轉告他們，大使館已做出決定，每月要發給兄弟二人每人八萬日圓補貼費。這下可使小軍楞住了，本來是犯了法出來逃避的，大使館非但不追查，反而尊敬如賓，還給外匯，使這位過慣了特權生活的公子哥兒也禁不住要瞠目結舌。待到張岩回來，哥倆一研究，還是給老爸掛個電話問問好。本來嘛，保險閣只有在關鍵時才有必要掀動。算準時間，電話打到北京家中，正是張愛萍親自接。張部長聽完兒子的「匯報」，當即很乾脆地說：「這錢可以收呀，沒關係。」不僅筆者聽了此事感到奇怪，就是讀者和留學生諸君知道這件事也一定費解。日本的一名中國公費留學生，每月也只不過僅拿七萬左右日圓的補貼，而張氏兄弟憑哪一條規定享受比國家派出的菁英人材更優厚的待遇呢？難道特權階級與平民百姓之間竟允許有如是天壤之別？不久，張氏兄弟接到母親（小軍之母）來信，安慰他們不必擔心，國內的問題很快就會平息，并說家裏已向中國駐日使館打過招呼，要他們「適當」關照。到此，張氏兄弟心中便十分坦然了。

去年十月，張岩回北京探家，返日時帶出八件古董，其中兩件還是張部長幫助挑選的，同時携帶出兩萬美圓外匯。筆者在交談時間他：「中國正在追查你們的問題，你怎敢回去？又怎能帶着古董和外幣通過海關？」張岩滿不

在乎地冷笑答道：「家裏來信講，過了風頭就沒事啦！再說住在我家，他們不會動我的。古董和美金是海關上的哥們兒幫着帶到機場衛星廳的，咳，那海關還不像咱自己家一樣！」

高幹子弟筆者見過不少，不過像張岩這樣心直口快，且肯暴露自己思想的人却不多，因而我覺得他有幾分可愛。於是接下來，我們的話題又轉到了他們的老子身上。

「你父親對你兄弟的問題是什麼態度？」我問。

「誰的兒子誰不疼，還用問！不過處在他那個地位，表面總得避着點，反正有我媽出面就得。」張岩答。

「那麼，你認為彭真對傅亮的問題又怎麼看呢？」

「哈！那老頭我清楚，八十多歲了，愛子如命。表面說和傅亮斷絕關係，可暗中哩，比我老爸還用勁。」

「你父親對你兄弟在國外這樣生活不擔心嗎？」

「有什麼擔心？如果在國內反而不放心。我爸說中國的時局沒法穩定，所以要我們在國外去闖自己的路。他對將來自己的地位保不保，也得聽人家的，現在不過幹一天是一……」張岩說到這裏忽然止住口，搖着手說：「不要再問了。」

於是，我們都會心地笑了。

由於在日本難以謀取永久居住權，所以張岩辦了張去西班牙旅遊簽證。臨行前，他計劃託人在那裏花錢買一張居留證，開一間餐館之類的店舖謀生，再也不回中國了。我想他的理想大概會實現。我祝福他自力更生去開闢自己的新天地，不再依靠老子的特權，因為特權也不能長久。

東看西看萬有禮品最好看 左算右算萬有玩具最划算

每一個小朋友的小心靈裡，至少有一個願望可能是想要一個新款玩具，或是漂亮的書包、筆盒、洋娃娃……萬有玩具公司成百上千的高級玩具、新奇禮品一定能滿足每一位小朋友的特殊願望。

萬有玩具公司

地址：包厘街十五號孔子大廈商場

★營業時間：8:00AM~8:00PM



「他媽的」王震

(美國) 微雲

今年「五四」青年節期間，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王震在《中國青年報》發表題為《為社會主義中國的前途奮鬥——五四青年節寄語青年》的文章，《人民日報》及全國一切報紙無不轉載。不知怎麼會陰錯陽差，這位大老粗近年來又是接見青年代表團，又是對青年學生發表講話，儼然以「青年師表」自居，真是叫人笑掉了牙。

王震是貨真價實的大老粗。他是靠槍桿子和鋤把子擢升并出名的。據說他當年帶兵打仗不怕死，敢衝敢拼；在南泥灣開荒和戰士一樣掄鎬頭，一天幹十幾個小時不歇氣。對當兵也是一樣，誰不要命、賣力氣，他看得中，可以和他拉手拍肩膀哈哈大笑，親如兄弟；但如有什麼事叫他看不順眼，那就要倒大霉，他可以當眾罵你個狗血淋頭，操了娘還要關禁閉。在他擔任新疆建設兵團司令員時，一次到軍墾農場視察，先到某連隊的大田裡沒找到連長，心裡已窩了一團火；回到連部，那背時運的連長剛從小賣部出來，歪戴帽子斜叨烟，王司令見了立即火冒三丈，上去就是一個「他媽的」：「看你這熊樣，要你這個連長幹甚！」一說話就給撤了職，還要逮捕查辦，後來聽說這連長是因為拉肚子不舒服，在家偷點懶，才改關了幾天的「嚴管隊」（由帶槍的警衛監視犯錯誤的職工強制勞動的單位）算數。他當司令時，沒有哪一個下級幹部不怕他的，就連當時的兵

團政委、新疆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王恩茂也要滿臉堆笑讓他三分。他的「他媽的」是不分喜怒哀樂，「全天候」的，在全疆全國都有名氣。新疆的老軍工們至今不喊他大名，只叫他「王鬍子」，可見其綠林好漢味有多足！

筆者雖然無緣見過這位「鬍子」司令，但也會是他麾下的一員。他任新疆黨、政、軍最高領導人時，因「堅決反對封建迷信」，拔槍斃了一位維吾爾族老「阿訇」（伊斯蘭教主持教儀、講經的人），違犯了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被調離新疆改任農墾部長，因此，還是我們這些「支邊青年」的第一號上司。老軍工們有時談起「王鬍子」，有的為他「天不怕地不怕」的鬍子脾氣折服，有的為他粗莽隨便的鬍子作風贊嘆，所以我們這些「後來人」，不禁也對他懷有幾分敬仰，覺得他身上有某種傳奇色彩；加上當年人們的心理，以為「領導幹部」個個都是人中之精華，所以又有了幾分在「鬍子司令」手下當「軍墾戰士」的自豪感。

不過一九六七年的的一件事，使王司令的光輝形象在我們心中一下子倒了。那是一天傍晚，我們去飯堂打飯，只見飯窗邊貼了一張鉛印的大佈告，好多人在圍觀。原來是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機關革命造反派總部翻印的《給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全體軍墾戰士的公開信》。四開印張，挺大的字。信末署名：王震。

那時文化大革命正在掀各級「赫魯曉夫」

的火頭上，除了「中央文革小組」的那幾個紅人，從中央到基層的各級領導幹部都縮着脖子不吭聲，王司令怎麼不識時務在這種時候拋頭露面寫什麼公開信？原來，農墾部裡也鬧開了，不但群眾貼頭頭的大字報，頭頭之間也互相在搞鬼，肖克、陳漫遠（當時也都是農墾部的主要領導）大約是摸了一下王震的老虎屁股。這位毛澤東的愛將、兵團的山大王，一向只聽得贊美和歌頌聲的大功臣，怎麼咽得下這口氣？無奈他到了農墾部，級別是升了，却同時手下也空了，機關的人對他的「階級感情」只屬一般，王司令於是寫公開信要兵團救他的駕了。

那真是妙不可言的信，王副主任今天如果翻出來重讀一番，也一定會罵自己幾個「他媽的」，當初怎麼會寫出這麼沒水平的信去到處散發？！

公開信的原文記不清楚了，但主要內容在二十年之後的今天仍令人難以忘却。信的開頭毫不隱諱地大擺自己的光榮出身、革命經歷和赫赫功勳，自我贊揚了一番之後，得出的結論是：「我王震是一直緊跟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

接着，他揭發了肖克、陳漫遠和農墾部的「一小撮」如何攻擊他，要奪他權的「大陰謀」。為了畢其功於一役而致對手于死地，王司令大揭肖克、陳漫遠的老底和瘡疤，把肖克在長征時期（肖曾任方面軍首腦）犯的路線錯誤（中央早已處理過并有歷史結論）一鍋端出來，上到「一貫反對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最高「綱」上，又給他們扣上「修正主義」、「宗派主義」、「反黨集團」的嚇人大帽子，言辭的激烈和空洞，論斷的絕對和嚇人，跟兵團農工的大字報不相上下。

信的最後號召「廣大兵團戰士」「站出來」，「堅決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這信的意義只能叫人理解為「保衛王司令」)，「同農墾部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鬪爭到底」。

文革初期形形色色的大字報、傳單看過不少，但像這樣的高級幹部毫不掩飾地自擺老資格、自誇「光榮歷史」、自揭勾心鬪角遮丑布的好文，確是少之又少，或者就是絕無僅有的。王司令大概真是給惹火了，桌子一拍就做出這樣愚笨的事來。不知這份「珍貴」文件如今還有誰保留着沒有，發表出來真個是好看得很哪！

給我們這些書生氣十足的「知青」們印象極深的還有一點，就是那連篇的錯字。這張丟丑的大字報不過千把字，錯別字就有十多個。也許印發者想給「軍墾戰士」們一點親切感吧，所以信件原文看起來未經改動，只是在錯別字後邊用括號註出正字來，這樣滿篇的()號就格外地顯眼。看得出，「鬍子司令」這回是用開了秘書，袖子一擡親自上陣了，這倒跟他的一貫作風是一致的。

筆者無意抹殺這位司令在戰爭年代和建國初期所建樹的業績和功勳；作為一名帶兵、墾荒的指揮員，他有幹勁，有魄力，有一套辦法。但像他這樣江湖義氣重、政策水平差、文化程度低的大老粗，却要充當青年之師表，豈不貽笑大方？！

更要命的是，這樣一位早已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的鬍子司令，如今八十老幾了，還要當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顧問」，而且是「副主任」，知道他會「顧」出些什麼「問」來！
唉，「他媽的」！

各式K金·鑽石·紅藍寶精工首飾



14K 意大利
新款金飾

翡翠·玉器·鑽石
黃金·14K·錢幣

文明堂

36-36 UNION ST. FLUSHING, N.Y. 11354

介於中美銀行與大道食品之間
H.J.&L TRADING CO.

TEL: (718)939-8935

保證貨真價實

商業辦公樓 MASPETH

皇后大道和 495 高速公路之間
，2900 平方英尺，地面樓，13
間辦公室，四間浴廁，中央冷
暖氣，有停車位，第一個月免
租金，適用於商業。

請電 516-745-4760 (9A.M.~5P.M.)

CHRIS BIRRER

孔子眼鏡公司

各種名牌軟性隱形眼鏡

DAILY WEAR CONTACT LENS

BAUSCH & LOMB
AMERICAN HYDRON
PERMALENS

PERMAFLEX-
VISTAMARC
CIBA

HYDROCURVE
AMERICAN OPTICAL
GENESIS-4

免脫隱形眼鏡

EXTENDED WEAR CONTACT LENS

(包括鏡片、驗光費、醫師會、全套消毒保養鏡片儀器、後期檢查)

◀ 新出品介紹：散光軟片隱形眼鏡 ▶

一律特價



精美電腦 彩色沖印公司



華人獨家—
彩色沖印
大突破

有此標誌才是
真正柯達彩色

只需24分鐘，
即可提供您更快，
更好的沖印服務。



地址：17 BOWERY, N.Y.C. 10002 (孔子大廈一樓商場) TEL: (212)431-4910 · 431-4911

彭真真的不知政策與法律誰大嗎?!

——參加中共「司法改革」運動的回憶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美國) 綠綺

四月八日，「中共法律專家」、橡皮圖章頭頭彭真破天荒地接見港澳記者。當記者詢問這位「八大」以來便主管政法的委員長：在中國究竟是政策大、還是法大時，這位老翁居然說：「政策與法律誰大，我也說不清楚。」身為制訂一九七九年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以及一九八二年「憲法」的前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主任，竟然還使用這套騙術以蒙蔽海外同胞。聽了彭真這番「妙論」後，使我悠然地憶起三十五年前參加的一次鮮為外界所知、但為禍至今的全國「司法改革」運動。

衆所週知，中共奪取政權後，早就宣佈廢除國民黨時代的「惡法」、火燒「六法全書」。但中央和各級政府中的執法人員，因其多畢業於各大學的法科專業，仍被法治觀念所支配，往往依法量刑。這就和毛澤東主張的「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徹底「人治」制度大相逕庭。為了改變過去的「法治」觀念，毛氏便於一九五二年，糾合在「七大」政治局「十三太保」中排名第九的彭真，越過政（國）務院政法委員會負責人陳紹禹（即王明），在全國各省市開展一場司法改革運動，以徹底砸爛原有的司法機關及其法律制度。

筆者當年就讀於廣州××大學法學院，有

幸被抽調參加廣東省的「司改」，因而略知一二，雖然事隔三十多年，但「司改」的情況及其結局仍記憶猶新。我記得在「司改」運動後，不但國民黨留下來的法科大學學士或洋博士全部被清除出司法系統，而且在一九五〇年後才從大學畢業分配到法院當審判工作的大學生也統統被「掛起」。到一九五五年「肅反」運動以後，他們不是被調往其他單位，便是被當作階級異己份子清洗到勞教農場勞改。我在勞教農場中就遇到三位被整肅的審判員，其中一位馬××在「司改」時還是積極份子呢！

所以，自一九五二年後，中國大陸各級法院和司法行政機關多由法盲也即半文盲的轉業軍人控制。至此，全國各地法律機構便徹底貫徹毛澤東的法律要為政治服務，具體地說就是要為政策服務，特別是為政治運動服務的旨意。

中共從來就公開宣佈，法律只是一種工具或手段，它是統治階級鎮壓被統治階級的工具。在具體判案過程中，政策又是量刑的主要依據，而政策又因執行者的水平和個人利害關係而千差萬別。這就是自「司改」以來冤案成山的原因之一；也是自八十年代以來，中共高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在實際上仍不斷發

生冤案的主因所在。

彭真也是當年炮製「法律為階級鬥爭服務的工具」的主要負責人之一，甚至在一九八三年，還利用其人大委員長的權力，擅自批准和一九七九年二月頒佈的「逮捕拘留條例」相抵觸的「逮捕收容條例」。這就是專為一九八三年秋冬的大規模濫殺濫捕的「滅罪運動」而製定的，這是個典型的法律為政治運動服務的例子。這個條例的主要內容是：「可抓可不抓的一律抓；可判可不判的一律判；可關可不關的一律關；可殺可不殺的一律殺。」可見這一條例無非是鄧小平的「從嚴、從快、從重」大搞「滅罪運動」的具體化而已。

為了揭露中共一貫來「無法無天」的事實，下面先回顧廣東省司法改革運動見聞，然後再追溯中共建國以來的政策大於國法、草菅人命的各種案例。

一、幾個「司法改革」的案例

一九五二年間，筆者以一名法學院大學生的身份參加了廣東省的司法改革運動。據當時主持廣東省司法改革運動的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省政法委員會主任古大存說，這一運動是全國性的，是由毛主席親自領導的，運動總結將經毛本人過目和審核。筆者當時覺得奇怪，因為全國政法委員會主任是陳紹禹，但是古的長達兩小時的動員報告卻從未提及這位頂頭上司。可見，「司改」也和「鎮反」、「土改」等政治運動一樣是由毛氏及其地方黨代理人直接操縱的。

古大存曾再三強調：毛主席認為，解放以來，各省市地縣的司法人員嚴重受國民黨舊法觀念侵蝕，他們不但沒有用法律維護工農階級的利益，反而成爲地主和資產階級的法律保護人，因此必須批判和徹底砸爛舊有的法律制度和司法程序，從而樹立法律爲階級鬥爭服務，爲無產階級服務，爲政治鬥爭服務，爲政治運動服務的觀念。法律是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和打擊一切階級敵人的工具。接着，古氏便代表黨（不是政府）向與會者宣佈運動紀律。並強調中共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受獎」的政策。爲了做到以身作則，這位正直可敬的「老紅軍」（廣東農民軍創始人）表示，把自己審批的全省死刑案件也交由群眾審查，並歡迎大家批評指正，絕不會打擊報復或運動後進行「秋後算賬」。後來證實古大存確屬中共領袖層中鮮有的守信人，他雖然毫無法律觀點，滿腦子人治偏見，但却是中共黨員中的精英。

當分組討論古大存的「司改」動員報告時，本人被分配在粵中區小組當記錄員。該組負責人曾以非正式傳達的口吻告訴與會者說：毛主席認爲古大存同志的馬列主義水平是很高的，並聲言如果中國黨內有一百個像古氏這樣的黨員，我們的政權就絕對不會被推翻。但是由此可以推斷：(1)古氏的無法無天觀點和毛氏一致；(2)古氏的法律觀點代表了中共以法律權威

自居的彭真等人的意見。例如直至一九八四年四月六日彭真還一再追溯當年情況，說那時就是「無法無天」。但是，在中共「八大」會議上，古大存被毛澤東和陶鑄等人指爲一貫分裂中共團結的地方主義頭子。可見毛利用古氏時便捧他，利用完了就一脚踢開，陷害他。下文介紹古氏在「司改」中解答和處理各複查案例的一些看法，由此可見中共「人治」大於「法治」的由來。

(一)興梅地區殺妻碎屍案

一九五〇年間，興梅地區法院受理一樁殺妻碎屍案，該院依法判處兇手死刑並呈省高院核批，省院院長周楠認爲殺妻手段殘忍，同意原地院判決。但按當時中共權力架構省院無死刑終決權。一切死刑罪犯必須呈上主管政法的省委副書記兼政法委員會主任古大存審批。但古氏在複核此案時，把原判改爲十五年徒刑。古氏的朱筆是重於泰山的，除非中共中央出面干預，否則作爲隸屬於省委以下的省、地法院是無權更改古氏的判決的。可見一切審判過程和法律條文都是無足掛齒的，而權力者的判斷才是主要的。

當我們一群天真的大學生把對此案的相反判決意見向古大存提出時，這位「青天大老爺」作了如下的「精彩」回答：

「從單純的法律觀點看，諸位支持和同意興梅地院和周楠院長判處兇手死刑是有充份根據的。殺人理應償命，這是正確的。但是你們和法院的同志一樣，忽視了法律的本質——階級性。無產階級的法律只能爲工農階級服務，爲階級鬥爭服務，法律只是政治鬥爭的工具之一。你們複查這一案件時沒有很好地注意到罪

犯的階級成份，只注重於次要的作案過程及其結果。而我改判這案件的着眼點恰巧和你們相反。我首先發現罪犯是一位貧農。正因爲他是貧農，所以在當時的時間和客觀條件下，不把他槍斃而僅僅讓他坐牢，這樣判決對當時（一九五〇年）的政治鬥爭有利。其理由是該案發生在我黨掌權不久，當時一般人，甚至包括你們這批大學生都忽視階級分析，階級鬥爭概念模糊。根本不懂什麼叫做貧農。所以，我就利用本案作爲清醒劑好讓廣大人民醒醒腦袋。即當大家看了宣判報告書後，肯定會提出像你們今天所提出的問題：天啊！殺妻碎屍還不償命，你們的法官是不是貪贓枉法了？不然這位判官肯定是瘋子？但是，我們的答案很簡單：因爲殺人者是貧農，屬人民民主專政的領導階級，所以殺人也不用償命。正如在資產階級專政的社會裡一樣，億萬富翁殺了人也可以逍遙法外。」

古氏接着又把話題轉到判決本案時的另一個量刑標準上。他說：「這一殺妻碎屍案，如果發生在國家宣傳和推行婚姻法以維護女權的時候，那麼，我不但不要把這殺人犯的死刑輕改判爲十五年，而且還要在死刑判決書上加在槍斃前要把他巡迴批鬥，廣泛地遊街示衆後才行刑。其實所謂法律，無非是爲政策服務，使更有利於政治鬥爭。可見問題不在於判決一個罪犯的死刑或徒刑，最重要的是考慮這一判決是否能配合當前的階級鬥爭，也就是說能否對我們的政權提供有益的效應。這就是毛主席一再強調的做法：一切要按時間、地點、條件來處理的辯證方法。」

大家聽了古氏上述兩種量刑的根據後都感到愕然。也至此才體會到在共產黨統治下的社會裡，根本不需要任何具體的法律條文，當然

更無所謂「民法」、「刑法」及其訴訟法了。就是歷朝的簡單律令也用不着（殺人償命的中國古法在中共統治下已作廢），按照古氏解釋的毛澤東主義法律觀看，法律只是中共進行階級鬥爭的一種權術。所以徒有其名的各級法院只需要具有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觀點的所謂審判員便足矣！而滿腦子法學理論和法律條文的大學本科生，不但一無所用，而且是一個累贅。所以，筆者認識的三十多位法律系畢業的朋友，在往後的三十多年中，不是被門垮便是被整死，至少也要到農場去改造。倖存者直至一九八〇年後才再度被起用，但是多已接近退休年齡。重新回到政法部門任職的大學本科生，亦只徒有其名，實際並未被重視。因為所有政法機關仍掌握在法盲加半文盲的轉業軍人手中。

(二) 改判反革命集團案中的脅從犯為死刑

一九五一年間，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一名脅從反革命份子。審判員將該犯定刑十五年，周楠院長審批同意。雖然此案不屬死刑，但因屬反革命集團案，故仍得呈古大存審批。但古氏閱後却改判為死刑。當我們復查此案時這個冤鬼的屍骨還未寒，當小秀才們依據一九五一年公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條例向古氏提出質疑時，古氏的答覆是：

你們說「條例」規定，只有反革命集團主犯才處以極刑，脅從犯是不會遭槍斃的。因此你們同意原判而反對我改判死刑。我承認你們有法律條文根據。但是，我必須提醒大家，共產黨人絕不把法律條文當作一成不變的金科玉律。因為量刑標準不但隨着我黨的最根本的鬥爭政策「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受獎」而

變化，而且也隨着政治形勢的發展而更改。古氏接着批評我們缺乏政治的時空觀念，不注意階級形勢的發展。他強調指出，此案已距離一九五〇年全國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運動一年多了，人們對反革命份子的概念已漸漸模糊了。為了喚起廣大群眾對反革命份子的警惕性，於是把一個脅從份子也判處死刑，好讓患政治麻痺症的人消除天下太平，可以安枕無憂的錯覺。

如果按法治觀點評價，前案該殺而不殺，已屬枉法；本案不該槍斃反而馬上處死，更屬草菅人命。但從中共統治者看來，如法律條文對其政權有損，則乾脆把法律踩在腳下。以毛



中國法律的制定與伸縮性極大
從嚴、從寬取決於領導人的意志

澤東為首的中共法律觀就是「刑隨時變，案依勢轉」。本來「懲治反革命條例」是中共自己親手製定的，但也一樣遭到踐踏，其他法規就更可肆無忌憚地撕毀了。

(三) 妻妾分爭案

此案屬民事訴訟。本來，中共掌權後，民事訴訟案是很少的。債主當然不敢追債而鬧上法庭，其他財產糾紛或遺產繼承等亦甚少訴諸法律。因為：(1)無律師可委託；(2)又無維護私人財產的法律條文；(3)再加以中國傳統「生不入官門」的恐官症，人們自古至今就不慣於「打官司」；(4)尤其是攝於中共淫威，避之猶恐不及，那裡還敢主動上門找法院。

但是，自一九五〇年四月中共公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後，那些自以為在國民黨時代受壓迫的「妾侍」（小老婆）便認為救星已到，迅即站在「婦女解放前列」，紛紛向法院提出要實行一夫一妻制。當然妾侍主動提出解除婚姻關係的案件肯定勝訴。但是有些妾侍要求法院把丈夫的原配（正室）趕走，請求法院宣判「大老婆」和丈夫離婚，而她本人則和丈夫保持婚姻關係。對這類案件，確曾使法院的判官大傷腦筋。因為婚姻法只容許一夫一妻，有妻有妾者不合法，雖然可以閉上眼睛，不告不理，但她們現在已告上法庭，那就不得不理了。但怎樣判處，確實無明文規定。

當我們復查這類懸案時也感到，提出要把正室趕走的妾侍多是出身貧苦的，有些原來就是簽了賣身契的婢女，並被主人收為偏房的。如果按階級觀點看，法院應支持妾侍一方，但從實際出發，正室已徐娘半老，兒女成行，讓她離婚，必會產生大量社會問題。因此，我

們這群書生爲此爭論不休，但無法找出合理途徑加以解決，而有些家庭已因妻妾不和而相互動武，很難避免把民事訴訟演變爲刑事拘留。最後，我們便把妻妾分爭的婚姻訴訟案提交給古大存這位紅色法律專家加以拍板。而古氏迅即作出下述妙不可言的判決準則：

古氏強調，一夫多妻是國民黨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問題。我們共產黨人無須承擔這種責任。因此，處理辦法很簡單。誰先作原告便判原告離婚，例如妾侍要求法院判正室離婚則相反判妾侍離婚，反之亦然。這一錦囊妙計確實馬上見效，妻妾分爭案的原告聞風撤回申訴，不敢再訴諸法律，達不到不告不理的目的。古氏認爲人民法院是爲人民服務的。能娶妻立妾的人，若非地主資產階級也是生活較富裕的人。坐享「齊人之福」只屬道聽途說，總之這些擁妻抱妾的人即使未劃入人民民主專政範圍，也只不過是屬團結改造的對象。法院無須爲他們投入大量人力物力。

我們聽了這位已進入「知天命之年」的「法制專家」的宏論後，不得不嘆服其頭腦之「靈活」。因爲這一判案標準已超出了階級分析框框了。古氏的提法已不再支持受害的奴隸般的妾侍了。可見即使你是九代貧農出身，只要你的個人利益和當前中共的利益不一致，那麼中共絕不會犧牲黨的利益的去爲工農群眾打抱不平。古氏這種實質上屬不負責任的處理妻妾紛爭法，對自古有話「清官難斷家務事」的妻妾案毫無補益。致使真正出身貧微而又受正室及丈夫壓迫的妾侍陷入無助困境，個別的甚至互相拔刀相向而造成慘案。

我們綜合上述案例後便不難透過中共所謂法律爲人民服務的帷幕去深究其實質了。中共打着爲工農階級立法的旗號，如貧農殺人不用

償命，把封建時代的「刑不上大夫」變爲「刑不上工農」。相反，專政專對如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和右派份子便可任意關押和加刑處死。這種虛假的「刑不上工農」的現象確曾使一些無知的所謂領導階級受寵若驚。被專政的階級（後來增加到九類）固然受到無情地迫害和殺戮。但在「狡兔死，走狗烹」的政策下，不久工農階級也受到殘酷的剝削甚至慘遭鎮壓，不但喪失了曇花一現的特權，而且連少得可憐的基本權利也遭剝奪了，農民不准遷徙，工人不准跳廠，長期在饑寒線上掙扎。但當他們覺醒過來的時候，脖子已被套緊而動彈不得了。

作爲中共的老革命、老黨員及其後代享受犯罪從輕發落的特權，甚至利用那條專爲他們開脫一切罪責的所謂「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受獎」的政策而逍遙法外。但是在「文革」後，絕大部份罪犯都出自工農階級及其先鋒隊，尤其是老幹部及其後代。可見毛澤東及其支持者力主的「人治比法治好」的謬論所造成的無法無天局面，既陷害了上千萬的所謂敵對階級份子，也葬送了工農階級及其先鋒隊的前程。最後由於推行這種「和尚打傘」政策，甚至處於這個黑幫權力頂峯的梁山泊靠椅人物也群遭滅頂的厄運，而且這一悲劇至今仍餘波未盡。

二、彭真是一貫以黨的政策取代法律的典型

彭真不但在中共掌權前後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以政策代替法律的倡導者和執行者，而且至今仍信守不渝，只是使用更狡猾的偷樑換柱的手法而已！

關於以黨的政策代替法律的問題，彭真於一九八四年四月六日在首都新聞界座談會上曾作了一次鬼拍後枕的發言：「幾十年來，我們經歷了兩個時期：一個是革命戰爭時期，一個是建設時期。在革命戰爭時期，黨、軍隊和群眾，大家注意的是黨的政策。一件事情來了，人們總是問：這是不是黨的政策？……黨中央給各地的，概括起來，可以說就是政策。那時，我們根據地的政權也有一些法，但有限，也很簡單。就全國講，法是國民黨的或外來侵略者的，如果要講法，就不能革命了……對反動統治階級，就是要無法無天。」

從彭真的上述講話可概括爲：中共在大陸全面掌權前，於紅區內是以政策代法；於白區內則是「無法無天」。

在同一講話內容裡，彭真也承認掌權後：「我們對法制建設的重要意義認識不足，強調



在彭真眼裏，法律只是共產黨維護其統治的工具

不夠，經過十年內亂，大家的頭腦才比較清醒了。認識到像文化大革命那樣無法無天，是要吃大苦頭的。」彭真在此肯定了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是無法無天時期。但從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六年的十七年却是有法可依的。他舉了奪權後即制定「共同綱領」和毛澤東親自監制的一九五四年憲法以及一批法律為證。所以在這一時期的毛病只是各級領導對法制認識不足，有時甚至放鬆了執法而已！

但是，我們認為從理論上和實踐上都證明了彭氏的估計是錯誤的。

從理論上看，上文引述古大存的施法理論就是以政策取代法律的典型，法律條文只有完全符合當時的政策才起作用。彭真自己也在同一講話中承認，許多同志長期以來養成了以政策代替法律的習慣。可見古氏的理論在黨內具有普遍性。而毛澤東雖然出於權術的需要，主持制定了僅供觀賞的憲法，但其立場正如他多次所表述的：「我就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和斯諾語），這是和法治絕對對立的黑幫行動準則。所以在中共統治下，當法律條文和中共的利益（絕不是人民的利益）發生衝突時，則一切立法必遭踐踏和撕毀。而下述事實已證明這一論斷。

現在讓我們來回顧一下中共自己親手制定的法律及其執行過程和後果。

（一）中共於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三日通過的婚姻法，在執行過程中基本上受各個時期黨的政策和掌權者的意志所左右。前文引述的妻妾離婚準則即為一例。而婚姻自由更是一紙空文，黨員團員結婚必須經組織批准，一般男女雙方登記結婚也要經所在工作單位人事科證明。自中共提倡晚婚以後，法律規定的婚齡早已成為空話。自中共強迫推行「一孩制」人口政策後

，婚姻法早已成為此政策的附庸，各地幹部因推行各種黨的政策而踐踏婚姻法之事例實不勝枚舉。

（二）中共於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八日通過「土改法」。但最要害的條文却不予公佈。如該法第九章：「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雇農及其他農村社會階級成份的合法定義」就不寫上公佈的文本中而用「另定之」一語略過。具體內容全由土改工作隊內部掌握。就筆者所知，由陶鑄指揮的廣東土改，根本便把土改法束之高閣。他以「村村見血」的濫殺政策取代法律。據不完全统计，窮鄉僻壤的粵北曲江縣，有案可稽的正式判處死刑者多達七百三十一人，其他自殺或屈死者還不包括在內。比較富庶的韓江三角洲揭陽縣土改時的土地統計，被劃為地主的人平均僅有兩畝地，這比起我的一位山西省籍朋友家裡擁有三十畝地也只評上中農真有天壤之別。可見中共所定的法律只是騙人把戲。

（三）中共於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公佈的「懲治反革命條例」也不過是黨的政策之附件，上文所引古大存的做法已一目了然。

（四）中共於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通過了憲法，明文規定公民享有廣泛的民主權利和自由。但是為時未及半載，毛澤東即赤膊上陣，憑空發動了一場肅反運動，把百萬無辜幹部打成反革命，即使不屬鬥爭對象的也按「肅反」運動政策剝奪了部份自由。在長達大半年的運動中，不管被鬥者或鬥爭別人的積極份子，都一律要搬到機關辦公室住宿，無事不得請假。被鬥者不但人身受到侵犯，甚至連「不說話的自由」也被剝奪。筆者就身受其害。看來用無法無天形容中共的所作所為是一點也不為過的。也許彭真會說，他那時還未真正掌握政法

系統。那麼我們便轉來回顧在「八大」以後，彭氏已榮任中共中央主管政法書記的一九五六年以後的中共所作所為吧！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把百萬右派鬥得死去活來，現在證明這一運動純屬對知識份子進行陷害。毛澤東和鄧小平領導這次無法無天的殘酷鬥爭正是彭真執掌政法大權的時候。接着就是在貫執「三面紅旗」後，在廬上會議上批判彭德懷，發動了全國性反右傾運動，最後使兩千萬無辜百姓成為餓鬼。可見彭真當了全國的政法主管後是最無法無天的。由於他本人早就屬於政策即法律、黨紀大於國法的無法無天派，因此，在他主持政法工作期間，根本便嗅不到任何法律氣味，人們只能聞到餓餓遍野的腥風。最後他也嚐到自己所縱容和支持的無法無天行徑的苦果。可謂自作自受。

中國共產黨人也許會說，我們自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早已撥亂反正，不但平反了冤假錯案，而且還製定了各種法律和公佈了一九八二年新憲法。而這位紅色法律專家彭真又再一次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主任，主管制定各種法規和修改憲法。我們承認，近年來中共已開始重視法律，比過去有些進步。但是否真的像彭真所說：「中共三中全會以來，整個政法戰綫的工作不錯」？那就讓我們回顧一下八年多來的執法事實吧。

首先法律不是由立法機關全國人大屬下的法律委員會（雖然當年由彭真兼任）而是由黨中央的政法委員會制定，人大只有舉手通過。可見所定法律主要代表黨的利益而不是專門保護人民的。其次，一些具體法律，如一九七九年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制定者却是執法機關的黨員頭頭，因為這個政法委員會的副主任都是公安部長，中央的檢察長和最高人

民法院院長，他們是具體的法律條文制定人，這就難免使所制定的法律專為執法的專政機關服務了。尤有甚者，專政機關，特別是公安部、局，不僅可以任意解釋法律，而且可以越過法律，甚至可以把自己一手制定的法律踩在脚下。例如審判人員可以用「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立功受獎」的政策，把一切案件顛倒量刑。這就是胡喬木的罪大惡極的兒子胡世英可以無罪釋放，而香港一位來料加工商人鄭建威於一九八六年六月在深圳被判死刑的秘訣所在。

一九八三年由於要搞一場打擊刑事罪犯運

●思想論壇●

暴力革命還是和平轉變

程實

動，於是乎在公安系統大權獨攬之下，當時已升任人大委員長的彭真，暫時停喊「依法辦案」的高調，把制定還未滿四年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通通踩在脚下，他利用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專管政法的委員和人大委員長的身份，獨自批准由公安、檢察和法院制定「逮捕收容法」以代替手續繁瑣的「逮捕拘留條例」，以利於他們進行濫捕濫殺。

一九八四年，在全國範圍內一夜之間便把所有被中共指為反革命組織的民間團體加以取締並秘密逮捕其領導人，這也是以政策代替法律的一個典型。

數千年的中國文明史，除一九一二年中華

民國成立後短暫的民主共和國時期外，自始至終是一部專制制度史。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統治中國大陸的中國共產黨領導集團，在其專制本性上與歷屆統治者沒有區別，而且有着一些新的特點。

第一，中共是喊着反專制口號實行專制統治的。

第二，中共為擺脫政治孤立與經濟困境而不得不與西方世界接觸。

第三，中共派往海外的留學生和海外的華人，對大陸施加很大的影響。

如何改變中共的專制制度呢？道路不外有兩條：一是暴力革命，二是和平轉變。二者比起來，哪個更痛苦呢？

在中共專制下的中國現實是：暴力革命從

未掀起過，但和平轉變的痛苦卻不斷加劇。

「和平」轉變中國專制制度在提倡者方面是和平，在鎮壓者方面却是不折不扣的暴力。今日在中共鐵窗下受苦的「政治犯」們絕大多數是提倡和平改變社會制度的，但遭到如此不和平的鎮壓。

「和平轉變」為中國社會帶來的痛苦，還在于中國社會的全面停滯和令人難以忍受的緩慢爬行。將中共統治下的大陸與世界上幾個華人為主體的社會相比較，中國大陸明顯地在經濟、政治、文化上無一不是落後的。「和平轉變」的一廂情願再持續幾十年，中國大陸全面落後的痛苦也將再加劇幾十年。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共統治層的「改革派」的口號將可能帶有今天「和平轉變」的意味。比如他們有能「允許」一百年後有一家不擁護共產黨的報

中共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雖然過去無法無天的情況有了一些改變。但是「黨大於國、黨紀大於國法、政策大於法律」的情況仍未有實質性的改變。其實這種現象也是和憲法上被滲入的「四項基本原則」相一致的。如果在執法過程中真的像彭真等人所吹噓的，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麼鄧小平一再強調的「四個堅持」就實際上已消失了。這是中共高層領導絕對不會容許的。

所以，迄今為止，中共的政策仍大於法律，彭真說自己不清楚究竟是政策大還是法律大，這是自欺欺人的說法。

紙，二百年後有一個非黨人士「競選」國家主席之類。他們這種統治策略的改變，與今日的暴力鎮壓的形式是一致的。民主革命者若不能相應地從漫長多痛苦的和平轉變論轉向迅速少痛苦而有效果的暴力革命實踐，倒是頗有些「跟不上形勢」了。

暴力革命可以帶來迅速而徹底的民主自由變革，同時使中國社會少受痛苦。

暴力革命並不必然意味着大規模的流血與動亂。暴力的本質在於強迫。以實力強迫專制政權投降是暴力革命最理想的方式。問題是暴力革命者要清醒地認識這一前途，滿懷信心地追求之。

如果菲律賓人民能夠強迫馬科斯的專制政權投降，從而實現了沒有大規模流血動亂的暴力革命（當然還有許多不盡人意之處），中國人為什麼就不能做得更好一些呢？

中國的民主革命將開創以暴力推翻中共專制政權，而又無大規模流血、無動亂的歷史先例，中國的民主革命者對此應該充滿信心。

中共保守派反資強攻·打掉趙紫陽理論助手

蘇紹智·王若水·吳祖光等挨整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黃鵠

對知識分子的新整肅

繼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三人被中共開除出黨後，最近中共又強迫吳祖光、王若水退黨，撤消蘇紹智黨總支書記和社科院馬列所所長的職務，並開除孫長江、張顯揚出黨。對於浩成、戈揚、李洪林等人，也在黨內點名批判。這是繼方、劉、王事件後，中共保守派反對改革和開放，對知識分子的又一打擊和迫害。消息傳來，在大陸留學生中、特別是文科學生中又引起不小的震撼。人們原本對行將召開的十三大所抱的希望，傾刻之間又蒙上厚厚的陰影。

這些知識分子何罪之有？

劇作家吳祖光，現年七十歲，抗戰時期以創作「風雪夜歸人」劇本成名，一九四七至一九四九年期間曾在香港任職電影公司編導。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北大荒勞改，文革時備受凌辱。七九年作為專業劇作家，在文化部藝術局任職，後被胡耀邦邀請入黨。其妻新

鳳霞為著名評劇演員，文革中慘遭迫害。在今年初中共發佈的第八號文件上吳祖光被點名批判，因為他曾在八四年全國政協會議上提議今後不應再搞「不稱政治運動的政治運動」，八四年十二月吳祖光又在全國作協「四大」會議上批評胡喬木、鄧力群等人的左傾作法及他們所主張的「反精神污染」運動，因此被中共保守派視為「眼中釘」。

哲學家王若水，現年六十一歲，早年就讀北大哲學系，五〇年底由鄧拓介紹到人民日報理論組當編輯，七七年底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的罪狀是提倡人道主義、人的價值及人性論，因而在「反精神污染」中遭到批判，並丟了副總編輯的烏紗帽。去年在中共醞釀政治改革時，他又主張重新研究馬克思主義有關國家、政黨、政權建設的理論，提倡政治問題公開化，保障言論、出版、新聞自由，聲稱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中也有許多「進步的」內容。

蘇紹智曾任人民日報理論部主任、中國社科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他把馬列主義與中國的具體現實問題相結合，提出了許多精闢的見解。如他提出，現代化不僅是物質方面的現代化，「還應當包括政治體制的現

代化」；「社會主義社會的主體是誰：是人民，還是領導？」；「黨和群眾之間的關係不應該是動力機與傳送帶之間的關係，而應該是相互配合、相互監督的關係」等等，這些，都切中時弊。因此蘇紹智被保守派視為另一眼中釘。蘇紹智所著「民主化與改革」一書，收集了他近年來有關改革與開放的言論和文章，就在發行前夕被保守派封殺。（此書影印件已傳至海外，本刊本期將轉載四篇——編者）。

于浩成，現年六十二歲，原任群眾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八五年因直言批評官方政策而遭到整肅，去年四月被逼退休。他提倡政治體制改革，指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是中國政體的弊端。他在去年曾說：「當前最主要的是要反對封建主義，而不是什麼自由化。」他呼籲實行政治民主化和讓人民行使議政的權利，並公開批判「第三梯隊」的提法。

張顯揚，中國社科院馬列所研究員，七八年到八〇年思想解放運動期間頗為活躍，在「讀書」、「光明日報」等報刊上發表了一系列鼓吹思想解放的文章。

孫長江，原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哲學教員，後調到北京師範學院政教系當教授，再調到「科學報」當副總編。在七八年至八〇年思想解放運動期間撰寫了許多主張改革和開放的文章，文筆生動活潑。

戈揚，女，現年七十多歲，反右被劃為右派，曾任「新觀察」半月刊總編輯，思想解放，一直被保守派視為眼中釘。

李洪林，原福建省社會科學院院長，後被保守派撤職，也是鼓吹改革開放的理論家。

這些知識分子何罪之有？他們不就憑着自己的良心，憑着自己的知識和對社會的體認，說出了自己的真心話嗎？當然，如果入黨、退



王若水



于浩成



吳祖光

黨僅僅是代表對政治觀點的認同與否，那麼在中共保守勢力甚囂塵上的今天，退黨也未償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可以表明對保守派的一種抗議，就像斯大林事件發生後，西方各國家的共產黨員紛紛要求退黨一樣。在西方國家，今天你可以加入這個黨，明天你可以加入那個黨，你可以隨時「跳槽」。無論入退哪個黨，對於一般人來說，都不致影響到他個人未來的學習、工作和生活。但是在中國則不然。退黨或被開除出黨的最大懲罰不僅是政治上的，而且，主要還是工作和生活上的。伴隨着退黨，你的行政職務將隨之被解除，以後在提職、提薪、住房、子女就業、甚至參加學術活動、發表出版作品，都要受到極大阻撓。這些後遺症才是最最厲害的。我們之所以說吳祖光等人被勒令退黨是保守派對知識分子的迫害，也主要是指這些「後遺症」而言。當然，他們的言論也將被封殺，這也是嚴重的政治後果。

保守派玩弄的陰謀

人們不禁要問，在學潮風波早已平息，國內又重新宣揚「改革不僅要堅持，而且要加快」的論調的今天，中共保守派又對吳祖光、蘇

紹智、王若水等知識分子開刀，他們的葫蘆裏究竟賣的什麼藥？不了解中國政情的人可能感到非常突兀。因此還可能做出錯誤的推測和判斷。

例如目前外電根據國際觀察家們的分析一致報導，吳等「被迫退黨是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從事政治交易的部分計劃，以換取於十月召開的十三大對他們所提建議的支持」。這完全是用西方人的觀點來看中國的事情。其實，事情果真如此的話，保守派也太容易對付了，個別知識分子一開除出黨，一些人一遭到撤職或批評，保守派就放棄進攻了，從他們本身講，他們可以高枕無憂了，不用再擔心「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了；而從趙紫陽這方面講，他也可以不用擔心保守派的反對，可以放手在十三大上提出進一步的政改、經改計劃了。這些知識分子怎麼會有如此大的「價值」？實際上，保守派不會「心善」到這種程度，趙紫陽也不會愚蠢到這種地步。固然，勒令吳等退黨，正如以前許多中共決定一樣，事先一定要在黨內達成一種妥協。但此次「退黨」，絕不僅是幾個人退黨的事，它乃是保守派在十三大之前玩弄的又一花招。保守派之所以再施「反自由化」餘威，是想達到如下目的：

一、他們想借此向全國人民示威，證明他們人還在，他們的力量還在，以此在全國範圍內製造輿論，顯示他們「反自由化」路線的正確，顯示他們本人以前所作所為的正確，借以撈取政治資本，以便在十三大上奪取更多權力。

二、他們企圖以吳祖光等人事件為契機，使各方保守勢力再來一次新的集結和整合，以便在十三大上與改革派進行較量。

三、他們是在採取迂迴包抄的策略對付趙紫陽。這些知識分子中包括像蘇紹智那樣的屬於趙紫陽理論班子的智囊人物，把這樣的人物搞掉，這就一方面在實際中斬斷了以趙為首的改革派的理論喉舌，封殺了這些人的作品和發言機會，另一方面，也在客觀上製造了反對改革開放的輿論，打擊了趙的威信。

四、他們是想先發制人，「殺雞給猴看」，在十三大前夕給國內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們一些顏色看，達到威懾知識分子的目的。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吳祖光等人退黨事件並不簡單，它是保守派的一大陰謀，是保守派反對改革和開放，堅持其早已被人民唾棄並在實踐中已被證明是行不通的僵化思想路線的又一丑惡表演。保守派的目標遠不會止於這幾個知識分子，而是指向趙紫陽，指向改革和開放的政策。

歷史的重演

從吳祖光等人的退黨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出，在改革過程中，伴隨着改革派與保守派的意見分歧和鬭爭，歷史不斷地重演。預料今後一段時間內，歷史還將重演。這些重演內容是：鄧小平在既反左又反右的舞台上玩弄平衡策

略；趙紫陽在與保守派的鬭爭中表現得太軟；保守派詭計多端，咄咄逼人，對力主改革開放的知識分子大搞秋後算帳；知識分子旗幟鮮明，展現新的力量。

鄧小平左右搖擺

鄧小平在主張改革與開放的同時，始終面臨着一個兩難處境。他一方面根據過去個人和國家的遭遇，痛感中國不改革不行，另一方面又害怕改革「改過了頭」，從此中國墜入萬劫不復的「資本主義深淵」。所以在實際中他始終像走鋼絲的雜技演員，左右搖擺着。有時支持左派打右派，忽而又支持右派壓左派。所以，中國的改革進展遲緩，步子邁的不大、不堅決，保守派始終擁有極大勢力。

這次退黨事件雖說主要是由中紀委一手包辦的，但也必須得到鄧的首肯和趙紫陽的同意。通過這次事件，可以預料，十三大前後還會有新的反覆、新的事件出現，不能預期在十三大上出現什麼重大的政治改革突破。因為從目前來看，像王若水、蘇紹智這樣的理論家，基本上是以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觀點來研究中國現實問題的，尚不為中共所容，更不要侈談什麼「創造性的運用和發展」了。可以預言，中國在今後一段長時間內，如果繼續保持目前的經改勢頭，在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上仍然維持目前這種僵化的局面，那就已經很不錯了。從吳祖光等人退黨事件中，再次使我們堅信，在民主與人權等問題上，不能對中共的改革寄予過高的希望。

趙紫陽軟弱妥協

以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派在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中，表現得軟弱無力。如果說在經濟領域中改革派還能施展一些「拳腳」的話，那麼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可以說幾乎被保守派繳了械。雖說保守派至今除了在馬列的書本中找出幾條林彪、四人幫都已用舊了的條條框框用來唬人外，拿不出什麼像樣的理論，而改革派也沒有一個頗具陣容和理論深度的理論班子，提出系統的改革理論，理直氣壯地為改革搖旗吶喊。改革派只滿足於經濟上的「摸着石頭過河」，以及鼓勵一些散兵游勇式的少數知識分子的直言上諫。趙紫陽目前的策略是，以農村改革的成果為藍本，逐步擴大經改範圍；只要保守派不反對經改，其他都好商量，所以在意識形態領域裏乃至在人事安排上節節退讓。在胡耀邦解職，方、劉、王被開除出黨等事件中，趙紫陽表現得軟弱；而在這次打掉趙紫陽的理論助手蘇紹智和逼迫吳祖光等人退黨事件中，趙仍然表現得軟弱。當然，在中國這樣一個人治社會裏，人際關係很重要，趙紫陽儘管身為代理總書記，也有其難言苦衷，他不一定撥得動那些中共元老。例如，身為代總書記，在五月十三日主持那次黨的宣傳、理論會議時也不得不事先聲明會前已向小平同志做了匯報，是「小平同志要我們開個會」云云。但作為代總書記，在關鍵問題上就要旗幟鮮明，敢於表態。或許趙紫陽已力所能及地做了工作。但總的來看，面對保守派的進攻，趙紫陽表現得軟弱無力，一次次地做了妥協。我們認為，讓步是沒有止境的，保守派是要你趙紫陽下台，他們上台。毛澤東曾說過一句「名言」：「以鬭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妥協求團結，則團結亡。」趙紫陽冀求以讓步求得保守派的「寬容」，結果只能使得保守派得寸進尺，氣焰更加囂張，



非但團結達不成，搞得不好，經改的成果隨時可能毀於一旦。

保守派秋後算帳

這次「退黨事件」中，保守派又表現得咄咄逼人，使出了以前慣用的殺手鐮——秋後算帳，顯示他們對付意識形態上的敵人絕不心慈手軟。張顯揚和孫長江二人只在七八年到八〇年間活躍一時，近二年比較穩健。但保守派對他們過去的「罪行」一直耿耿於懷。此次借機一次整倒。此次據說是由於「三種人問題」（即與林彪、四人幫有牽連）才將張、孫二人開除出黨的。但人們不禁要問，既然是三種人，為什麼孫長江還能當科學報副總編輯，張顯揚還能任馬列所研究室主任？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就是說，一旦你上了保守派的黑名单，你就休想讓保守派放你一馬。從這也可看出中共權力鬭爭的殘酷性。

知識分子立場堅定

此次事件所涉及的知識分子與上次方、劉、王一樣，都表現出鮮明的立場和正義感。當王若水被勒令退黨時，他公然說他沒有錯。當他被問到是否可能被開除出黨時，他回答「我並不在乎！」吳祖光倒是答應退黨了，但他認為黨的決定是錯誤的，他無意寫檢查。他說，他決定退黨是因為黨早先說過只開除三名知識分子，他不想成爲第四個被開除的知識分子，以免有損黨的名譽。他說：「我沒有做錯事，而是死硬派太怕批評。」

一般知識分子的態度也有很大的進步。在下次「反精神污染」中，一些知識分子有意無意地加入了保守派的隊伍，爲他們搖旗吶喊；

一些人的表現令人惡心。但這次「反自由化」運動中，許多人敢於公開與有關方面唱反調。例如有關人員會請求艾青、錢鐘書、巴金三位名作家表態支持反自由化運動，但都被拒絕。例如，胡喬木曾拜訪艾青，請他支持「反自由化」運動，但艾青答說他以前曾支持過「反精神污染」運動，後來感到後悔，表示今後不再幹類似蠢事。錢鐘書也拒絕了有關人員的要求，表示他已到晚年，不想讓自己的聲譽蒙上污損。據說一位高幹也曾訪問過巴金，但巴金答說由於不了解「反自由化」的意義，所以不能表示同意。

領導核心軟弱終至改革失敗

從此次退黨事件及以前發生的胡耀邦等人的事件來看，中國的改革是一條漫長、痛苦的路，搞得不好，隨時會翻車。正如一位中共軍方人士不無藐視地說：「這些人（指那些主張改革的人——本文作者註），腦袋掉了都不知道是怎麼掉的！」

面對保守勢力的強大攻勢，以趙紫陽爲首的改革派表現得苟且偷安、委曲求全，致使改革進展遲緩，保守勢力不斷滋生壯大。目前保守派的所作所爲，從理論到行動，可以說基本上都沒有擺脫林彪、四人幫極左的那一套，只不過在新形勢下，變換變換手法罷了。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徹底否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政策，你下台，我上台；他們絕不是像鄧小平所以爲的那樣，只是在那裏「唱唱反調」。如果是那樣的話，人們就會問，爲什麼就不能允許方、劉、王「唱唱反調」呢？爲什麼就不能允許吳祖光、蘇紹智等人「唱唱反調」呢？可見，你允許他，他却不允許

你。如果趙紫陽認爲，只要你讓我繼續經改，我就讓你在這裏「唱反調」，那就大錯特錯了。中國現時的政治鬭爭，一如既往，仍然是你死我活的鬭爭，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談不上什麼各派力量公開競爭。固然，從民主政治的角度看，多幾個反對派、多些反對意見，可能是好事而不是壞事，應該允許有人提出反對意見。但關鍵是現時中國的政體不允許這樣做。

由此看來，中國的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必須有一個有權威、有魄力的堅強的領導核心。這個領導核心應該能夠領導全國人民排除一切干擾，向着既定的改革目標堅定地走下去。對於那些不顧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一心只爲個人和小集團利益而陰謀奪權的人，應給予堅決有力的還擊。軟弱的領導核心必使改革歸於失敗！

藝聯印務

ARTLAND PRINTING WORK, INC.
60 ST. JAMES PL. NEW YORK, N.Y. 10038
紐約華埠聖士坊六十號
TEL (212) 227-9578 FAX: (212) 227-9579

柯式印刷
餐牌餐單
商業單據
各類名片
中西文件
中英植字
書刊排版
廣告設計



蘇紹智近影

蘇紹智禁書《民主化與改革》選載之一

打破一些社會政治理論上的教條

(一九八六年九月在一次關於政治體制改革討論會上的講話)

蘇紹智

改革缺乏理論根據，是改革難以深入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們有許多事情已經做了，但理論上說不清楚，或者理論上不敢說。這就阻礙了改革。形成這種狀況有許多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條是缺乏學術自由，特別是缺乏對政治問題討論的自由。現在萬里副總理在北京舉行的軟科學討論會上已經明確了「雙百方針」也適用於政治領域與決策領域。《人民日報》的評論員文章明確提出：「政治問題是可以討論的，這就為探索自由，突破一些理論上的教條開闢了道路，有利於政治體制的改革。」

政治體制的改革需要破除哪些社會政治理論上的教條呢？

政治體制改革需要破除的第一個教條，就是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只有工人階級、農民和知識份子，而且他們的界限正在消失的觀點。實際上，社會主義社會也要劃分階層或者社會群體、利益群體。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就應該這樣區分。否則，矛盾就不能很好地反映出來，從而也就不能得到妥善處理。那麼，如

▲蘇紹智手蹟

最後一批馬克思主義者的命運

——致中國之春

今年上半年，我回中國訪問，目睹了自由化運動對中國改革和民主化過程的干擾。

我接觸了很多知識份子，我的印象是：經過反資運動，他們的心徹底冷了，他們已對黨的任何承諾、包括改革派領導人的承諾，失去信心。他們告訴我：「改革不可能成功，中國將有巨變。」我深有同感，因為，任何缺乏知識份子支持的社會改革運動是不可能成功的。反資運動的最大惡果莫過於此——使人們對中共領導信心殆盡。對於這一惡果，保守派是罪魁禍首，但是，改革派也有推不掉的責任——他們犧牲掉知識份子而向保守派妥協。

知識份子被犧牲的最新例子，是蘇紹智和王若水。根據我的研究，他們和方勵之不同，他們是中國真誠的一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有人道主義色彩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也可能是最後一批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執著，使他們遭殃，因為中共的假馬克思主義

義者們（保守派和改革派都是假馬克思主義者），是不喜歡他們的。

中共整肅蘇紹智和王若水等人，等於完成了自挖墳墓的最後工程，剩下的，就是自己在坑裏跳了。

我有幸在出版社獲得了蘇紹智自選集的文稿，這本自選集名為「民主化與改革」，原訂的出版計劃遭到保守派的封殺。回到美國，我曾將蘇紹智的部分稿件給某些中國大陸文科留學生傳閱。後來發現，大陸留學生新創辦的「改革開放報」，曾有轉載。現在，蘇紹智已成了新的焦點人物，為使大家對蘇紹智多些了解，我將蘇紹智禁書的文稿寄給你們，望酌登。本人聲明，我獲得這些稿件，與蘇紹智本人無關。

「中國之春」是民主的象徵，而民主是你們和蘇紹智等人的共同理想。

祝福你們！

蘇紹智禁書文稿提供者

一九八七年八月

何進行這種劃分呢？是根據收入？是根據在社會生產中的地位？這就是社會學中所講的社會結構問題或階層劃分問題（STRATIFICATION）。對此，我國的社會學界正在進行研究和討論。應該允許并鼓勵這種討論。

第二個要破除的教條，就是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同志式的互助合作關係，政治上、道義上完全一致的觀點，這種利益一元論，應代之以利益多元論（IN FINEST PLEURALISM）。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着社會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三個層次。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基本利益、長遠利益當然是一致的。但是，如前所述，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着各種階層、群體，不同的階層、群體在眼前利益、個人利益、地區利益、行業利益上還是有所不同的。比如，對於農副產品提價，工人和農民就會有不同看法。因此，對社會利益、集體利益、個人利益要仔細分析，要研究各個階層、群體和各種人的利益問題。我們現在有的領導人已經提到權利和利益的關係。黨要了解并鼓勵各種意見和批評的提出。黨在了解和協調各種利益的基礎上制訂的決策就比較好。

第三個需要破除的教條，就是把黨的領導一元化、絕對化、全能化的觀念。要破除黨委領導一切、包辦一切的大一統的格局。黨的領導是路線、方針、政策和思想政治的領導，所研討的問題應該是宏觀的、戰略性的問題。至于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不能都由黨說了算，更不能由黨的某個領導人說了算。往往有一種很不好聽的風氣，似乎黨的領導人是萬能的，一個人當了黨的領導，他就什麼都懂，什麼都是專家，對任何事、任何學術、理論、文化等問題，都可以當裁判，評定是非。這實質上

還是封建專制主義的「金口玉言」的遺毒。

這裡面有幾個關係需要研究。一個是黨與法律的關係。就是通常所說的法大，還是黨大？不能是法大、黨也大。我們的黨章規定，黨、黨員要在憲法、法律範圍內行動，不能超越法律。憲法的制訂，我們黨也參加了意見。但憲法畢竟不是黨制定的，而是由人民制定的。黨也不能指揮專政機關，不能干預法律，司法應當獨立。否則，不利于樹立法治觀點。第二是黨與政府的關係。在許多社會主義國家，黨和政府實際上是合一的，政府的權力變成了黨的權力。許多本來應由省政府、市政府辦理的事情都由省委、市委包辦了去。這不利于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實際上也削弱了黨的領導。鄧小平同志提出「黨政分開」，我們應該認真研究。第三是黨與群眾團體的關係，舉工會為例，以往說工會是黨和群眾之間的紐帶。如果把這種紐帶理解為聯繫，那末也未嘗不可；但如果把紐帶看成傳送帶，看成黨這一機器的一部分，那實際上就把工會變成了黨的機構，失去了工會代表工人的利益的獨立性。

問題歸結到一點，那就是應該研究在共產黨成為執政黨、在建設社會主義條件下、在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被消滅的條件下，黨在革命時期的工作方法有哪些需要堅持，有哪些需要修改？我認為，關於建黨的理論、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執政黨和地下黨應該有所不同，和平時期的黨和戰爭時期的黨也應該有所不同。過去列寧與羅莎、盧森堡爭論，列寧強調鐵的紀律；盧森堡強調黨內民主。誰是誰非，要具體分析。在地下黨時期，當然是列寧正確。如果沒有鐵的紀律，沒有單線領導，一切經過民主討論，地下黨就會遭到破壞。但取得政權以後，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了，那應該是盧森堡

正確，這時的關鍵問題應該是發揚黨內民主。

第四個需要破除的教條，是對資產階級民主的陳舊看法。以往我們認為，資產階級民主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是一種虛偽的民主。然而，從歷史上看，資產階級民主中的許多口號，如自由、平等、博愛，許多制度，如權力制衡制、普選制等，都是在反封建時代由「第三等級」（包括新興資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提出來的。這些民主權利，毋寧說勞動人民更需要它們。資產階級在反封建的時期是接受、支持這些要求的；而它在統治地位變得十分牢固之後，便想限制它們，取消它們，使之變成虛偽的形式。所以，在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爭取民主自由，爭取真正的普選制、制衡制的人，主要還是人民群眾。所以，不能將資本主義社會的這些民主形式一概否定。當然，資產階級對這些權利加了很多限制，比如，在選舉中對財產、教育、性別、民族等的限制，這對勞動人民是不利的。我們在利用普選制、制衡制等形式時，要否定資產階級對選舉的種種限制和虛偽的形式，實現真正的民主。中國共產黨十二屆六中全會決議在這方面有了一個突破。決議指出：「在人類歷史上，在新興資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鬥爭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馬克思主義批判繼承資產階級的這個觀念，也同它有原則的區別。」我們不能把民主、自由、平等、博愛、人權、人道主義這些口號的使用權都讓給資本主義國家，這些對於我們來說，不僅是旗幟，也是需要爭取的事實。恩格斯曾說：「難道我們要求別人給自己以言論自由，僅僅是為了在我們自己的隊伍中又消滅言論自由嗎？」（《馬恩全集》第三二四頁）這裡，恩格斯所說的言論自由可

以擴大到民主自由。

第五，應該破除對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政治理論的一些教條主義的理解。比如，國家這一範疇，如果現在仍然只是說，「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這顯然是不夠了。即使資本主義的國家機構，也不僅有階級壓迫的作用，而且有協調矛盾和干預經濟等職能。在社會主義國家中情況就更是如此。現在在中國，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被消滅，國家當然不是階級壓迫的工具。我們要同時考慮國家的階級性和社會性，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尤其要考慮國家的社會性。法律這一範疇也是如此。

我們應該鼓勵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進行

特輯 保守派強攻「趙紫陽理論」助蘇紹智等挨整

蘇紹智禁書《民主化與改革》選載之二

對社會主義再認識

蘇紹智 王逸舟

對馬克思主義的再認識

(一)我國的建設和改革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進行的。因此，對社會主義再認識，必須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再認識。

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思想體系，必須從馬克思主義的整個體系，從它的精神實質上獲得正確的理解。

馬克思主義是科學，不是宗教，不能用教條主義的態度去對待它。馬克思主義只是一門科學，不是包羅萬象的「科學的科學」。作為科學門類之一，它必須符合一般科學的規定和

研究討論，不要老是怕出現不同意見。難道沒有反對意見就「更加民主」嗎？難道三千比〇更民主？實際上不可能沒有不同意見，只不過往往是不同意見發表不出來罷了。社會主義國家往往有個固定觀念，即認為所有的事情頂好清一色。我認為，這是不客觀的，也缺乏唯物辯證法的觀點，對一件事情，不同的階層、不同的群體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和要求，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方法，怎麼能強求一致呢？例如，政府要採取給農產品提價的措施，農民當然擁護，工人就可能不贊成。我們不可能不讓工人提意見，只能採取相應措施解決問題。我們不要害怕有人提意見、有人批評。馬克

特徵：科學重視實踐，重視發展，重視創新；科學是無終極的，無絕對權威的；科學不懼怕批評，在爭論中發展；任何一門科學都有特殊的條件和局限性，只能適用一定範圍。所以一定的科學可以是不完備的，可以被超越的，可以被證偽的。忽略甚至輕視科學的這些基本特徵和規定，不能使馬克思主義成爲一門科學。

(二)對馬克思主義進行再認識的必要性，首先是因爲從三十年代之後，斯大林成爲解釋馬克思主義的權威。號稱「馬克思主義的百科全書」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和以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爲基礎編寫的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影響波及全世界

思主義是不怕批評的，有真理還怕批評？有了不同意見，能夠講出來，平心靜氣地討論，對不同意見認真地分析、研究，協調各方面的利益，找出當時最佳的辦法去解決問題，只會使工作取得更好的效果。

改革是一種創新，是做別人或從前沒有做過的事情。因此，必須允許大膽探索。誰能說他的看法一定正確、完全正確呢？這就需要討論，要有不同意見的爭鳴，敢于提出各種方案和建議，然後，找出最優方案，推動改革的發展。反對封建主義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影響，解放思想，打破教條，逐步實現高度民主。這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歷史必然趨勢。

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自也不能例外。

作爲社會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和共產黨的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對我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影響。然而，由于受斯大林的影響，馬克思主義又在一定程度上被扭曲，這種被扭曲的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事業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消極影響。社會主義社會要發展，就必須消除這種消極影響，堅持和發展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

斯大林的說法與馬克思的說法相反

(三)斯大林曾說：「由于國內沒有任何現成的社會主義經濟的萌芽，蘇維埃政權必須在所謂「空地上」創造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形式」。《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種說法值得研究。它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招致了一種割斷歷史的虛無主義態度。與這種說法相反，馬克思認爲，社會主義「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

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着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哥達綱領批判》。社會主義有許多地方是與資本主義有聯系的和相通的，後者的許多地方可以為我們所借鑒、所利用。商品生產、福利保險、科學技術及先進的思想文化，都可以成為我們參考的內容。

世界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四) 在社會主義制度剛剛出現的時候，它受到資本主義制度的敵視、圍攻和封鎖，它確實多次經歷過被扼殺的危險。所以，直到二十世紀前半葉之前，人們十分有理由討論「誰戰勝誰」的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形勢發生了巨大、深刻、持續的變化。新的科技革命浪潮首先在西方發達國家出現，逐漸擴展到社會主義國家。雙邊交流、合作、貿易的日益擴大、增進了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相互了解。另一方面，人們汲取了戰爭給人類留下的教訓，對現代戰爭（核戰爭、光學和化學戰爭）的毀滅性後果深感憂慮。

今天，「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的口號已失去意義。馬克思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都熱愛和平，反對戰爭。我們遣責今天世界上以各種借口進行的、實施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的武裝入侵和局部戰爭，我們也堅決反對「輸出革命」，充當「解放者」的企圖和做法。

社會主義形象

有必要重新估價

(四) 社會主義社會是人類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邁進的一個階段。社會主義制度雖然至今已近七十年的歷史，但必須承認，我們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徵，它的發展階段，它的多樣性和長期性，它與以往社會的關係和它同未來社會的關係，缺乏足夠的認識：加上斯大林主義的影響和我們工作中嚴重失誤，社會主義在群眾心目中的形象始終是不清晰的，有時甚至是令人失望的。

最使人困惑的地方在於，就現實社會主義而言，馬恩曾經設想過的東西沒有完全得到實現，而他們未曾預料的東西又在現實中出現。各種各樣的批評、否定、懷疑由此而生，而在舊的體制下又不存在深入探討這些差別的可能性，致使各種信仰危機、信任危機和信心危機更加嚴重。

在面臨改革的今天，有必要根據現實的要求對傳統的社會主義概念加以批評，對存在的问题及發展的前景重新加以估價。

社會主義國家之間

為什麼會有矛盾衝突？

(六) 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問題，是馬恩未曾考慮過的。按照他們的想，人類發展到社會主義階段時，制度和國家之間的差別已經消失。然而，現實已嚴峻地證明，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在一個世界生存，社會主義制度內部也有差異。社會主義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歷史和心理上都有區別，它們不僅彼此間有合作、有幫助，也有矛盾、有衝突，在某些時候，甚至有戰爭。

這種現象，促使人們去思考：如何看待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係？一個國家的內政與外交

有什麼聯系？社會主義國家間的戰爭和衝突，是歷史的遺產，還是制度本身所致？如何避免新的戰爭發生？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應當怎樣建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

我們必須承認，這些認識問題並沒有真正解決。人們往往用急功近利的、缺少科學分析的態度去對待它們。這種態度已給社會主義的發展造成了損害。

多樣化的發展符合

世界發展前景

(七) 社會主義模式是單一的還是多樣的？當斯大林主義盛極一時，共產國際和後來的情報局實行「大一統」指揮，蘇聯仍是「榜樣」和「典範」之日，誰都認為社會主義只能有一種樣式，違背這個樣式便是異端，是「反蘇反共」。南斯拉夫曾為此「革出教門」。六十年代以後，隨着社會主義改革的開展，繼蘇、南之後又出現了所謂「匈牙利道路」。人們破除了單一模式觀，根據經驗的認識，承認多種模式的存在。

今天，隨着現實的發展和研究的深入，人們逐漸認識到，社會主義是有可能出現多樣的類型的，因為各國所依存的歷史、地理、文化、政治、經濟、民族傳統可能不同，時代發展會提供更多的因素和機會。

多樣化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符合世界和人類多樣化發展的前景。

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向

資本主義國家學習

(八)今天的社會主義社會，究竟處于什麼樣的發展階段上？

有的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已進入發達階段，本身就蘊含了共產主義社會的因素。有的認為，社會主義仍處于不發達階段。還有的認為，社會主義還未建立，目前仍處于由前社會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時期，我們的社會仍在補資本主義的課。

波蘭團結工會罷工



後面兩種認識似乎更有現實感。我們的社會的確處于初級（或者說「早期」）社會主義階段，它在各方面都是不成熟的，具有過渡階段的某些特徵。與經典理論相比，當代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不是「脫胎」于發達資本主義，而是受舊社會如封建主義、半封建資本主義影響的不發達國家。社會主義的這種落後地位，決定了它的發展的長期性，以及它向發達資本主義學習的必要性。

危機並非絕對壞事

(九)社會主義社會有無對抗性矛盾甚致危機？傳統理論是不承認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對抗性矛盾的，更不用說承認危機。

事實一再駁斥了這種認識。一九五六年的波、匈事件，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一九七〇年和一九八〇年的波蘭罷工，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對抗性矛盾和政治危機的突出表現。

危機不僅有政治危機，也可以是經濟危機，比如長期生產不足和供應短缺；也可以是道德和意識形態危機，比如傳統的說教和宣傳在群眾心目中喪失了地位，而新的、合乎發展的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學說又未真正形成；也可以是社會的危機，比如說在舊的體制下，人民喪失了對當局信任，對來自「上面的」各種號召和要求無動于衷；也可以是思想文化的危機，比如說原有的保守的文化與外來的先進文化在對照中產生了激烈分化。

危機不是毀壞，不是絕對的壞事，它只不過預示轉折點的到來。承認社會主義有危機，才會有強烈的改革意識。

經濟改革成功必然是 所有制改革成功

(十)社會主義社會有什麼樣的所有制結構？最早的理解是，社會主義只有一種全社會的公有制。然而社會主義從誕生的第一天起，就表明所有制形式不是單一的，而是一個包含多種成份的結構。但這時人們仍奉守「一大二公」的信條，堅持「國有高于集體、集體高于個體」的觀點和做法。經濟改革的實踐證明這種觀點和做法也是應當廢除的。今天的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實際上是一個公有制為主體、包括多種經濟成份的結構。

在現階段，強行國有化或集體化，只會造就「鐵飯碗」、「吃大鍋飯」和不負責任的惡習弊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由農村到城市、由局部到全局鋪開的經歷表明，經濟改革的核心，在于能否調動生產企業和勞動者個人的積極性，而這又與所有制的變革緊密相關。人們說，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由價格改革或其他改革不成功所致，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必須是所有制改革成功之結果。這是有道理的。

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 可以是多樣化的

(十一)社會主義社會是實行單一的按勞分配方式，還是可能出現多種分配形式并存的局面？實踐證明，社會主義的收入分配方式可以是多樣化的。沒有一個國家能夠長久地保持「軍事共產主義」分配方式，也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絕對平均地根據每一個勞動者的勞動的質與

量分配勞動產品。以「勞動券」為基本的配給制失效，代之以市場調節分配的方式。在中國和其他一些國家，出現了私人雇工，與外資合資企業，股票、債券市場。在現實條件下，在實行按勞分配為主的條件下，還不可能避免按股分紅、抽取利息等非直接勞動所得。

需要研究的是，這些分配方式的利弊如何？它們是否將在社會主義社會長期存在並構成其有機組成部分？它們對傳統的社會主義形象作了什麼樣的修正？我們相信，實踐中的社會主義會作出回答。

列寧的設想不切實際

(二) 社會主義是單一的計劃經濟嗎？

現實同樣超越了傳統觀念，列寧曾設想，「把全部國家經濟機構變成一整架大機器，變成一個使幾萬萬人都遵照一個計劃工作的經濟機體，——這就是放在我們肩上的巨大組織任務」（《列寧選集》第三卷，第四五頁）。然而，現實說明，那種從人財物到產供銷一律由國家安排調度的「計算機社會主義」無法合理地存在。

中國的計劃經濟概念逐年發生改變：開始提出「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然後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現在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概念，最近又開始討論「社會主義市場體系」問題。在實踐中，生產資料市場、技術市場、資金市場、勞務市場已經或將要出現，勞動力的價格、土地的價格已在形成。而且，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規律」和斯大林講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是否存在，是否符合經濟規律的一般定義，也成

為爭論的話題。

舊體制統治下的社會主義

是一種「國家社會主義」

(三) 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存在，國家機構的繼續作用，是馬恩在討論未來社會問題未曾預料的情況。形成這種狀況，既有歷史的原因，又有現實的原因；既有制度的作用，又有人的作用。無論如何，它給社會主義帶來了一系列的變化。在舊體制下面，黨已發展成爲一個全能的、無所不管的機構，黨政不分、黨群不分，社會政治生活「大一統」。它不僅使機構活力減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窒息了自由和民主。有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學者評論說，在這種模式統制下，社會主義已不是馬克思設想的那樣，而是一種「國家社會主義」。（參見「南」弗蘭尼茨基；「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當然，不應得出結論，要取消黨的領導，放棄國家職能。真正改革所需要的，是一種以充分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為基礎的、實行簡政放權的、發揮企業和基層及個人創造性的權力結構。這種權力結構的建立，是目前正在醞釀的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目標之一。

我們的改革最終要服務於

「人」這個中心

(四) 人的自由問題，是現實的社會主義社會急需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

馬克思認為，人的自由即人的解放，是廢除私有制以後應當充分實現的。以往的社會在他看來都給人造成了程度不同的異化，即人「不成其爲人」，而類似于動物或者機器，人性

受到壓抑，人的想象力、創造力無法發揮，人的創造物（國家機器、意識形態、勞動產品）反過來奴役人。因此，「必須推翻那些使人成爲受屈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係」，使人「成爲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黑格爾法哲學學批判》導言）。

然而，由於各種原因，馬克思的設想在現實中并未完全實現，尤其在斯大林主義影響下，「人化」的過程逆反成「機械化」過程，人們不思進取，不求獨立，人的主體意識逐漸退化，個人的獨立受到嚴重侵害；相反，却追求一種抽象的、虛無飄渺的「國家利益」或「集體主義」。這裡隱藏着一種嚴重的後果，即導致專制集權傾向的加強。愚昧和專制總是聯系在一起的，當大多數人喪失獨立思考能力之時，便是少數「天才」、「聖人」統治天下之日。中國「文革」期間發生的慘劇便是一例。

所以，重新研究社會主義社會下人的問題，是十分重要的。我們需要思考：爲什麼憲法賦予公民的權利往往得不到落實？爲什麼一講個人奮鬥、自我選擇便以爲是「資產階級貨色」？爲什麼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受到某些人的強烈抵制？如何認識人的個人自由與現代化社會的關係？如何在我們的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意識形態和文學藝術中給予人的問題以應有的地位？如何使我們的改革最終服務於「人」這個中心？

社會主義社會應當是人真正「成其爲人」的社會，是人的自由、人的解放的更高階段。我們應該牢記這一點。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廿四日《世界經濟導報》）

■蘇紹智禁書《民主化與改革》選載之三

政治體制改革芻議

蘇紹智

政治體制的改革和意識形態的更新，是現時期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的迫切要求。

三中全會以後，我們開始了經濟體制的改革。改革是成功的，逐步進行的，但沒有使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社會改革和文化改革結合。新的經濟體制同舊的經濟體制目前處於平衡和膠着狀態。爲了克服改革中所出現的問題，所採取的方法基本上是舊體制的方法。政治體制和思想意識缺少深入改革的準備或保證。經濟改革越來越不僅是「經濟的」改革。政治、社會及心理的因素阻礙着經濟改革。

現代化不僅是「四個現代化」。「四個現代化」是物質方面的現代化。現代化應當還包括政治體制的現代化，社會文化的現代化，思想意識的現代化，真正的現代化是體制和人身同時的現代化。中國需要現代化，又不只是「四個現代化」。

封建專制主義殘餘在思想政治方面的影響是當前中國改革和現代化的一個主要障礙。

中國是一個有兩千年封建專制主義歷史的國家。封建專制主義的大一統帝國曾長期統治中國。中華民國在大陸的短暫歷史和它的特殊性質，沒有能夠削弱封建專制主義。解放後的中國仍然大量存在着封建專制主義的殘餘，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的任務沒

有能夠完成。

特權是封建專制主義在今日社會的集中表現。特權在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的症候是所謂「不正之風」。官僚主義、特權經商、任人唯親、「關係網」、「裙帶風」，無不與特權相連。「不正之風」絕非改革和開放所致，後者頂多是某些外因。特權在思想領域和文化領域的表現是文化專制主義。「扣帽子」、「打棍子」、「穿鞋子」、「風風雨雨」、「一波三折」、「政治干預學術」，無不與特權相關。封建專制主義造成了特權。特權的出現，降低了執政黨的威信，損害了馬克思主義的聲譽，削弱了群眾的建設和改革的積極性。

封建專制主義的嚴重影響，證明了對中國現在的社會發展階段重新作出評價的必要性。

在社會生產力未達到一定水平的時候，社會主義革命是可能發生和可能勝利的，但是在社會生產力未達到一定水平的時候，社會主義社會是不可能完全建成的。我國的實踐有力地證明了這一論點。新民主主義時期如果發展得更充分一些，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改造步伐如果進行得更穩健一點，今天的情形可能不同。現階段所有制的改革，多種經濟成分的出現，說明「補課稅」的不無道理。中國現在正處在社會主義初期階段，也就是南斯拉夫理論家格

列里奇柯夫所稱的「早期社會主義」階段。包括蘇聯在內的許多社會主義國家，也對社會的發展階段作了重新估價。這是一種客觀的、實事求是的立場。在方法論上和實踐中，這種立場具有深刻的意義。

應當研究和批判「農民社會主義」意識。要研討中國傳統的農民革命的追求和形成原因及其對今天的影響，要追溯和檢查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以及社會主義時期（包括「文革」在內）的口號、要求和綱領中的進步性的一面和落後、保守的一面。歷史和現實是割不斷的，今天和明天也是聯系在一起的，理論研究工作有責任找出這種線索和聯系，使政治改革有明確的目標。

外來的東西在我國封建專制主義影響下發生變形的問題，值得深入研究。如：按勞分配，獎金制度，意在調動生產者的勞動積極性，本來是件好事。但現在有了「濫發獎金」之說。獎金變質是剩餘產品的一部份，多生產才能多發獎金，無所謂「濫發」。現在實際上是，獎金變成了附加工資，成爲平均主義分配的一部分，失去刺激生產者的積極性的作用。這是一種變形。

又如：經濟改革引入商品生產原則，以衝破集權而僵化的體制，這也是件好事。但在封建主義因素作用下，出現某些幹部子弟蜂湧經商現象。這不是普通經商，而是特權經商，它有形成「權貴資本」的危險。這又是另一種變形。

再如：毛澤東在社會主義時期的一些做法，特別是他晚年提出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文化大革命」的實踐，也是一種變形，是馬克思主義的變形，社會主義形象的變形。這種變形與封建專制主義思想不能

沒有聯系。

承認變形的事實，找出變形的現象，分析變形的原因，是今日政治文化討論的一個主題。

斯大林模式及其傳統，是和封建專制主義并列的又一大痼疾。

斯大林講專政，單純強調鎮壓的一面，不重視甚至否定民主的一面，他認為階級鬭爭在社會主義社會將隨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而日趨激化，他使自己處於權力頂端，搞個人崇拜并且濫用權力，他粗暴地干預思想和文化生活，把自己作為歷史學、語言學、經濟學等的「泰斗」和裁判人，他使富有批判精神的馬克思、列寧的學說和思想，凝固化、教條化……事實和理論分析都足以證明，斯大林的某些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一種扭曲的形式，是在俄國沙皇專制主義思想和殘餘影響下形成的變形。

遠自三十年代起，斯大林的理論和實踐就對我們有着深刻影響、中國的政治改革不僅要肅清封建專制主義的遺毒，而且也要根除斯大林某些理論和實踐的影響。

應當討論「民主集中制」的概念。

馬克思沒有講過「民主集中制」。列寧在俄國革命的條件下提出這一概念，後來它被歪曲了，光強調集中的一面。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就不是人民作主，而是為民作主。應當譯成「民主的集中制」或「民主制」，以區別于官僚主義的集中制、封建主義的集中制、資本主義的集中制等等。我們講的集中，必須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

有一個認識問題需要解決，這就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體力量究竟是誰：是人民，還是領導？這個問題不僅有的領導不明確，群眾不

明確，我們自己也不太明確。「聖君賢相」、「青天大老爺」的封建社會理想，不時表現在現在的言論思想中。有些人當選了人民代表，從他的發言看，往往不是首先想到對人民負責，而是感謝上面對他的「信任」或領導對他的「關懷」。諸如「傾聽」意見、「提拔」幹部、人民代表「學習」政府工作報告之類的說法，都表明了同樣的問題。

民主化是我們的政治理想。它應當在政治制度中得到保證，在政治哲學和政治文化中得到說明，人民的利益，才是至高無上的。

黨的領導是路線、方針、政策的領導，不是由黨包辦一切。

首先，黨與政府不能合一，不能把政府的權力變成黨的權力。黨政分工應當落到實處。比如既然明明白白地說的是「廠長責任制」，就應當在實際中、在觀念上都不同於「黨委領導下的廠長分工負責制」。



隨從一為任人唯觀者畫像

其次，黨與法律的關係要清楚。法大，還是黨大，只能有一個大，不能法大黨也大。憲法和法律是人民代表們制定的，黨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黨當然要在法律和憲法範圍內行動，任何人不得超越憲法和法律。從而，立法機構的獨立，司法機構的獨立，應當是不言而喻的，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

再次，黨與群眾組織之間，不能是「動力機」與「傳送帶」的關係。群眾組織可以是黨與群眾之間的「紐帶」，但「紐帶」不是「傳送帶」，不是機器的一部分，只能理解為黨與群眾之間的橋樑，否則群眾團體就成了黨組織的組成部份。群眾團體要代表各自群眾的利益，有獨立的權利。黨與群眾團體是相互配合、相互監督、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關係。

社會主義社會生活不是清一色的、大一統的，而是多樣化的、豐富多彩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階層、集團和團體是多種多樣的。我們不僅看到了工人階級、農民階級之間傳統的差別，我們也看到了在經濟改革後日趨明顯、日漸活躍的各種階層、集團和團體。

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利益也是多種多樣的。同樣工作的兩個人會由于技術、身體、家庭等狀況的不同而產生不同利益，實際收入就會有差距。個人如此，階級、階層、利益集團、社會集團就更不待說。我們承認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長遠利益是一致的。我們也承認各種人的眼前利益、具體利益是不一致的。要了解、關心、協調各種利益。

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利益同樣是多種多樣的。各種經濟利益在政治上的表現——通過人民代表會議、通過宣傳媒介、通過各種決定和法律——就導致政治利益的多樣化。

我們要尊重客觀，尊重事實，在改革中注

意到客觀事實的要求。

應當承認，隨着實際生活的進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構造本身會出現不足，必須按照新時期的要求補充它、發展它。

如，馬克思主義傳統理論缺少對社會心理的研究，我們今天對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問題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未解決好。依照傳統理論，只要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取得政權，「當家作主」，生產積極性就會「像火山一樣爆發出來」。但是，火山爆發不會是不停的，噴發一陣要歇一陣的，不能期待靠群眾在解放初的革命熱情去從事長久而艱巨的建設事業。所以，要研究社會心理，研究發展動力。不解決這個問題，就不會發現社會主義國家勞動生產率和生產效益長期低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原因。

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也有必要批判地吸收現代系統論方法和其他科學方法，這樣才能更好地幫助我們把握複雜多樣的改革進程，理解變化萬千的外部世界。

馬克思主義同樣需要對國家理論、階級理論、民族理論等加以發展。在新的條件下，不僅要考慮國家的階級性，更要研究國家的社會性。在新的社會中，舊的剝削階級的消失和新的社會階層的出現，要重新考慮古典的「階級」定文。

只有發展馬克思主義，才能堅持馬克思主義。

政治體制改革應當是理論同實踐的結合，理想和現實的統一。

馬克思主義者是理想主義者。馬克思把未來社會看成是「自由人的聯合體」，一種擺脫了一切形式的異化的新的社會共同體。我們追求的是社會主義民主、真正的人民民主。改革

就是要釋放出每個個人的才能、創造性和進取精神。

馬克思主義者又是現實主義者。我們應充分地估計政治體制改革的難度和限度，實事求是地、策略地對待面臨的種種矛盾、問題、暫時的妥協、必要的退讓。憲法給予人民民主以廣泛的規定，我們應努力使憲法賦予的民主和自由權利真正實現，糾正和消除與憲法精神不

相符合的一切因素。不能指望所有願望在一夜之間全部實現，只能紮紮實實地、循序漸進地推進政治改革。我們的方向是現代化和民主化，二者不能分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已經有了良好的開端，但遠非健全。由於中國的沉重的歷史負擔，在現代化和民主化道路上不能沒有坎坷。但是這個方向是歷史的方向，是不可逆轉的。

● 諷刺小品 ●

「毛主席語錄與意大利犯罪活動」

——假哈公談真實的故事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哈真實

一九八〇年盛夏，時值星期三下午，按照南方省份的常規，週三下午為「政治學習」時間，這種活動只要是從大陸來的青年學生，大概不會陌生。在南方某某醫學院裡，政治輔導員給大學生們請來新華日報社某副局長作「時勢」報告。

天南海北空談一氣之後，副局長同志說：「你們知道，毛主席語錄在文革期間已是家喻戶曉，稚童不識字也能給你背誦幾段。語錄不僅有國內影響，而且也具國際效應呢！兩年前，華國鋒主席訪問意大利，在啓程前，按國家領導出訪安全工作慣例，公安部特別人員先去意大利打前哨戰，了解國情及當地治安情況，以便確保華的安全。人們都知道意大利是國際暴力組織「黑手黨」總部所在地，槍劫、綁架、槍殺、販毒，各種恐怖犯罪活動十分猖狂。意大利是全世界犯罪率最高的國家之一，也是

人身安全保障最差的地方。中共公安部當然是捏着一把汗，做了一週的安全調查及防衛佈置，最後要求意國安全部長作出承諾：確保華國鋒主席先生出訪意國安全。不料意國官員，淡然一笑，說：「我們這裡的罪犯都是毛派的，他們十分崇拜已故毛澤東主席。罪犯們常常在犯罪活動前，背誦貴國故主席的語錄，「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等等，然後去爆炸民用列車、搶劫銀行、拐騙婦女、行刺殘暴，而且被逮捕後，還振振有詞地說：「我們所為就是按照中國的最高領袖說的去幹的，等我們的破壞成功了，我們就是意大利的最高領袖。」所以呢，貴國華主席來意訪問是絕對安全的。」中方人員問：「何以見得？」意官員說：「這很清楚嘛，師傅來看徒弟，徒弟怎能對師傅無禮呢？」

蘇紹智禁書《民主化與改革》選載之四

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若干理論問題

——答南斯拉夫「信使報」記者布托拉茨問

蘇紹智

一九八五年十月南斯拉夫「信使報」駐華記者托米斯拉夫·布托拉茨約見蘇紹智並提出了若干關於中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問題。布托拉茨將這次會見整理刊載於南斯拉夫「起點」(START)雜誌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九日版。今根據「起點」雜誌譯文如下。

布托拉茨：在你最近的文章(指「文匯報」一九八五年二月四日「學術自由與繁榮」)中，你寫道，文藝和科學都需要自由，創作自由和學術自由。你也提到，由於「左」的影響，甚至「自由」一詞變成貶詞。怎能設想那些自稱為革命者和人民自由的戰士的人變得反對自由呢？按照中國的憲法，每一個公民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等等的自由。但是你寫道，學術自由仍然沒有被公開地明確地提出。所有的障礙都來自「左」的影響。為什麼在理論和實際之間有這麼大的差別，怎麼可能「左」的影響仍然這麼大呢？

蘇紹智：自由在馬克思主義的文獻裏本來是非常崇高的概念，人類的解放包括自由而鬪爭的意思。在中國，由於長期「左」的思潮的影響，自由一詞却變成了貶詞。這是由於受「左」的思潮影響的人沒有讀過，也不懂得馬克思主義關於自由的論述。他們簡單地認為「自由、平等、博愛」是資產階級革命的口號，而輕率地把自由和資產階級聯系起來而予以否定，他們一看到自由兩個字就聯想到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所寫的「反對自由主義」一文，和毛澤東所講的那種錯誤的思想作風聯系起來，加上我國在解放前長期處於封建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封建專制主義和宗法觀念影響很深。封建專制主義和宗法觀念當然與自由是格格不入的。因此，自由一詞蒙了不白之冤，以致影響到我國憲法中所規定的各種自由的未能充分貫徹執行。這種現象並不是像你所說的理論與實際脫節，而是由於理論上的謬誤造成的。我認為我們有必要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關於自由的論述，撥亂反正，把馬克思主義所講的自

由與資產階級所講的自由、與毛澤東所講的反對自由主義中的自由以及與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區別開來，同時，要批判封建專制主義和宗法觀念，使我國憲法中所規定的各種自由能夠充分貫徹執行。這當然不是一天之間就能夠做到的，而是一個過程，需要時間。

布托拉茨：中國的實踐是反對斯大林的觀點的，但是為什麼你們在理論討論和寫作中仍然提到斯大林的名字？

蘇紹智：我們黨到如今還沒有對斯大林做出全面的再評價。但是，由於我們強調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反對照抄照搬外國經驗和模式，因此，我們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已經突破了斯大林的理論和實踐。至於斯大林的論述中有些我們認為仍然正確的部份，如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滿足人們物質和文化的需要，我們並不輕易否定。這也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

布托拉茨：有些人(在成都大學)試圖改變現在你們關於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貢獻的論點，即，毛澤東雖然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上犯了錯誤，他的功績仍然大於他的錯誤。新看法將宣稱，儘管毛澤東無疑地對革命做出了重大貢獻，他的錯誤大於他的功績，特別在他的晚年，他給中國人民帶來很大的損害。現在或不遠的將來是否可能做出這樣的改變！

蘇紹智：我不清楚你所說的成都大學某些人的論點。關於毛澤東的功過的評價，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做出了迄今為止可以為大多數中國人所能接受的比較全面的結論。這個結論除了全面地論述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巨大貢獻，指出他功大於過，同時也承認他晚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在理論上和實踐都犯了嚴重的錯誤，給中國人民帶來不幸。當然，今後隨著人們認識水平的提高，歷史檔案和文獻的發現和公佈，對毛澤東有了新的再評價是不會令人驚異的。

布托拉茨：去年十二月鄧樸方講到關於反對人道主義的偏見。他講到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所發生的不人道的行徑，折磨人的行動被錯誤地認為是「革命的和社會主義的」。他的結論說，拒絕人道主義的哲學是錯誤的，那些往往把人道主義當作資產階級的來批判的領導人這樣做是站在封建主義的立場而不是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爲什麼會有這樣的錯誤的解釋，即，共產黨人和革命者不應該是人道主義者或者多想到人！

蘇紹智：這個問題有些類似第一個問題。馬克思繼承和發展了文藝復興，特別是啓蒙運動關於反對封建的「人的發現」和「人道主義」的思想，重視作爲社會的一員的人的研究、尋求人的徹底解放、共產主義者和革命者重視人道主義，強調人民的幸福和人的徹底解放，當然是正確的和必要的。我國在解放前長期處於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沒有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洗禮，加以封建專制主義和宗法觀念的影響，有些人不能夠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認識「人的發現」和「人道主義」的歷史作用，加以「左」的思潮的影響，輕率地把它們和資產階級聯繫在一起，把爲大多數人民所擁護的人道主義、民主、人權、自由的旗幟讓資產階級去損。這是十分不明智的。

布托拉茨：現在我們看到很多關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文章。這些文章的真正作用是什麼——是否要解釋教條主義的方法和反教條主義的方法？

蘇紹智：今天中國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是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決議的正確指導下進行的。這個決議提出「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也就是恢復了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反對以教條主義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贊成以創造性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我們主張既要堅持，又要發展。堅持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講的立場、觀點、方法。這是我們不能放棄的。放棄了，就沒有馬克思主義了。當然，這些普遍原理也會隨着科學和認識的進展而得到豐富或發展。至於馬克思主義所包括的個別結論是可以隨着時間、地點、條件的改變而改變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已經不能解決今天所有的問題。這就要求我們予以發展。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提出新結論，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而決不是放棄馬克思主義。

布托拉茨：你在一九八三年寫道，把馬克思主義推向前進的必要性

。對哪些主要的問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尋求答案？

蘇紹智：在今天的世界和中國，馬克思主義所面臨的挑戰多得不勝枚舉，就其大者來說，可以包括以下幾方面：

(1) 自然科學的發展和科學技術革命所提出的一系列問題。如控制論、信息論、系統理論、生物工程等新學科，微電子、計算機、人工智能、機器人等新技術成就對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它的方法論、社會科學本身及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及至人類社會未來的影響。

(2) 由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新特點所引起的問題。例如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階級結構的變化、「福利國家」、各種形式的異化、科技發展等對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的論述是否應有所修改。

(3) 當代社會主義發展中的新問題。如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中所發生的曲折，多條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和多種社會主義模式的出現，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改革，作爲執政黨的共產黨的建設，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等等，爲馬克思主義的研究提出不少新課題。

總之，對馬克思主義提出了再思考的任務。

布托拉茨：我們的讀者可能對你關於「青年」馬克思和「成熟的」馬克思之間的關係的意見感興趣。你能否告訴我們你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蘇紹智：青年馬克思和成熟的馬克思的關係問題是當前各國各派學者所廣泛爭論的問題，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清楚的。我的基本觀點是不能把二者截然分開，不能認爲二者之間有什麼突然的「斷裂」。你肯定青年馬克思也好，肯定成熟的馬克思也好，割裂開來的看法都是不對的，因爲它完全忽視了思想發展的規律。例如，有人說青年馬克思很強調異化的理論，到成熟馬克思完全放棄了異化的理論，我認爲成熟的馬克思較少地用異化這個概念，但是他在「資本論」中所論述的商品拜物教不正是和異化的理論一脈相承嗎？

布托拉茨：鄧小平在一九八〇年八月講到爲什麼需要一個更民主的制度的理由。他提到斯大林和毛澤東嚴重地干擾了社會主義的法制。他講到，反對過分集中和混淆黨和國家的職能，反對權力集中在少數領袖手中，反對中國歷史中的封建專制主義傳統……黨的領導層贊成民主，人民要求民主。如果說現在還沒有充分的民主，誰要負責任？是否那些處在領袖和人民之間的人？在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領域中有曲折和波動是正常的。但是，在中國這種改變似乎太多了一些。甚至從一九八三年春到一九八四年春，你們有這樣的曲折：從把「左」看作主要的危險

到在「清除精神污染」中的反右，於是再回到反「左」，爲什麼在中國這些曲折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曲折這樣大？

蘇紹智：正如你所說的，鄧小平在一九八〇年八月「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報告中分析了我國黨和國家的體制中所存的弊端及其產生的原因，提出了更民主的制度的必要性。黨的最高領導的作用作用是巨大的，但是不能在很短的時期內改變社會的現狀。如前所述，中國有着沉重的歷史負擔，封建專制主義的傳統影響和封建法觀念的影響很深，不是短期內所能消除的。而長期的「左」的影響也加深了民主化過程的困難。中國共產黨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強調了民主化的要求，把民主不僅看作手段，也看作目的，有了一個良好的開始，而民主化在中國的實施是一個過程。將隨着經濟的發展和人民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而逐漸使民主化趨於完善。同時在民主化的過程中，也是由於前述的原因，曲折也是難以避免的。甚至有時是很大的。

布托拉茨：在經濟領域你們反「左」，在意識形態和政治領域你們反右，爲什麼有這樣的差別，是否合乎邏輯？

蘇紹智：在經濟領域反「左」，在思想政治領域反右是我國在六十年代曾經出現過的情況。在一九六二年爲了克服經濟困難，我們提出了八字方針「調整、鞏固、充實、提高」，這是反「左」的方針，使我們的經濟逐漸得到恢復和發展。而在思想和政治領域，特別是在一九六二年中國共產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強調了階級鬥爭，並且提出要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隨後，在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間，在意識形態領域開展了一系列的錯誤的、過火的政治批判，這是反右的方針。這樣，在經濟領域反「左」，在思想政治領域反右，終歸不能長期協調，不是反「左」佔上風，就是反右佔上風。事態的發展，是反右佔了上風，終於導致全面推行極「左」路線的「文化大革命」，我們相信不會再重犯這種錯誤。

布托拉茨：現在你們黨的政策說富裕是好事，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還有許多其他的改變（如農村與城市的改革，開放十四個沿海城市，等等）。所有這些在實踐上都是十分大膽，對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來說理論上又是十分新穎的。這是「解放思想」和「實踐是真理的標準」原則的產物。它能夠走得有多遠？

蘇紹智：在粉碎「四人幫」以後，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恢復了馬克思主義的路線。我們批判了「四人幫」的「普遍貧窮的假社會主義」，提出了富民政策。這是符合社會主義的生

產目的。在消費品的分配方面，我們批判了「平均主義」，提出企業的收入應該和它經營的好壞、個人的收入應該和他勞動的好壞聯繫起來，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因爲勞動好先富起來。這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物質利益原則和按勞分配規律的。我們認爲只要我們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主導地位和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原則，我們就不會走資本主義的歧路。當然，這不是說我們可以掉以輕心不去注意發展中的偏差而及時加以糾正。

布托拉茨：鄧小平等黨的領導人決定在黨和國家體制中進行重大的改革，某些觀察家認爲這樣做冒了很大的風險。你是否同意確實有風險，是什麼樣的風險？

蘇紹智：任何改革，總是難以避免曲折和風險的，這種曲折和風險有客觀的因素，例如上面一再提到的，我國所受的封建專制制度和封建宗法觀念的影響，小生產者的習慣勢力。我國長期存在的「左」的思想的影響、教條主義的束縛、長期採取的僵化模式的影響等。主觀的因素是：例如，對客觀規律的認識上的偏差導致的失誤。我認爲只要我們能估計到這些因素，採取適當的措施，是可以避免大的曲折和風險的。而且只要我們肯定了改革的方向，發展失誤，及時糾正，大的曲折和風險也是可以避免的。

布托拉茨：迄今，你們正在進行對孔夫子的第四次恢復名譽。能不能說你們正在調和馬克思和孔夫子？

蘇紹智：馬克思主義應該吸取人類一切文化遺產的長處，取其精華，棄其糟粕，予以革命的改造。孔夫子不僅是中國古代的偉大的思想家，也是世界歷史上的偉大的思想家。「文化大革命」時期，全盤、徹底否定孔夫子是極「左」思潮造成的，也是錯誤的。現在我們根據實事求是的原則，重新評價孔夫子，只不過是按照歷史唯物主義，恢復歷史本來面目，把孔夫子重新放在應有的歷史地位上，同時對他的學說給以馬克思主義的評價，並不是試圖調和馬克思和孔夫子。

布托拉茨：爲什麼在你們的國家裏「人道主義」通常被認爲是貶詞？

蘇紹智：我不認爲在我國普遍地把人道主義一詞看作貶詞。絕大多數人，包括普通老百姓，也許他不大懂人道主義的真正含義，都認爲人道比不人道比野蠻要好。

布托拉茨：非常感謝你的會見。

（原載「起點」一九八三年4月37號「南」第38—40頁）

編者按：最近，國內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進一步擴大，王若水、吳祖光、張顯揚和孫長江等被勒令退黨，蘇紹智被撤銷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和黨組書記職務，于浩成、戈揚、李洪林等遭黨內批判。本刊擬選編他們的一些作品，供讀者們參考。

智慧的痛苦

王若水

王若水



「我當然願意做一個哲學家，不過我會是快樂的。」

辛克萊把這件事寫在他的《怎樣使生活豐富》一書裏。我在學生時代讀過這本書。幾十年了，他在那本書裏宣揚的人生哲學我已經忘記得乾乾淨淨，唯有這個故事却一直留在我的記憶裏。

我因為苦悶 才去學哲學

那時我喜歡哲學，不過我並不快樂。一九四六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學哲學系。我的家境很困難，父母並不贊成我學哲學，他們希望我學理工，將來找個好職業，好贍養家庭。哲學在當時是冷門，成績好的學生一般是不考哲學系的。不過，我還是選擇了這條路。

當時社會上有一個流行的名詞：「苦悶的青年」。我就是其中的一個。我是因為苦悶才立志學哲學；但我也因為喜歡窮根究底地思

索才感到苦悶的。我想，如果能像豬一樣，吃飽了就睡，睡夠了又吃，什麼都不想，是不會有苦悶的。

然而我的生活絕沒有豬那樣輕鬆。不僅是我一個人和我的家庭，廣大人民的生活都是困難的。人們不能不為衣食發愁。物價飛漲，到了天文學的數字。學生當中流行着一首歌：「五塊錢的鈔票沒人要」。伙食很差，營養不良，以至在街頭看到的人很多是瘦骨伶仃的。另一方面，國民黨越來越腐化，官僚們大發橫財，而在政治上又壓制民主，扼殺自由。於是，人民，特別是青年學生中的苦悶就變成了不滿，不滿又變成憤怒，最後就爆發為反抗。這就是四十年代風起雲湧的民主運動或學生運動。

作知識分子 常感到壓抑

我剛踏進大學的門就捲入了這場運動。我喜歡北大的民主自由傳統。不過，我在課堂上

美國作家U·辛克萊在當學生的時候，有一次老師問他：

「你願意做一個快樂的豬，還是願意做一個不快樂的哲學家？」

辛克萊回答說：

學的主要是唯心論哲學，那些玄妙深奧的理論有時使我暫時忘掉了現實，從而暫時忘掉了苦悶；然而一接觸到現實，書本上給我展示的那個「潔淨空闊的世界」就煙消雲散了。我覺得我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我生活在塵世，生活在這個苦難的而又為我深深所愛的中國。我不能逃避到象牙之塔中去，我要和人民共命運。

如果現實是污濁的，那就要淨化它；如果社會是不合理的，那就要改造它。於是我參加了進步社團，我編寫壁報，我參加集會，罷課，遊行示威——當然也讀書，讀馬列的書。在這個過程中，我的苦悶解脫了。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入了黨。個人的、消極的苦悶溶化到了一個偉大的集體事業中，變成了積極的反抗和鬥爭。我找到了真理，我願意為她獻身。我認識到，我和我周圍的同學們的工作，是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一部分，我們也在推動歷史前進。我認識到生活的意義和自己的價值。儘管我還是一個窮學生，每頓飯都啃着窩窩頭，而且不知道那一天會遭到國民黨的逮捕，但是，我覺得自己的生活是豐富的，精神是充實的，情緒是昂揚的，這是一種幸福。

解放了，我隨着解放軍進了北京。我參加了開國大典。那時我的興奮情緒是難以形容的。五十年代初我寫過一篇短文，題目是《夢想與現實》。在題目下面我引用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一句話：「現實偉大於夢幻」。

然而，我逐漸發現現實並不如我想像地那樣完美無缺，新社會仍然是有弊病的。「社會主義是天堂」——我覺得我並沒有生活在天堂。機關生活是沉悶的；我反而懷念大學時代。

我想努力發光發熱，有所貢獻，然而，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常感到壓抑。

上書受打擊 才如夢初醒

可能正是這種壓抑感使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誤認為這是一場羣衆性的民主運動。我自以為思想解放了，其實是深深地陷入了個人迷信而不自覺。人民日報曾就毛主席在長江游泳一事發表過一篇社論：《跟隨毛主席在大風大浪裏前進》，這個題目是我擬的。我自己確實懷着革命的激情，想在這場大風雨中經受鍛煉，像高爾基描寫的海燕一樣。

但不久我就受到了衝擊，變成了「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我已經很「左」了，然而按照那時的標準，我不僅「左」得不夠，甚至是右。

林彪事件以後，周總理受委托管人民日報。我開始參加審閱版面的工作。一九七二年周總理提出批極「左」思潮，我非常高興。但過了幾天，張春橋、姚文元就對人民日報的負責人談話，唱了一通反調。於是發生一個問題：究竟聽誰的？我想，周總理是對的，應當按照他的指示做。我趁張春橋、姚文元不在北京的機會，編發了一整版批極「左」思潮的文章。這一下惹惱了張春橋姚文元，他們抓辮子了。我一不做二不休，索性上書毛主席，告了張姚一狀。

我沒有想到，原來是毛主席本人不同意批極「左」思潮。於是，打擊落到了我的頭上。那是一九七二年十二月的事。我和人民日報幾個領導幹部被召到人民大會堂的一個會議

廳去開會。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怒氣沖沖。我看見我的信就攤開在他們面前。周總理處境很難堪，他想保護我而未能成功。對我加的罪名是重得可怕的；江青說我「分裂中央」張春橋說我「極右」。——這好像是規律了，多少年來，反「左」的人都沒有好下場，最後被戴上右的帽子。和我一起受到批判的還有胡績偉同志。我們兩人被說成是報社「一股邪氣，一股勢力」的代表。接着報社展開了對我們的「揭發批判」，其聲勢和規模超過了以往任何一次批判運動。我想，區區像我這樣的人，值得那樣大動干戈嗎？我是擁護周總理的人；他們明地是批我，暗地是批誰呢？

當我了解這一點時，是非常震驚的。我開始了痛苦的思索。一步一步地，我明白了過來，看穿了這場我曾熱烈擁護的「文化大革命」的實質。我這才如夢初醒，睜開眼看到了現實。

現實是無情的、冷酷的，它使我痛苦。然而，我寧做痛苦的清醒者，不願做無憂的夢中人。

智慧是快樂 也帶來痛苦

當時我想，既然毛主席都認為我是錯的（儘管他對我的批評比較溫和），那麼我這一輩子也別想翻身了，我將在痛苦中度过後半生，直到生命的結束。然而，我並不後悔，許多同志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偷偷地給我支持，給我鼓勵。「多加保重啊！」是我常聽到的悄悄話。我的糧票不夠，同志們給我糧票；我患了肝炎，同志們又給我送藥品。我在農村勞動一

改造」，農民也對我很好，他們並不覺得「老王」是壞人。這給了我力量。我覺得我是和人民站在一起，我並不孤立。我得到了許許多多相識與不相識的同志的同情和關心，這是那些當權者得不到的。這種精神上的酬報，使我覺得我的受苦是值得的。如果我去做那些出賣靈魂，踩着別人的身體往上爬的事，我將永遠逃不脫良心的譴責。

歷史的發展比我預料的要快：天安門事件爆發了，「四人幫」被粉碎了，「兩個凡是」受批判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我和大家共同分享着勝利的喜悅。

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再一次使我感到歡欣鼓舞。「左」的西風退縮了，改革的強勁東風吹起來了。也許不能設想今後一切都會一帆風順，但放開眼看，我相信文藝創作和科學研究的自由將得到保障。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是前途似錦的。

回到本文開頭提出的問題吧。我認為，哲學家追求的是智慧，智慧會給人快樂，但也會帶來苦惱。他可能清醒地看到現實並不是一片玫瑰色；他也可能由於堅持真理而被視為異端。在我們這個時代，在「左」的流毒還沒有肅清時，一個面向現實和熱愛真理的哲學工作者是不會只有快樂而沒有苦惱的，但是，歸根結底他是樂觀的，因為他相信人民的力量，相信真理總會取得最後的勝利，相信歷史的進步。另一方面，即使是苦惱的時候，哲學家的苦惱也比豬的快樂處在一個高得不可比擬的境界，

——這一點是辛克萊所看不到的。

痛苦是磨煉 使人更成熟

由於智慧而痛苦，由於堅持真理、熱愛人民而受到痛苦，這種痛苦是美的。英國羅斯金有一句話：「少女能為她失去的愛情而歌，守財奴却不能為他失去的錢財而歌。」為什麼？因為愛（不僅是男女之愛，還有對祖國和人民的愛，對真理和自由的愛）是人的一種高貴感情，貪財却不是；而詩與美總是同人的高貴的、純潔的感情聯繫着的。（我在這裏並沒有鄙視物質財富的意思，我只是反對把金錢當作最高的價值和人生唯一追求的目標。）

對強者來說，痛苦是一種磨煉，痛苦會使他更加成熟；他將戰勝痛苦，而不會被痛苦壓倒。偉大音樂家貝多芬的一生就是一個明證，他的作品表現了「通過苦難走向歡樂，通過鬥爭走向勝利」的英雄主義。即使是痛苦，在他的音樂中也升華為美了。這種通過痛苦和鬥爭達到的勝利的歡樂境界，是和那種渺小的、自私的、坐享其成的歡樂不可同日而語的。

我想，上面所說的不僅適用於哲學家，也適用於科學家、文學家，適用於一切有頭腦、有熱血的人。青年們喜歡談論什麼是幸福，那麼，我就把我在幾十年生活中的這一點體會獻給青年朋友吧。

註：原文寫於八四年一月七日，三月刊於大陸一家未對外發行的雜誌，現發表的是修改稿。

VIP 名人

VIP
ORIENTAL
INC.
旅遊公司

718-539-0700
539-0448

135-23 40RD. FLUSHING, NY. 11354

特廉機票

↔上海
紐約 ↔ 北京
↔ 廣州

美國付錢 中國國內取票

台北·香港·北京·上海

※美國國內各種廉價票，電腦訂位。
※代辦各國簽證，機場接送。

- 巴士旅行團，華盛頓DC，尼加拉瀑布，波士頓。
- 大西洋城，天天出發。
- 佛州迪斯奈樂園，三天二夜旅行團。

紐約市區遊覽 ● 紐約近郊遊覽

「我們受到的迫害至今沒有停止」

——吳祖光在全國作協「四大」的控訴發言（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卅日）

編者按：下面是新近被中共勒令退黨的著名劇作家吳祖光在一九八四年底作協「四大」上的即席發言（根據錄音整理，原載「爭鳴」雜誌）。此次大會由胡耀邦幕後支持，胡喬木、鄧力群却缺席。會上會下鬭爭十分激烈。吳祖光在會上強烈批評了「清污」運動，但鄧小平至今仍說「清污」沒搞好；吳祖光在會上歡呼「創作自由的春天」，可這春天不但沒有到來，吳祖光等自由派作家却進一步受到迫害。這說明，我們絕對不能低估中共保守派的實力和野心。

「我還是怕……」

我在這裡發言不容易，因為我受到很大的阻力，阻力來自我的妻子，因為我前天無意中說了一句：「這次發言，我要點名」。她害怕了，當時和我吵起來。我給她朗誦了元旦日人民日報上發表的一首流沙河的新詩《不再怕》，她感動了，表示自己也不該再怕。但是只不過半小時以後，她說：「我還是怕。就因為你在一九五七年的第一次發言，弄得幾乎家破人亡……」昨天她在我發言之前居然給主席遞條子。直到今天早晨她向我審查了發言內容，又要我保證不點名，才得到她的允許。她還威脅我：假如說話得罪人，就從座位上溜下去，攪亂會場。

我同意不點名，因為耀邦同志說：可以批評，但不要點名。我想，這樣也好，要團結，不要傷了和氣。

這次開會，大家都非常高興，因為胡啟立同志代表黨中央提出了保障創作自由。雖然創作自

由本應是一種正常現象，是每個人理當享有的民主權利；但是由黨中央明確保證却是解放後三十多年來的第一次。是歷盡艱難困苦，付出巨大的犧牲，用血和淚換來的結果。所以我在這裡特別要對那些多年來含冤含恨死去的老同志和朋友们致以深情的哀悼。他們在臨死之前留下的最後印象是：我們的社會主義是一個破破爛爛的窮社會主義；我們的作家、文藝工作者受到的是不公平的待遇……他們死得很悲慘，他們已經不能看見今天的一片光明、令人無比振奮的景況了。

我認為黨中央今天能夠響亮、果斷地宣佈：保障創作自由。說明了今天的黨中央充滿自信，十分強大；她不怕批評，而且歡迎批評。是比過去任何時期都更加信心十足的、更為成熟的黨中央。祝願她更加成熟和壯大起來。

「傻妻愛夫甚於愛黨」

我要談談「左」的路綫的危害，大家都知道，我的家庭是受極左路綫迫害的典型。我受的迫

害不想在這兒說，只說說我的妻子新鳳霞，她至今被「左」的迫害嚇得要命。新鳳霞應當被列為最受觀眾歡迎的演員之一，但是只是由於一九五七年我在黨「號召」和「啟發」之下提了一些意見，被打成右派，立即株連妻子，鳳霞被一位中央文化部的副部長召去談話，逼她和丈夫「劃清界限」，離婚，就可以入黨，反之就要承擔後果。鳳霞出身貧苦，在舊社會受盡苦難，因此對救命恩人共產黨感情深厚。但是這一回我這個傻妻子居然愛她的丈夫更甚於愛黨，竟敢斷然拒絕了部長的威脅利誘，部長大怒，把她逐出了辦公室，她一路哭出了文化部，接着就被劃為「內部」的右派分子。為什麼是「內部」呢？因為需要她演戲，她如果不演戲，劇院就賣不上票。從此以後，她開始了在台上演戲，在台下受罪的生活。往往在演出結束，觀眾熱烈鼓掌，歡迎她謝幕的時候，她已經去倒痰盂，清潔後台，以至於去打掃廁所去了。劇團裡任何人都可以欺侮她，直到文化大革命後期，在她備受折磨，挖了七年防空洞地道之後，受劇院領導直接迫害，左肢癱瘓，又被醫院誤診，至今成為半身殘廢。

鳳霞十分勤奮，努力學習文化，全國解放初期她基本是個文盲，但是現在已經寫了上百萬字的回憶錄式的文章，出了包括外文版的著作五六本，成為作協會員，並且出席了今天的代表大會

，她做出的成績將不會低於她當年作為演員的影響。

「我們受到的迫害至今沒有停止」

左傾路線對文藝界的迫害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但是，我們受到的迫害却至今也沒有停止。我只說說發生在不久以前關於我的一件事。一九八三年的八月以後，我在美國住了四個月，這期間，祖國大陸發生了驚天動地的禍事，就是在九、十月間搞了一場所謂「清除精神污染」的運動，這是一場居心把國家搞亂的瞎胡鬧，使得在美國的中國人，包括大陸的、台灣的中國人，以及和中國友好的美國人都十分擔心第二次文革就要到來。很多人都問：「中國共產黨怎麼了？發了瘋？」尤其是許多文藝界的頭面人物紛紛表態，支持這個不得人心的運動。當時我想：「同志們！你們受愚弄了！」你們給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丟了臉！你們真蠢！真丟臉！在美國的最後一個多月裡，我和另外兩個同志在六、七個大學應邀演講，所到之處都有人提出關於「清除精神污染」的問題，作為一個中共黨員，我不能避而不答。我的答覆是：「清除精神污染」可能是從大氣污染或河流污染演變、引申而來，但提出「清除」則是不科學的，因為即使是大氣和河流也不可能「清除」污染，何況是精神？提出這個口號的人，我認為是自身失去信心，至少是信心不足表現，因為他們忘記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即是任何一個健康的人都具有抵制污染的本能？除非他是一個奄奄一息的病人，稍有污染便會斷氣。除此之外，我認為，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她是在「精神污染」最嚴重的時代——帝國主義包圍中國，又是「精神污染」最嚴重的地方——資本主義泛濫的上海成立並且壯大起來的，因此她不會害怕什

麼「精神污染」。

在美國的講台上，我多次都是這樣回答的，看來提問者也都是滿意的，由於都只限於大學範圍之內，沒有發生什麼後果。但是在十二月末我路經香港回國時，香港文藝界召集了一個座談會，有新聞記者參加，又遇到了同樣的問題，我又作了同樣的回答。這一次情況不同了，很多家報紙發表了談話的內容，有一家報紙上甚至說到：「吳祖光說大陸的創作不自由……」我回憶當時情況，是一位記者問我對香港的觀感，我答說香港很好，記者要求我說得具體些，我就說：「香港很自由。」就這樣被引申為大陸不自由。即使這樣，我也沒有說錯，假如我們一向有創作自由，何必今天由中央來保障創作的自由呢？這就說明我們過去是不自由的。

「難道你不該受黨紀國法制裁？」

就這樣，在一兩個月以後，我在自己的工作單位，受到了一次查訊，文化部藝術局一位副局長找我談話，先是要我千萬不要緊張，什麼事也沒有。然而我感覺局長本人却比我緊張得多，因為形勢非比尋常，局裡的支部書記拿着紙筆在一旁記錄呀！局長說，有人提出來了，你在香港發表過一次談話，關於清除污染的問題，我們要問一下，報紙上發表的內容與你的發言有沒有什麼出入，可有歪曲原意的地方？我回答說，沒有出入，也沒有歪曲，只是簡略了一些，我說的要詳細些，具體些，既然你問我，我就對你也講一遍。確如局長所說，說完就完了，確實是「什麼事也沒有」。但是隔了一陣之後，我聽說中宣部對這件事發了內部通報，「內部」的，當然我不會看到，然而有人告訴了我。我的發言是公開的錯可以批評，發內部通報幹什麼？而且事情還不

止此，一位負責同志在一次什麼「座談會」上竟然提出，有人公開發言反對中央決議，應受法律制裁。顯然這就是對我說的。我不過是對這種不得人心的所謂「清污運動」說了自己的意見就要受「法律制裁」；你拿着一根棍子今天打這個，明天打那個，想打誰就打誰，難道你就不該受黨紀國法的制裁嗎？

「你們為什麼不發言？」

胡啟立同志的大會祝詞指出：有一些同志領導文藝工作，他們是好同志，但是工作沒有做好，有很多缺點，做了很多錯事，原因是他們不懂文藝。這說得很對，但我要補充一點：不懂文藝工作的同志領導文藝工作，發生缺點錯誤是可以理解的，也可以原諒、可以容忍的，但是我要說：懂得文藝工作的人，譬如他是個詩人，或是其它什麼藝術家、文藝內行來領導文藝工作，他做的壞事才更可怕，更可恨……

黨中央保証給我們創作自由，我非常滿意，甚至覺得已經超過了原來的願望。我是一個寫劇本的，照我們編劇的習慣，常常把全劇的高潮放在第三幕，或結尾的第四幕，但是我們這個大會，頭一天開幕就出現了高潮，這個戲就寫不下去了，因為沒有矛盾了。生活裡怎麼會沒有矛盾呢？這不可能呀。

我要問一下那些多年來堅持極左路線的同志們，你們對今天的形勢怎麼看？就在不久以前我們還在起勁地搞極左的那一套，跟中央對着幹，今天却一言不發，表示個態度都沒有？思想轉變能這麼容易嗎？一下子都跟我們站到一起來了嗎？這可信嗎？你們為什麼不發言？一個發言的也沒有！

我沒什麼可說的了。現在該你們發言了。

「第三梯隊」提法質疑

●于浩成

黨政不分的兩大問題

編者按：于浩成，男，六十二歲，是國內著名的法學家和政論家。曾任群眾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法學雜誌」主編、中國政治學會常務理事和中國法學會理事等職。近年來，于浩成發表了不少針砭時弊、打中專制制度要害的優秀作品。中共保守派視其為眼中釘，公安部黨委曾通報批評他，並迫其提早離休。

在今年初開展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中共保守派亦未放過于浩成。胡喬木等人不但點名批判于浩成，而且醞釀要將其清除出黨。

下面刊登的，是香港「鏡報」雜誌根據對于浩成先生專訪所整理的一篇文章。該文頗能代表于浩成的思想和觀點。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于浩成直接了當地批駁了「第三梯隊」的提法，這等於向鄧小平的權威進行挑戰，因為，大家都知道，「三梯隊」是鄧小平提出的中共接班模式。此外，在這篇談話中，于浩成還從法治觀點出發，對很多流行的錯誤論調進行了率直的批判。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法制建設有很大的進展，立法工作大大加強，八二年制訂了新憲法，許多基本法律也陸續公佈了。但是，如果從實現四個現代化的要求看，從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需要看，還是跟不上，還有相當的距離。在執法方面也有很多問題，許多人在黨與法的關係上沒有很好解決。當然，黨章講了，憲法也規定，黨也要守法，要在法律範圍內活動。但是，實際上往往受到習慣勢力的影響。在政治體制改革上也還有許多工作沒有完成。小平同志八〇年八月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中就指出，要「着手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現在實際上還有很多問題沒解決。

例如，紀律檢查委員會，是中央和各級黨委的，是黨內的，但整個經濟犯罪案件是由它來負責的，這就不只是管黨員的事了，黨外的也管了。實際上這是公檢法機關的事，似不應由紀檢委包攬。經濟改革以來，國家機關幹部違法亂紀的現象相當嚴重。可是迄今我們只有紀檢委，沒有國家監察部。爲了處理國家機關幹部的違法亂紀問題，似應考慮設立國家監察

機關。

又如，每年關於農村政策的第一號文件，都是由中共中央發出。當然，也都取得成功，非常好。但是，對涉及八億農民命運的大事情，為什麼只由黨的一個文件來解決？這樣的大事情，是否應當通過全國人大來討論決定？也許我這個想法太書呆子氣了。但既然要以法治國，就應當這樣做。憲法應當高於一切，大於



于浩成接受鏡報記者訪問

一切。全國人大應當是最高權力機關。有些文件常常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出，這就有問題了。憲法規定，國務院發出的決定、制訂的法規，如與憲法抵觸，可由全國人大或其常委會撤銷，現在你由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發出，怎麼撤銷法？撤銷不是反對黨了嗎，你還沒有這個權力，不好辦。

我覺得小平同志指出的解決黨政不分問題，很重要。這個問題在基層政制改革中也還沒有解決。現在把公社改成鄉了，但在鄉裏是鄉黨委第一書記管事，鄉長管事，還是農工商聯合體那個經理管事？三者什麼關係？始終還是沒搞好。我們不僅要搞經濟體制改革，還要考慮政治體制的改革。

經濟改革要伴隨立法

在立法方面，我不知道有無總體設計。現在是哪個部門要求立法了，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或人大法律委員會才來制訂。是不應當有一個總體規劃，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對經濟體制改革，有些領導人公開地講我們是「摸着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我覺得這是不行的。我很大膽地講，這是一個經驗主義的口號。怎麼能夠摸着石頭過河呢？還是那種邊設計邊施工的做法，將來出了大問題再翻工，損失就更大。這樣大的改革，應當有一個總體規劃，實施步驟；允許根據實際情況作些調整，但必須有總的規劃。根據我們自己的經驗，根據外國的經驗，總體規劃是可以搞出來的。不能心裏沒數，走一步看一步。改革是什麼樣子的呢？牽一髮動全身，這個改了，那個沒改，還是不行的，彼此妨礙呀。我們前幾年就是吃了這個虧。比如，物價改革要伴隨工資改革，但人事制度和幹部制度不改革，工資改革也搞不好。總之，我覺得，有了憲法（母法），還要有很多子法，改革才能有秩序地進行。

另外，立法工作現在看起來更多的是依靠官員，即各部門的幹部，而不是依靠法學家。當然憲法在制訂過程中是徵求法學家的意見了，但其他立法，徵求法學家的意見是很少的。這也是大問題。

破除法只管百姓觀念

更大的問題是，中國政法大學江平副校長也提到的（我們出版的《法律諮詢》最近一期刊登幾位法學家的發言，其中有江平的發言），「重刑輕民」的傾向。這不是現在才有的，長期以來就是如此。中國有二千多年的封建集權統治，是個行政管理的社會。過去的縣太爺既有行政權力又有司法權。現在，相當一部分領導幹部的觀念，認為法律是管老百姓的，唯一的法律就是刑法。其實，還應明瞭，人民是可以和政府打官司的，如果政府官員侵犯了人民的合法權益，人民可以要求賠償。這在很多幹部的觀念中是不可想像的。前幾個月，廣播了這樣一件事，北京市法院宣佈，環境保護部在一次民事審判中沒有出庭。外國記者馬上報導，一個地方法院聲稱中央的一個部違法，沒有在法律範圍內活動。這當然是非常對的。這

在外國本來是正常的，但在我們這裏成了大新聞。所以，我們要破除法律只管老百姓的觀念。直到三中全會，鄧小平講話中才提到，我們還要制訂很多經濟法律，政府與企業、企業與企業、企業與個人之間的關係也要由法律來調整。我們正是缺乏這方面的法律。上述三個方面的糾紛，我們的司法機關多無法受理。它們受理過刑法案，受理過一般民事案件，沒有受理過這樣的案件。比如，版權糾紛，至今無法打官司，只能由黨內、政府機關內來解決，找大幹部來拍板，誰官大，誰說了算。雖然他說的不一定合法，但他批了，就解決了。什麼事，都要靠一兩個領導人來拍板，這還是人治，不是法治。我這樣講，不是不要黨的領導，不尊重領導人，不是這個意思。而是現代民主法治國家已經解決了的問題。

像「法人」這個概念，過去一直是不承認的，直到去年還是前年，才說可以用「法人」。這裏面笑話很多。說明不少領導人對法律一無所知。有個領導幹部，人家問他什麼叫「法人」，他說，我們在座的都是「法人」，關在監獄裏的是「非法人」。現在正在召開全國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會議，以後，不懂法律的人恐怕不能當政府幹部了。國家許多事情上不去，就是幹部的素質、水平低，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還不是很快可以搞上去的。

「以法治國」竟引起爭論

「以法治國」這個提法，曾經引起很大爭論。直到幾個月前陳不顯在上海召開的全國政

法工作會議上提出「依法治國」後，才得以明確。其實，「以」和「依」沒有太大區別。但是在文件裏，在領導人的講話中不提了或少提了，有些人就懷疑起來，認為有問題了。其實，七九年彭真就講過要依法治國。五屆人大三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到依法治國。五屆人大三次會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中也講，我們要依靠社會主義法制來治理國家。這不就是依法治國嗎。我也寫過一篇文章，登在上海《社會科學》上。我說，彭真指出憲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這不也是依法治國嗎。有些人太教條了，唯上、唯書、不唯實。

沒有階級就沒有法嗎

另一個正在爭論的問題，就是法的階級性與社會性。很久以來，傳統的法學觀念都說，法是階級社會特有的現象，是階級矛盾的產物，是階級壓迫的工具；原始社會沒有階級，所以也沒有法律；將來進入無階級的社會，法律也會消亡，靠覺悟高，靠道德規範就可以了。事實上不是這樣的。我們認為，法是維護人類共同生活的必要規範；在階級社會中，統治階級利用法律作為階級壓迫的工具；將來沒有階級的社會，不能想像光靠道德規範就可以維持，還要有法這個人類共同生活的必要規範。不要法的構思恐怕是太理想化了。這個新觀點，在消除精神污染中被認為是錯誤的。因為法學界一些人士還是堅持老的框框不放。

其實，毛澤東就曾講過，一百年後還是要有法庭的。周恩來也說過，到了共產主義社會

，也是要有章程的。這個章程就是法。一位領導同志、理論界的權威，最近在一次講話中，也支持這個觀點，他也認為法不一定就是階級鬥爭的產物。八三年五月他就講過這個觀點。前兩天我遇見他，說他這個講話很好，問他可否公開發表，他說公開發表要整理，做出許多論證，現在沒有時間。我說目前持這種觀點的人還是少數。他說相信今後同意這個觀點的人會越來越多。

現在，持這種觀點的還是處於比較困難的地位。比如上海華東政法學院去年召開的一次討論會，六省一市的法律工作者參加。潘念之把這次討論的題目規定為「法的本質屬性的討論」。討論會作出的結論是，法的本質屬性就是階級性，沒有階級性就沒有法。整個討論會是個觀點佔壓倒優勢，其他觀點被認為是離經叛道。相反意見根本不能發表。

最近在廬山召開「法理」討論會，準備成立法理學會。我在會上散發了這位領導同志的講話，因為許多人崇拜權威，唯上、唯書，就是不唯實，不從實際出發。我的目的是想使我們的觀點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認為法的本性就是階級性的觀點，是五十年代以來一直佔絕對優勢地位的觀點。這個觀點既不符合實際，也不符合黨在三中全會以來的指導思想，完全是來自蘇聯維辛斯基那種僵化的舊觀點。其實，法不能只有一種屬性，它既有階級性，也有社會性。就是在階級社會中，有些法也沒有階級性。比如環境保護法、交通法規等，對任何階級都有好處的，怎麼能說

有階級性。

「律師是國家幹部」不通

有些問題也是說不通的。如「律師條例」規定律師是國家幹部，認為這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表現。我覺得是很可以懷疑的。如果允許人民和政府打官司，企業和政府之間也有糾紛要解決，你規定律師是國家幹部，那他只好替政府說話。為什麼不能讓律師當自由職業者？我們的框框還是比較多的。其實國家不必包辦一切。

像上面這些問題，我以為可以討論，公開



你知法不知法，嗯？下次再欺你老婆，我就把你捆起來！

王蔭華 畫

討論也沒什麼。

現行法律應允許討論

最大的問題是，現行的法律和政策是否應當允許公開的進行討論。這是長期以來就有爭論的。我也發表過文章，認為應當允許討論。既然要建立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既然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但是對國家大事，對現行的政策和法律反而不能討論，怎麼能說是主人呢？舊社會許多茶館寫上「莫談國事」，我們不能這樣吧！在中國法學會成立時，就爭論這個問題。楊老（楊秀峯）代表籌委會說，現行的法律和政策是不能討論的，有不同意見可以內部提出來。我提出這樣寫不好，是與我們國家的民主原則不相符合的。很多人反對。就這樣寫了，人民日報發表了。這對國家的形象很不利。人民對自己國家的法律、政策都不能討論，還能說是人民民主的國家嗎？我們要相信羣衆，不能認為一討論就亂了，就沒有法律尊嚴了，就不遵守法律了。不會的。執行法律是一回事，對法律進行討論是另一回事。如不允許討論，那麼我們制度的改革，憲法的修改，就都無從談起。非得領導上覺得要修改才修改，那人民的發言權都沒有了。

從未強調人民知情權

政治公開是民主政治一個很重要的條件。三中全會以來，政治公開的趨向比以前好了。過去，領導人的簡歷從不公開，現在可以公佈一些了。強調保守國家機密當然是需要的，但

我們從來沒有強調過人民的知情權。人民應有權獲取必要的信息。你要我進行選舉，那麼被選舉的人是個什麼人，做過什麼事情，有過什麼政績，應該允許問一問吧。當然，我們不能像資產階級競選那樣，花很多錢、吹牛。但是實事求是的向人民負責的介紹一些情況，則是完全應該的。這恰恰是我們所缺乏的。

領導人不應害怕輿論

現在正在起草新聞法，胡績偉領銜，開過兩次會，徵求過意見。我也參加了。有個內部刊物叫《新聞法研究》，出了四期了。現在看起來比較難了。原來我的信心就不是很大的，因為我曾寫過文章，關於出版自由的。後來受到批評，認為是搞自由化。事實上，一點也不自由化。我講了，自由不是無限制的、絕對的，自由是要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在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刑法也規定，煽動性宣傳、誣謗、造謠、污蔑、洩密等都要治罪的。我自以為說得比較周全了，結果還是被人認為搞自由化。說我既美化了資產階級的出版自由，又歪曲了社會主義的出版自由。但怎麼美化，怎麼歪曲，沒有說，就給我扣個帽子。當然，胡績偉講了，新聞法一定要是能夠保障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如果反而限制了言論出版自由，那不制訂還好一些。現在爭論還比較大，時機還不成熟。

報上點名批評的問題也是一樣。批評領導幹部與批評一般幹部或者普通老百姓，應該是一樣的。可是現在要批評一個幹部，就得經過



小曲好唱口難開

石嘉琦 畫

哪一級審批。這樣就受到很大的限制。

害怕民主，說到底還是四人幫的「意識形態決定論」。把意識形態的作用誇大得太厲害了。一言興邦，一言喪邦。比如，經濟損失幾個億，認為沒什麼了不起，說沒有經驗、交學費就完了。如果一篇文章提法有什麼錯誤，那就了不得了，說什麼政治影響不好了。好像有很大問題啦。實際上沒那麼嚴重。這種思想一直扭不過來。我過去在人民日報發表過一篇文章，講宣傳作用的限度，我認為宣傳的功能沒那麼大，雖然要重視它。毛澤東講，凡是推翻一個政權總要製造輿論。太誇大了，當然會有作用的，但更主要是看你的政策是否得到人民的擁護。一句話就能推翻一個政權，不可能嘛。自己要有信心，要相信人民，就不必害怕輿論。

犯罪沒有社會原因嗎

關於犯罪的原因，也是一直有爭論。傳統的觀點，提到資本主義的犯罪就說是社會原因，提到社會主義的犯罪，就說是個人原因。這種說法是不科學的。如果有人指出我們這裏的犯罪也有社會原因，就會給你扣上污蔑攻擊社會主義，給社會主義抹黑的大帽子。其實，我們認為社會主義的根本制度是無比優越的，但還不是完美無缺，我們的具體制度，也就是體制上還有缺陷和弊端，所以有必要進行改革。這些缺陷和弊端也就成爲製造犯罪的因素。魯迅早就說過：從來的犯罪學者大抵有兩派，一派主社會說，一派主個人說。但現在多是主張後者，因爲主張前者就要改造這個社會，那就危險、可怕了。（見《南腔北調集·論秦理齋夫人事》），魯迅先生講的是國民黨統治的舊社會，但他說的道理應該是有普遍意義的。我們全面、客觀地分析犯罪原因，而不是以單純、片面地指責犯罪分子爲滿足，這樣才能認真改進工作，做好對社會治安的綜合治理，減少和防止犯罪的發生。

反對「第三梯隊」的提法

對法治的前景，我是比較樂觀的。八二年通過新憲法，說明許多體制解決了。小平同志多次強調加強法制，說明高層領導是看到法制的重要性的。建立高度民主的現代化國家這個總任務總目標是不會變的。

現在主要的是對政治體制怎樣進一步改革。而最重要的是幹部制度、人事制度的改革。我非常反對「第三梯隊」的提法。由在位的領

導人選定接班人的做法，實際上還是「你辦事，我放心」。實際上還是封建主義繼承的辦法。這對於發現和提拔真正的人才是非常不利的。有些領導同志總喜歡順從、聽話的人，往往讓這些人接自己的班，對於喜歡提意見，能夠獨立思考的人往往覺得他們不可靠，看不順眼，這樣就埋沒了許多真正有才幹的人，而且給一些阿諛奉承的人，拍馬屁的人開了倖進之門。當前廣大人民羣衆對這種現象是很不滿意的。對於改革能否順利進行，改革成果能否得到保持，大家也很擔心。因爲事在人爲，選擇幹部問題確實是關係改革成敗的大事。大家認爲搞好幹部制度、人事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小平同志八〇年那篇《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演說，講得很好。真要照那樣做，非常好。他深刻地揭示了我們政治制度的種種弊端，權力過分集中、官僚主義、家長制、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都講了。總的來說，民主化的程度還很差。但領導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相信政治民主會逐漸開放。會更好地聽取民間的呼聲。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一些方針政策，和一些理論家的討論很有關係。七九年一、二月召開的理論務虛會起了很大作用。我是參加了。當時確實是暢所欲言，各抒己見，許多重要問題都提出來了。像終身制等問題都是那時提出來的。這種務虛會值得發揚。

現在的情況是，高層領導注意到政治民主要開放，也逐步在做，但阻力不小。

✻

北大學生日天安門遊行紀實

(北京) 龍秋堯

編者按：一九八六年底——一九八七年初的學生民主運動過去半年多了。我們刊登這篇「北大人」親筆寫的回憶稿件，目的是喚起人們對去冬學運的回憶和反省。

讀畢這篇詳盡的回憶錄，我們提出幾個問題供讀者和民運人士思考，以便為下次學運作好準備：

一、北大學生遲遲未上街的原因是「沒有一個合適的藉口」嗎？如果是，民運人士如何因時因地制宜地提出鼓動學生情緒的理由和口

一九八七年元旦傍晚七時許，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節目先後播出了兩條有關北京大學的消息。第一條是：北京大學舉辦冰上運動會，同學們在歡渡元旦。約莫隔了幾分鐘，又出現了另一條消息：一小撮人元旦上天安門搗亂未成，少數搗亂分子被我公安人員帶離現場。當時，中國人民從官方的傳播媒介中關於北大的這次遊行事件能知道的就是這麼多了。還有應該補充的是，晚間新聞聯播中還有一條孤立看來與遊行事件似乎毫無關聯的新聞：北京市的少先隊員今日清晨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過隊日，為紀念碑站崗。北大——天安門——紀念碑。習慣於從新聞報導的字裡行間去尋求事實真相的中國人馬上能夠發現這裡面有文章。可到底是什麼呢？

號？

二、為什麼北大遊行隊伍打出「支持小平，擁護改革」的標語？這一標語的製作背景、心理因素、策略考慮是什麼？

三、為什麼北大學生的遊行未吸引市民和工人的參與？工人是反感學生們的遊行，還是認為學生們的口號未能反映他們的要求？

本刊歡迎參與去冬學運的同學、研究生和教師們，就上述問題繼續給本刊寫稿，披露有關實情並進行理論探討。

一、「北大哪裏去了？」

自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旬開始，全國各地紛紛傳開了大學生示威遊行的消息：

「科技大學學生上街遊行了，要求民主選舉，據說還得到了校長的支持！」

「上海同學上街了，多的時候有好幾萬人，還包圍了市政府！上海市民在一旁放鞭炮支持他們！」

「南京同學遊行了！」

「昆明的同學也遊行了！」

「西安的同學走上了街頭！」

……

種種消息，自然也都傳到了北京。

北京的同學激動了。各地的消息不斷以大、小字報和傳聞的方式傳遍了北京高校的各個角落。全國都動了，北京怎麼辦？在爭取民主、爭取人權、推動改革的進程中，北京，這個中國政治、文化中心的青年公民們怎麼能甘落人後呢？

各校同學的眼睛都不約而同地盯住了北大——這個歷次學運的開路先鋒。

北大在幹什麼？在幹什麼？看看報紙就知道了：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北京大學舉辦藝術節。同學們每天都在唱歌、跳舞、看演出、聽音樂會，當然，還有一天數場電影。名符其實的歌舞昇平氣氛。人們驚訝地瞪大了眼睛：北大啊北大，你這是怎麼了？

北大有自己的苦衷。固然，歷次學運，甚至包括解放前的學運，北大從不落後，而且十有八九要領頭。北大被人們視為中國民主的「解放區」，這是北大的驕傲和光榮。可是，全國又有幾個人能知道，一九八六年的全國學運，已由北大在一九八五年的「九·一八」運動中開創了先河呢？北大入黨時孤掌難鳴，學運悄沒聲息地被壓了下去。歷史系兩位同學的被捕，同學們至今還記憶猶新。再說，遊行總得有個稍微具體些的理由吧：為選舉，為放人，為排球隊贏，為足球隊輸，或者哪怕為食堂、為宿舍也好呢！總之，要遊行的話，總得需要一件能吸引同學們注意，激起共同情緒的具體事件。僅僅為了響應外地同學而遊行？那非但不能引起巨大的社會反響，反會顯得北大人沒有頭腦。北大人不願意這樣。

可是，清華同學遊行了，從清華走到人大；師大同學遊行了，從師大走到北大。兩支隊伍都穿過了北大，可北大似乎依舊無動於衷。破天荒第一次，北大在學運中受到了高層領導的表揚。

外校同學的嘲諷與憤怒可想而知。還有那些個報紙和電台，一天又一天地告訴全國人民，北大是一片寧靜的樂土，「充滿着學習氣氛」。北大人聽了心裡真不是滋味。北大該怎麼辦？真要獨立於這次全國性的學生運動之外？同學們不甘心。可是，在全國學潮蜂湧而起的形勢下，如何才能舉行一次並非普通的、而是為世人矚目的遊行呢？自從七八、七九年的西單民主牆運動以來，北大人就不斷地高喊着自由、民主、人權的口號，而現在他們更需要的是具體的目標：這樣他們才能實現專制制度的正面衝突，才能在這種衝突中真正見個輸贏。

幸運的是，政府在這種時候總是要出來幫忙的。上海「一二·一」遊行之後不久，北京市人大常委會頒布了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規定，

簡稱「十條」。

二、「修改十條」

衆所周知，中國是一個沒有現代法律的國家。

幾年前，有一位業餘辦刊物的人想將他的刊物從「地下」轉為公開，因此便到出版局登記去了。那裡的負責人拿出了一份一九五〇年頒布的「出版暫行條例」來，指着上面的條文問：這裡規定凡出版刊物要有兩家舖子作保，你有嗎？就這樣，這位辦刊物的人只好悻悻離去，繼續「地下」出版他的刊物，直至因此被捕。

憲法規定了出版自由，却沒有出版法；憲法規定了遊行自由，却没有遊行法。沒有具體法律為前提，事實上是不存在憲法所宣稱的自由。而在今天，在學生起來行使憲法賦予公民的自由權利時，却頒布了「十條」這類以限制遊行自由為核心內容的法律。這只能說明，當局在阻擋不住民主潮流時，甚至想利用法律來剝奪憲法賦予我們的自由了！因此，限制遊行自由的法律——「十條」——恰好給了北大人最好的遊行理由。

不僅僅是理由。「十條」的頒布為激發同學們長久壓抑在心中的憤恨提供了一個突破口。

「為什麼不許去天安門遊行？北洋軍閥也擋不住學生上天安門！」
「憑什麼讓公安局來擺布我們的遊行權利？中國是警察國家嗎？」
「遊行還要有人出面組織、登記？想打出頭鳥？」

還真有出頭鳥。有幾名研究生，還是黨員，就登記組織遊行去了。據同學的傳說（這也算是「組織秘密」吧），他們在黨內受到了警告，被迫撤回了申請。

無論如何，讓遊行的批准權以及規定行走路線的權力操在警察（北大人呼之為「狗」）手裡，實在令人難以容忍。中國警察之愚蠢、蠻橫、殘暴、目無法紀，人所共知，以至於平民百姓等說到警察無人不談虎色變。於是，一兩天之內便有小幅標語出現在北大的樹窗上：

「元旦大遊行！」

「元旦天安門見！」

標語自然很快就被撕掉了。不過看見的人還是不少。其中就有「美國之音」的記者。當晚「美國之音」的廣播說，北京大學有人貼大字報，宣佈元旦要去天安門遊行。

這未免有點小題大作了，貼這種小標語是同學們一種洩憤的表示，充其量也只是一種號召。還沒開始動員、組織，怎麼就算是「宣布」了呢？不過，還有更加小題大作的呢。第二天，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清晨的「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上代表國家機關鄭重宣布：北京大學有人宣布元旦要去天安門遊行，某外國電台也作了煽動性的報導。元旦那天，「誰敢去我們神聖的天安門廣場搗亂，定將嚴懲不貸！」

這下可麻煩了。北大人面臨着一種非常困難的選擇。去遊行嗎？那要冒着難以想像的風險：凡是對中國政治稍有理解的人，都不會誤解「嚴懲不貸」的意思，那意味着毆打、逮捕以及隨之而來的花樣繁多的人身迫害。不去嗎？全國，不，全世界都知道北大人元旦要去天安門遊行了，我們怎能讓北大丟這個臉呢？！

儘管大部分同學仍在猶豫，北大人還是迅速組織起來了：系、班級、同鄉、好友、同樓道……聽其自便。在一九八六年最後幾天中，同學們用包括大、小字報在內的各種方式，對是否去遊行、遊行的方式及口號展開了爭論。

有的同學說，我們一定要去，只有這樣才能顯示出我們爭取民主的力量和決心。

有的同學擔心：這樣一來，是不是會給黨內的保守派提供阻止改革的更多口實？

有的同學提議：我們要打出支持改革派的旗號，向保守派顯示民意！

有的同學設想：我們是不是能採取聯合全國同學，與中央進行直接對話這類更有效的方式？

直到十二月三十號，同學中仍舊意見紛紜。一時看來，似乎不去遊行或不去天安門遊行的議論佔了上風。可就在這天，學校的幾個大門外忽然都停上了警車，上面赫然安裝着錄像設備。校園之內也不斷有警車在穿梭行駛。

十二月三十一日，風聲更緊了。上面傳來消息，說武裝警察部隊已經嚴陣以待，學生只要出來，必定有逮捕和流血事件發生！從中央黨校回來的校友報告說，王震三十號下午在黨校大會上拍桌子大罵，聲言要殺一批學生、教授和知識分子；電台和報紙上又出現了久違的「階級鬥爭」字眼。四周一片肅殺之氣。北京市各單位都已經向各自的職工傳達說：元旦那天可不要上天安門，否則被抓進去「說不清楚」！

就在這種情況下，一批血氣方剛的同學作好了準備，拼着自己的身

家性命去和專制制度打一場正面戰爭。更多的同學雖然有別的考慮不準備參加天安門遊行，但在對同學命運的關切的督促下，準備到現場去看看事態如何發展。於是，從一月一日凌晨開始，同學們便陸續向天安門進發了。不少人懷中揣着寫好的標語，那是大家一起擬就的，核心內容是：(1)支持鄧小平繼續改革；(2)民主、自由、人權；(3)修改「十條」。

三、「北大，不怕」

一九八七年元旦，北京天色灰暗，冷得出奇。

一清早，天安門廣場上就出現了幾件異乎尋常的事情。首先引起人們注意的，當然是那數千軍警。天安門廣場被結實地圍了三圈：廣場內側馬路，外側人行道，以及歷史博物館和人民大會堂外面，密密麻麻，儘是身着綠衣的武裝警察及身着皮外衣的「民警」。仔細一看，在警察包圍之下，還有一大群戴紅領巾的小孩子，手拉手地將人民英雄紀念碑圍上了一圈，組成了最後一道「防綫」。每個孩子的臉都被凍得通紅，雙腳不住地跺地。呆長一點的人都看見，這道「孩子牆」半小時換一班，更仔細點還會發現，廣場裡面結上了厚厚的一層冰，地面滑得不要於溜冰場。奇怪的是，這些天北京並無雨雪。前晚去過的人明白，這是夜間數輛洒水车不停工作的結果。

廣場北面靠馬路的邊上，從清晨起便堵上了一大堆學生。

廣場進不去。據說是要讓小學生們在紀念碑前過隊日。真是奇怪，小學生過隊日與其他公民進入這一公共場所又有什麼衝突？並且，百餘孩子過隊日為何要出動數千軍警來保護？想出這種下流招數的人無非是想用無辜的孩子來組成人牆，阻擋學生的示威遊行罷了。他們還恨不得趁亂打死打傷幾個小孩，以此來栽贓學生「破壞治安、行兇殺人」呢！針對這種卑鄙的行徑，同學中立即有人發出了呼喊：「誰能承包紀念碑？」

天色漸漸大亮。廣場上人群越聚越多。人數最多的是警察，在場的有幾千人，連同守候在近處據點內不斷出來換班的，總有上萬人之多；其次是大學生，以北大同學為主，有那麼七、八千人；還有一些普通市民，中間夾雜着為數不少的便衣——每人脖子上掛一個日本進口的「尼康」相機，帶長鏡頭，專門照人臉。

人群無聲無息，只是不斷聽到警察的吆喝聲：「快走快走！呆在這



北大學和警察發生衝突

裡幹什麼！」隨着警察的驅趕，人群形成了一股股方向不同的人流，但總在廣場四周徘徊。

九點多鐘，廣場北側響起一片「不許抓人」的呼聲。有兩位同學在試圖進入廣場時被抓走了。

十點多鐘，「國際歌」聲在廣場東側歷史博物館門前響起了。雜亂的人堆裡逐漸顯現出一股潮流，同學們開始了衝破警戒綫遊行的嘗試。

廣場四周的警察迅速包抄了過來，在歷史博物館附近組成強有力的包圍圈，遊行隊伍被困在一條狹窄的路上無法施展，人群逐漸散了開來。

隊伍散了，人卻沒散。大家既懷着希望又懷着恐懼在期待着。廣場四周的人行道、欄杆，甚至垃圾箱和電綫竿子上都擠滿了學生和觀望的市民。

中午十二點多，正是午飯時候，警察們從深夜守候到現在，也有些不耐煩了。突然，廣場東北角形成了一支龐大的遊行隊伍，約莫有兩千餘人。剎時間，隊伍中的同學舉出了事先寫好的標語，有的寫在塑料布上，有的寫在床單上，更多的是寫在普通的紙上。隊伍領頭的是一條寫在粉紅色塑料布上的大橫幅，上書「支持小平，擁護改革」，由十餘個

同學一起舉着。——順帶說一句，以平民百姓的身分稱鄧小平為「小平」，也算是北大同學的一項創舉吧。一九八四年國慶遊行隊伍中打出「小平您好」的橫幅的，也正是北大人。同學們希望能以「支持小平，擁護改革」的標語來向保守派們表明：我們不希望中國的改革倒退！同時更向很可能正在監視屏幕前觀看學生遊行的鄧小平本人表明：我們不希望鄧小平本人後退！

遊行隊伍組成後，同學們挽着胳膊，高呼口號，但卻並沒有如事先宣布的那樣衝進軍警雲集的天安門廣場，而是掉頭東去，衝向了東長安街。

一切都亂了套。警察的任務是不讓學生進入廣場，進去便抓。但是，東長安街卻不在他們預定的防守範圍之內。旁邊簇擁着大批旁觀者的遊行隊伍，一直朝王府井街口衝去。一輛警車急忙跟上，也顧不得如此拋頭露面是多麼惹人討厭，警察就站在車上公開錄像。當然，錄像、照相的還有一批同學生一起挨了半天凍的外國記者。

也許廣場上等了半天的一些打人慣家會感到失望，埋怨這些學生們「得以像洋洋河水，如何只朝東！」害得他們無事可幹。但是，當隊伍走到了王府井路上附近時，突然，整個隊伍一下子刷地向後轉，以頭作尾，以尾作頭，朝來路——天安門廣場衝去！

廣場上的警察終於等到這一刻來施展自己的平生所學了。警車門開着，前面的同學被一個個拖上了車。有不肯上車的，被飽以老拳——那是一種受過特殊訓練的打人方式。一下又一下的鈎拳，穩、準、狠地打在了人的臉部、腹部。還有些警察，乾脆動用了他們那著名的大頭皮鞋。警車很快被裝滿了。

遊行隊伍在前頭的同學被抓後，最終被衝散。以上是元旦中午一時十五分的情景。

被抓的人還不止這些。下午三點左右，便衣警察也開始動手，留在廣場上的同學又被抓了一些。前後抓去的人共計五十餘名，其中有三十名北大學生（包括三名女生）。

這個陰鬱的日子裡並非完全沒有可資發笑的事情：有位被捕的同學回來後說，抓他的人就是在他身邊與他挽着胳膊遊行的便衣，此人還領頭呼口號、唱國際歌呢。

四、「還我同學！」

元旦下午，從天安門陸續返校的同學心裡都斷定：一九八七年的一月一日將作為黑暗的一天載入北大、也載入中國的史冊。當然，這一天還剩下五分之二的時間，可是當時誰也不覺得這樣的結論下得太早。該如何救回被捕的同學？該如何對付必將到來的鎮壓？誰心裡也沒底。

晚上八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將所謂「二百餘人上天安門廣場搗亂未成，公安人員將部分人帶離現場」的消息傳給了全國，也傳給了沒去天安門的北大同學。一時間，有同學被捕的消息馬上傳開了。

新聞節目剛過，北大通常貼大字報的欄窗前便有人開始高喊：同學被抓了！同學被抓了！附近幾座樓的同學聞聲下來，紛紛相互詢問：哪個系的？被抓了多少？答曰：力學系，五個！物理系，四個！社會系，兩個！歷史系，一個！……人群越聚越多，同學們高呼：「找校長！找校長！」擁到了燕南園丁石孫校長家門前。校長不在，正坐鎮學校辦公樓。

隊伍又繞過了幾座宿舍，人流益發龐大了，大家擁到校長辦公室所在的辦公樓前。

校長很快出來了，架起話筒便向同學表態：我們一定要儘快把被捕同學接回來！請各班級迅速報上被捕名單！（當時報上去有二十二名，另外十名同學的被捕一時還無人知曉。）學生代表上台，正式要求：（1）馬上釋放被捕同學，回來後不許有任何迫害行為；（2）報紙、電台等傳播媒介必須向人民公正、客觀地報導這次遊行的情況。如果這些條件不被接受，我們明日就罷課！底下頓時一片響應之聲，同學們高喊：罷課！靜坐！示威！絕食！人群中掀起了兩道寫在床單上的橫幅：「天賦人權！」「還我同學！」白底黑字，挽聯般地慘人。

校長答應道：我們正在與上級聯繫，兩個小時內一定給答覆！這當口，天上飄下了鵝毛大雪，本想靜坐等待的同學被凍得無奈，便高喊「走，繞校遊行去」，以便在保持情緒的同時也保持溫暖。

大約有七、八千同學衝出了北大西校門，一路繞行到宿舍區的牆外。他們的歌聲和口號聲吸引了留在宿舍裡的同學，大家紛紛跑出校門，有的人性子急，乾脆翻牆出來了。在牆外看到北大學生宿舍的確蔚為壯觀：各房間都是燈火通明，可窗戶上却不見一個人影——北大一萬四千多名同學中，除了一些假期回家的北京同學外，絕大多數都出來了！

本科生、研究生，還有不少剛畢業不久的青年教師，組成了一支萬餘人的隊伍，直奔中關村而來。這裡，向左去清華，向右是進城的道路。

來到這裡，大家驀然發現，右邊的馬路上攔着一隊身着皮外衣的警察，在後面警車射出的耀眼光中，似乎是一排幢幢的鬼影。

這確是令人心驚。警察會幹什麼？會開槍？會動棍？會抓人？誰也不清楚。前面的同學不知道該怎麼辦。他們停下來，與警察相隔一米對峙着，不斷地在呼喊：「反對暴力！還我同學！」

後面的大隊人馬都不知道前面有情況，他們正走得來勁呢。人潮壓了過來。前面的同學立腳不穩，被推向了警察的隊列。一剎那間，誰也不知道將會發生什麼。

忽地，警察閃開了，遊行隊伍竟然無恙地衝開了警戒綫，後面的同學甚至根本不知道前面發生過的事。從這時候開始，籠罩着遊行隊伍的那種沉重、壓抑、悲憤的情緒逐漸緩解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種團結起來以後的興奮、充實感，以及對自己力量的信念和必勝的信心。同學們接連衝破了五道警戒綫：中關村、友誼賓館、白石橋、百萬莊以及釣魚台國賓館。警戒綫越過越順利，同學們也越來越興奮，一路上除了不斷地高呼「還我同學」「民主萬歲」「自由萬歲」等口號之外，還向警察呼叫：「團結警察！」「警察同志新年好！」「警察同志辛苦了！」警察們的臉上照例木無表情，看不出來他們到底是喜還是怒。

當隊伍突破了封鎖綫衝出校門經過黃莊時，副校長沙健捷乘着警車趕了上來，費勁地向同學們解釋說，已經和「上級」聯繫上了，準備釋放同學。大家明白，這種許諾對「上級」沒有任何的約束力，因此隊伍便不予理睬，照樣前進。經過人大門口時，一大批人大同學衝出校門加入了遊行隊伍（人大也有兩位同學被捕了）。這時，一些外國記者也聞訊趕來錄像、採訪，大伙兒走得越發發精神了。

到了白石橋（大約是晚上十一、十二點），副校長的車子再次趕到，宣稱公安局已準備馬上放人，校車也出發接同學去了。聽到這一消息，一批後面的同學轉回了學校。可是，有八千到一萬人的隊伍仍在前進，大家準備一直走到天安門，靜坐到我們的同學確實放回為止。

大雪不斷地下着，天氣異常寒冷，地上積雪有兩寸厚。走過百萬莊，不遠的前方便是釣魚台國賓館。這時，不知從什麼地方忽然鑽出來一輛洒水车。水車往地上一洒水，積雪的路面頓時一片泥濘。同學們氣憤已極，對着洒水车 and 路旁的警察高喊：「卑鄙！無恥！卑鄙！無恥！」水車很快便溜走了。固然，這輛洒水车很可能是市政部門派出來洒鹽水化雪的，可這時的同學都在氣頭兒上，寧可相信這水是衝着自己來的，一時間，本來因為疲倦已經有些鬆散的遊行隊伍又激昂起來。



大字報列出了示威時被捕學生名單

走到釣魚台國賓館時，副校長的車子已經橫在馬路邊了。他在車中不斷地對遊行隊伍呼喊：「同學們，我是北京大學副校長，我對你們說話是負責的，被捕同學半小時前已經全部返校。」在這一遍又一遍的喊話聲前，絕大部分同學停下了脚步，心頭一陣興奮與輕鬆。被捕同學自由了！我們勝利了！是啊，縱觀中華人民共和國幾十年的歷史，我們的政府無論做錯了什麼事，又何曾對人民服軟過、認過錯？什麼時候聽說過有因為得罪政府、黨、官僚而被捕的人在僅僅十二個小時中就被放出來？中國監獄的原則不是一向「只有錯放的，沒有錯抓的」麼？哪怕是寬得不能再寬的人，被放出來時誰不得表示感恩戴德？可是今天，一九八七年的第一天，我們却卡着「無產階級專政」的脖子，讓它把吞下去的肉再吐出來！

凌晨三時許，同學們乘坐着北京市政府從各處調來的汽車，高高興興地返回了學校。還有最前面大約數百至一千人的隊伍沒聽清消息，徑直走到天安門廣場，靜坐至清晨六時許。如果當局不是「當機立斷」馬

上放人的話，靜坐在天安門的人就不會是一千，而是一萬，並且也不會
在清晨六時便離開。

五、「紙船明燭照天燒」

元月二、三日，中國的廣播和報紙中有一條令局外人摸不着頭腦，讓知情人笑破肚皮的消息，說北京大學校園內是「一片寧靜的氣氛」，可不是麼，哪天也比不上元月二日早上寧靜，走遍校園也找不出幾個早起的學生。的確，元旦遊行晚上累壞了。

對於元旦的遊行究竟是失敗還是勝利，究竟起了什麼樣的作用，取得了什麼樣的成果，以至於對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前途是悲觀還是樂觀，每個人都有不盡相同的看法。但有一個事實是確鑿無疑的：在當局事先已經宣布這類行動為「非法」，發出「嚴懲不貸」的警告，並在現場佈置下了種種圈套、羅網以及監視、鎮壓機器的情況下，同學們勇敢地衝了上去！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確是「史無前例」的。過去，人民的「聚眾鬧事」（包括這次安徽、上海及許多地區的學生遊行）都是發生在當局猝不及防，或在他們想試行一下懷柔政策而舉棋不定的時候；而今天，中國的青年們（並且是一群已躋身於全國「最高學府」，有着他人艷羨的輝煌前途的青年）竟是有計劃、有組織地撞向了「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以自己的血肉築成了一道民主、自由的新長城！當然，「無產階級專政」這架絞肉機立即吞下了一批敢於「以身試法」的人，可是在全國民主浪潮一浪高過一浪的今天，它的鋼牙第一次挨了咯。是的，也許我們不幸還要和它打上幾十年的交道，但是我們已經不怕它了！環繞着它的無論是聖靈的光環還是陰森的迷霧都已經被一掃而光，剩下的只是它的本來面目：一架由暴君操縱的、噬血的、但却是老朽的機器。

遊行雖過，但事情還沒有完。元月二日始，在一部分同學的號召下，校園中開始張貼被捕同學的名單。「請記住他們！」是的，必須記住他們。記住他們，保護他們。嚴防「秋後算帳」。我們的政府，可以說是世界上對它的人民最沒有信譽的政府了，因此，我們必須保持團結，以保護我們自己。果然，「算帳」很快就開始了。外校被捕的同學紛紛遭到了各種厄運（由於外校被捕的人既少又分散，具體情況至今不清楚）。然而，北大的被捕同學暫時還安然無恙。不過我們要注意：現在還沒到「秋後」呢！

還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輿論。對於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共產黨官方宣傳機構歷來極盡造謠誣蔑之能事，而似乎無人能奈何他們。果不其然，這次他們又循例出動了一切宣傳機器來攻擊、咒罵學生，造謠生事，甚至還動用了他們的「光榮傳統」——從「文革」的武庫中揀出來一大堆「階級鬥爭仍然存在」，「一小撮人」，「打着紅旗反紅旗」之類一聽便頓時讓人倒胃口。據說甚至鄧小平看到這些以後也大為光火，那大概是讓他想起了自己當年作為「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時在報紙上所受到的待遇吧。

同學們決定以牙還牙。既然中國宣傳機構在「反自由化」中拿學生開刀，那麼同學們也就決定要拿一家這次表現得最惡劣的報紙開刀——在這方面，公推「北京日報」。

「北京日報」是北京市委機關報，其頂頭上司乃北京市委書記徐惟城。據說此人正在覬覦中宣部長的職位，因此有意在「反自由化」中用油墨染紅頂子。他出馬組織了一個龐大的「大批判班子」，在「北京日報」上連篇累牘地登載撒潑罵人的流氓文章，將「北京日報」社弄成一個鮑魚之肆。對這種報紙怎麼辦？一個字：燒！

一月五日中午，北大的同學們再次聚集廣告欄前，公開焚燒了大批「北京日報」。在場的還有數家外國電台、電視台的記者。同學們從各處搜集來了成批的「北京日報」，在路中央燃起了熊熊大火。旁邊二十八樓的同學覺得還不過癮，將報紙粘成一大串，用毛筆字寫上「北京日報」的字樣，從樓上吊將下來大燒特燒。一時間紙灰滿天飛，歡呼聲四起，大家好歹出了一口惡氣。的確，對那些一貫盜用人民的金錢和名義，以造謠、誣蔑、迫害為能事的新聞機構，過去誰敢說過半個「不」字？這些以欺騙、愚弄、恐嚇人民為職業的宣傳官僚們，又何曾受過這種嘲弄？

不過，也虧得北京市宣傳部門的人天生一副厚臉皮。在北大同學燒報後，他們第二天竟有臉對人民說：被一些「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所仇恨，這是他們的「光榮」！真是登峯造極的恬不知恥！

但是，無論在臉上怎樣擠出一付「光榮」的微笑來，專制統治者和他們的爪牙這次都不得面對這樣一個事實：他們在中國已是民心失盡了。如果說，在毛澤東時代，統治者還可以對人民大開殺戒，使人民噤若寒蟬，而後在報紙上高唱「全面勝利」凱歌的話，那麼，今天這批三流君主們都只擺出一副流氓無賴的面孔，幹些拿孩子當人牆、往地下潑水之類的事，然後，被人揪了辮子却還稱自己是「天下第一」敢於為

此而「光榮」的人！

毛澤東氏有詩曰：「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 ※ ※ ※ ※ ※

在中國歷史博物館近代史部分參觀時，人們常常會發現有些年輕人停下脚步，向戊戌變法時興辦的「京師大學堂」（北大前身）的牌子鞠躬。那多半是北大的同學。最令北大大人驕傲的是他們的傳統——自由、民主、科學、愛國，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這一傳統推動着北大人在中國歷次重大的學生運動中都充當了重要的角色。這一次的元旦遊行，北大人為一九八六年的學生運動作了一個精彩的結尾，一個令專制政權望而生畏的結尾，一個表示我們這一代人擺脫了恐懼的結尾。我們用行動告訴那些妄圖讓專制統治長治久安而每日用「四個堅持」和「安定團結」來壓制我們的人：你們數十年統治的結果、你們統治的幫兇——人們的恐懼，已經開始消失了！聽到過喪鐘響嗎？這就是！

環球汽車修理行

地址：112-21 Roosevelt Ave.
Corona NY, 11368

電話：(718)429-1400
(718)429-1442

華人經營

精修各種引擎、線路、
板金、噴漆、換油、保
養、舊車買賣、歡迎比
價。

小閩主持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六上午八時至下午七時



論 言論自由(上)

胡平

關於重新發表《論言論自由》的說明

——本刊編輯部

胡平，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著名活動家和理論家，現在哈佛大學政治系學習。「論言論自由」是胡平最重要的代表作。這篇文章的第一稿寫于一九七五年七月，一九七九年二月寫成第四稿，發表在當時北京的一家民辦刊物「沃土」特刊上。第五稿完成于一九八〇年初，最先以油印形式作為他的競選文件而廣泛流傳于北京大學，該油印稿轉傳到海外，香港「七十年代」（即後來的「九十年代」）在一九八一年第三、四、五、六期連載。美國的東亞人權保障協會將該文譯成英文，發表在「

SPEAR HEAD

一九八二年十二、十三期

合刊上。一九八六年，這篇文章第一次以鉛印形式在國內公諸于世，武漢的「青年論壇」雜誌一九八六年七月號、九月號兩期連載。然後，「青年論壇」在北京組織了一場有老中青共四十多位學者參加的關於「論言論自由」的專題討論會，座談會紀要發表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號「青年論壇」。當時國內同時有五家以上的出版社希望出版「論言論自由」的單行本，湖南人民出版社將其作為「駱駝叢書」中的一種，甚至已經製好紙型。今年一月，國內形勢突變，「論言論自由」單行本出書計劃被取消，湖南人民出版社總編輯朱正遭到解除職務的嚴重處分。「青年論壇」雜誌也被下令停刊。

「論言論自由」一文是當代中國政治思想史的一篇重要文獻。它從第一次問世就受到人們的熱烈讚揚，隨着時間的流逝，這篇文章的意義不但沒有減退反而愈加顯明。人們評價這篇文章是「中國關於思想自由一類問題的最重要的論著」，代表了「青年一代的思想水平」

，稱讚這篇文章「寫得雍容典雅，富有理論魅力，」堪稱「現代中國的人權宣言」。認為它的風格「很相近於歐洲啓蒙學者的論辯文章」，同時又非常「適合中國的國情，抓住了當代中國人的心理」。「它的價值，在今後的幾年、幾十年或上百年將會看得更加清楚」。

可以想見，像這樣一篇好文章，勢必會招致中共黨內那批專制主義者的無比嫉恨。據悉，有的保守派人物在讀了這篇文章後不得不說它是「無懈可擊」，因此千方百計地對這篇文章進行封鎖。胡喬木、鄧力群在中國社科院黨組一次擴大會議上點名批判胡平和這篇文章，「紅旗」雜誌等報刊前後共發表了好幾篇文章進行批判。但是他們作賊心虛，始終不敢讓這篇文章被更多的人所讀到。去年七月，「青年論壇」開始公開發表「論言論自由」。之後不久，「紅旗」雜誌又發表了一篇題為「對『自由』問題的反思」的長文，對胡平文中的觀點進行批判，據說這篇文章甚至還得到黨內某位最高領導人的肯定。然後，胡平又在「新觀察」上撰文對「紅旗」雜誌那篇文章的主要錯誤進行了簡短有力的反駁（反駁文章和「紅旗」雜誌的文章都收在一九八六年第十二期「新華文摘」）。在去年下半年的政治改革熱潮中，胡平表現得非常活躍，他出席了多次大大小小的討論會并在北京、武漢、成都近二十所大學作了關於言論自由的講演，反響相當強烈。胡平的「論言論自由」一文，不但受到了廣大青年的熱烈贊同和理論界的廣泛支持，也贏得了中共黨內一批較開明的人士的同情與肯定。

我們認為「論言論自由」一文的最重大的

意義在于，它給生活在極權主義社會中的人民擺脫極權統治提供了一個十分寶貴的方式。正像胡平在一九八〇年北大就選時的競選宣言中寫到的那樣，「在對奕中，誰不願意讓自己的棋子一下子布滿整個棋盤，但我們只能一步一步地走。因此，重要的問題不在於我們要說些什麼，做些什麼，而是我們要先說什麼，先做什麼。」在接受香港「百姓」雜誌採訪時胡平談到過他在「一九七五年開始寫作「論言論自由」的動機，他當時認為，中國必將出現一個類似於蘇聯東歐發生過的「解凍」，如果我們搞得不好，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取得一些實質性的進步，「比如圍棋，先做上兩個眼，就活了」。因此，在短暫的「北京之春」的那段時期，他既不像有些人那樣對中共上層改革派抱過多的幻想，以為他們會自動地推行自由民主，同時也不像另一些人那樣急于對具體的時局進行激烈的批判，而是努力利用「解凍」時期所特有的動搖不定作那些更基本、更深層的建设工作，努力為人民爭取民主奠定一個堅實的地基。按照他的觀點，在運用言論自由之前，首先要爭得言論自由，也就是說首先要讓言論自由。在最近發表在「百姓」雜誌的一篇文章裏，胡平進一步談到他強調言論自由的原因：

「一、關於言論自由的原則是簡單的，稍有常識者即可正確領會。

二、它是明確的，很容易鑒定，不容易混充。……假如一個政府宣布它保障言論自由，但是在它所有的報刊雜誌書籍會議電視廣播上都聽不到重大的不同政見，那麼它顯然是說謊。

三、它對於極權主義是一種致命的攻擊。希臘神話中的英雄阿基里斯由于浸過神水而

全身上下刀槍不入，但是他的腳後跟却由于不曾浸泡過因而承受不住攻擊。極權主義的致命處就在言論自由這個問題上。一方面，它借助於全面地控制思想而變得無比強大，另一方面它又由于不能公開地否認言論自由原則而暴露出自己極為虛弱的一面。一旦失去了對人們思想言論的嚴密控制，極權主義就喪失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四、即便是那班處心積慮的極權主義者，也無法公開拒絕言論自由的原則。這就使得他們在關心言論自由問題上不得不處于劣勢、弱勢，而且必然會節節敗退。

五、言論自由原則對於大多數人具有最大的說服力。它不像其它一些往往是更激烈的主張，很容易引起一些人不無道理的疑慮，特別是關於必要的社會安定的擔憂。沒有人會相信有了言論自由社會便會陷于混亂的無稽之談。

六、明確地、公開地堅持言論自由原則，并不需要過人的勇氣，這就能讓更多的人，包括那些素來謹慎小心的人們也參與到抵制強權的正義鬥爭中，從而構成一種強大而溫和的

序言

本文旨在論證言論自由，這一工作具有某種別致之處。在完全沒有言論自由時，進行這種論證恐怕是不可能，然而，在完全實現了這一自由時，論證它似乎又成爲不必要。這個特點常常引起人們的誤解：以爲言論自由問題是一個取決於當權者意志的問題。這種誤解導致

壓力，有力地推動我們的國家向着真正的自由邁進。」

這些年來，國內民主運動的蓬勃發展，言論自由已經成爲其中最響亮的一個口號。越來越多的人們意識到，把爭取言論自由列爲首位，對於我們推進整個民主運動有着重大的戰略意義。可以相信，在今後的爭取自由的鬥爭中，胡平的「論言論自由」一文也將發揮更爲深遠的影響。

考慮到許多人，特別是許多海峽兩岸的留學生還沒有讀到過這篇文章，本刊特決定重新發表，以滿足更多的讀者的需要。

正值國內討論政治改革之際，本刊認爲，重新發表胡平的「論言論自由」一文，具有現實的意義。因爲，言論自由，是成功的政治改革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

這次重新發表的「論言論自由」，乃根據香港「七十年代」一九八一年三、四、五、六期和武漢「青年論壇」一九八六年七、九月號打印的，對明顯的排印錯誤本刊作了修改。

由於文章較長，本刊分期刊載。

了對於在理論上討論言論自由這一工作的忽視，其結果是完全窒息了言論自由這一原則的價值和活力，這種不幸的錯誤是如此之深，以致於當我們提出這個極爲重要、極爲敏感的課題時，很多人以爲那是令人厭倦的老生常談，是無濟於事的書生空論。事實上，一個國家如果沒能實現言論自由，原因就在於那裡的人民對言論自由缺乏覺悟。因此，在健全和發展我國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過程中，澄清言論自由的含義，闡明它的價值和力量就成了一件頭等重要的事情。

第一章 言論自由的含意與價值

1 「給我一個支點，我能舉起地球」

公民的言論自由，是憲法上公民各項政治權利的第一條。一個人失去了表達自己願望和意見的權利，勢必成爲奴隸和工具。當然，有了言論權利不等於有了一切，但是，喪失言論權利則必然導致失去一切。衆所周知，在力學中，支點的作用是何等重要，儘管支點本身不能夠作功，但唯有在它之上，杠杆的作功才成爲可能。據說，杠杆原理的發現者阿基米德說過這樣一句話：「給我一個支點，我能舉起地球。」在政治生活中，言論自由不正是這樣的一個支點嗎？

2 言論自由的含義

什麼是言論自由？那就是發表各種言論的自由。好話、壞話、正確的話、錯誤的話，統統包括。如果說言論自由僅止於以當權者意志許可範圍之內爲限，那麼試問，古今中外，還有哪一個國家的言論是不「自由」的呢？這樣一來，我們神聖憲法上的言論自由條款，豈不成了最無聊的廢話？

3 對「自由」一詞的說明

也許有人會反駁我們的定義，他們說，把自由理解爲不受限制是很膚淺的，應該理解爲對客觀必然性的認識。因此，言論自由並不意味着胡言亂語，它必須遵從事物發展的必然性

一句反問就足以指出上述批評的漏洞了：因爲，顯然，人們遵從事物的必然性而行動也無疑是正確的，那麼憲法上爲什麼不寫上「行動自由」一條呢？可見，作爲「言論自由」概念中的自由這個詞的含義，並不能與那個著名的哲學命題——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中的自由含義混爲一談。在「言論自由」中，我們恰恰是在「自由」這個詞的最簡單的含義，即擺脫外來限制的含義上使用它的。

至於人們平時所說，任何自由都有其限制，那是指事物本身內在的規定，非指外來的強制。我要自由地開懷暢飲，但我的酒量本身就成爲自由暢飲的一個限制，所以這一點絲毫不影響我們對言論自由的定義。

順便一提，有人把「想怎麼說就怎麼說，想怎麼幹就怎麼幹」看作是無政府主義，這是把言論自由和行動自由等量齊觀。不錯，「想怎麼幹就怎麼幹」會導致無政府狀態。但是，如果連「想怎麼說就怎麼說」都加以禁止，那就變成了專制主義。今後，我們要反對什麼主義一定要對它有一個較爲明確的定義，再不能重犯過去反對修正主義時犯過的那種錯誤了。

4 關於「言者無罪」

中國有句老話，叫作「言者無罪」。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既然只有當權者才有可能對別人判罪，而當權者們當然不會對他們所贊同的言論與問罪之師。所以，非常明顯，言者無罪尤其是肯定了唱「反調」無罪。這再次證明了我們在第三節中關於言論自由的定義是完全正確的。

5 不可把言論與行動混爲一談

有人說，任何一個國家的統治者都不允許人們從根本制度上否定它的政權，所以那種針對根本制度的反對意見應該禁止。

這又是一個言論與行動不作區別的典型論調。試問：「資本論」難道不是從根本制度上否定資產階級統治的嗎？爲什麼它能夠在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公開出版呢？可見，在談論政治問題時，千萬不可把言論與行動混爲一談。

6 關於遵從義務

「但是，難道可以不遵從公民的基本義務了嗎？」

並非如此。不過我們務必明白什麼叫遵從義務。顯然，履行義務是指行動，不是指思想、言論。義務這個概念的意義就是應該從事的行爲，把「義務」一詞加之於思想，本身就是不通。

把某種事情規定爲義務，這意味着，不論單獨的個人對該事持何種態度，他必須予以實行。既然當個人的看法與規定的事情相一致時，實行會是理所當然，那麼履行義務尤其是指當個人不同意這一事情時，他也應該實行。可見，規定義務所以必要，正是因爲大家看法不一定一致。反之，在衆人意見永遠完全一致之處，便無需規定義務了，簡言之，規定義務就是在承認意見可能有分歧的基礎上，要求行爲的一致。因此，它當然允許人們在行動上實行的前提下，對規定爲義務的事情本身提出不同意見以致反對意見，把提出反對意見視爲違犯義務，這就是根本沒懂得「義務」這個詞的含

7 憲法也是可以批評的

有一種批評意見可能需給予較多的注意。有人說，言論自由因為上了憲法而成爲神聖，當然憲法本身就更神聖。所以，人們雖然有發表各種意見的權利，但是不允許從根本上批評憲法。

這種責難似乎使人們陷於自相矛盾的境地：一方面，根據言論自由的定義，它不能排除批評憲法的言論在外；另一方面，根據憲法反對憲法又是不可思議。其實，這種自相矛盾選是由於混淆言論與行動之間的界限造成的，我們說憲法不可違犯，意指人們的行爲，我們說憲法可以反對，意指人們的言論。法律本來就是爲了統一人們行爲準則而設，之所以人們的行爲需要一個共同遵從的準則，正因爲他們的思想並不總是一致。憲法的權威性、強制性，本身就體現在對持異議者們行爲的約束力，因此它並不否認人們持異議的合法性。

民主原則不僅要求在行動上，少數服從多數，同時也要求保護少數人堅持己見的權利。任何承認民主原則的法律，包括憲法都不應排斥或限制言論自由。相反，它必須以真正的言論自由作爲它們產生和存在的根據、前提，同時作爲必不可少的調節，以矯正可能的錯誤，防止可能的弊端，並爲今後的改進與發展提供餘地。

但是，有人會爭辯道：憲法是全體人民所公認的，怎麼能允許批評反對呢？這種指責是空洞的。一個爲全國人民都贊同的原則，就意味着沒有任何人批評反對；只要人民中有一部份人，哪怕只有唯一的一個，提出了反對意見

，那就表明這個原則並沒有受到全體人民的贊同。所以，這裡的問題依然是少數人的意見與多數人的意見發生衝突的問題。

事實上，憲法不可能、也沒必要被每一個公民所完全贊同。何況，對於第一代人所一致同意的憲法，對於第二代人，第三代人來說，首先是作爲一個既成事實，並未經他們思考，因而就談不上經他們一致同意的情況下而存在，並對他們具有效力，他們當然有權進行新的思考，表示新的意見，只要遵從一定的義務。人們可以對憲法提出各種意見，包括反對的意見，這正是憲法本身所賦予的。

8 續前

上節那種批評意見的錯誤，關鍵還在於他們習慣於把黨的問題與國家的問題不加區別，對黨章與憲法的意義不加區別。

一個黨員有權利批評黨的某項決議，批評黨的某些領導，甚至批評黨在某一時期的路線。但是，他無權批評黨章規定的基本綱領，因爲加入政黨出於自覺的選擇，它以事先承認黨章的基本綱領爲前提，所以，不贊成黨章基本綱領的人就不復成爲該黨的黨員。然而，憲法對公民的關係就不是這樣。個人成爲某一社會制度下的公民，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不是自覺選擇的結果。既然不存在有意識的選擇，我們又怎麼能以某種信念去強求於他們呢？他有服從憲法規定的行爲規範的義務，但並沒有承諾贊同憲法綱領的責任，所以假如他僅僅通過言論去批評和反對憲法的綱領，並不構成撤銷公民權的理由。馬克思早就指出：懲罰思想方式的法律不是國家爲它的公民頒佈的法律。

其次，黨員所以必須承認黨章的綱領，不僅因爲他入黨出於自願、退黨可以自由，選因

爲黨章並不制裁非黨員。如果我們硬是不准公民批評憲法，那麼，我們就必須不僅給予人們加入和退出國家的自由，而且還必須取消憲法對不承認其綱領的人們的懲罰職能。到頭來還是言者無罪。這無異於把憲法變成黨章，把國家變成了黨。結果必然是，爲了協調承認憲法綱領的人們與不承認憲法綱領的人們之間的關係，我們不得不再制定一套只涉及行爲規範，不涉及思想方式的新條約，這其實就等於又建立一套憲法，這一套憲法才是本來意義上的憲法，而先頭那部懲罰思想方式的憲法是不適用的。

9 言論與行動是有明確界限的

言論與行動是有明確界限的。這點必須一再強調：有些人把公開講話、發表文章都算爲行動，顯然是一種詭辯。難道說，憲法上堂而皇之的言論自由條款，人民長期流血奮鬥所追求的那種神聖權利，到頭來竟然僅僅是背地發牢騷，私下寫日記嗎？

10 關於誣陷，誹謗與煽動罪

只有當言論直接與行動相關時，言論才能作爲一種犯罪，所謂誣陷、誹謗、煽動作出明確的定義，提供切實的標準。

誣陷罪的定義是：意圖陷害他人受刑事處分而捏造事實，偽造證據，作虛假告發。注意：誣告必須是指向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作虛偽告發，其目的是使被舉告人受刑事處分，所以誣陷罪的標準是很清楚的。

誹謗罪指散佈虛假的、足以侮辱他人人格的言論的行爲。這裡，可能引起混亂的是「侮

辱」一詞。所謂侮辱人格，是指有損於我們社會公認的共同生活準則，不能以被害人本人的主觀意願來評斷。但是，什麼又叫做「有損共同生活準則」呢？搞得不好，「惡毒攻擊罪」便會借誹謗罪而還魂。爲了防止有權勢者濫用「誹謗罪」，我們在此提出一種考慮：因爲一切公民，至少是一切革命同志，不論職位高低，在人格上是平等的；所以要斷言某種言辭屬於侮辱，那必須適用於一切公民；同樣的言辭，倘加之於平民百姓頭上算不得侮辱，那麼加之於領導者頭上就同樣構成犯罪。採取雙重標準，「禮不下庶人」是必須禁止的。記住這一點，誹謗罪就不那麼容易遭到濫用了。

最後，什麼是煽動罪？煽動罪是指促使人們從事某種非法行動，此處須注意兩點：一、是促使人們從事某種行動，而不是促使人們相信某種事物。沒有這一條，談不上煽動。二、所促成的行動須是非法行動，而不是合法行動。沒有這一條，構不成犯罪。二者缺一不可。比如說，凱恩斯的「通論」一書，雖是直接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大毒草，但該書却不屬煽動；又如，號召集會遊行，雖然是明顯的煽動，但並不構成犯罪，因爲集會遊行都是合法行動。

煽動罪並不限於反革命性質一種。比如爲了洩私憤而煽動圍毆也屬於煽動罪。

需要提醒的是：作爲法律用語的誣陷、誹謗、煽動等罪名，與日常用語中的誣陷、誹謗、煽動等詞彙，含義有些不同，前者要狹窄一些，嚴格一些，這也是不可混同的。

11 駁所謂

「資產階級言論自由」

我們已經闡明了言論自由的確切含義。現

在唯一可能招致的責難之辭，是批評我們提倡「資產階級的言論自由」。這種批評也許最容易答覆，因爲批評者們自己就說不清楚究竟什麼叫「資產階級言論自由」，什麼叫「無產階級言論自由」。

所謂「資產階級言論自由」，可能意味着以下兩種情況：一、只允許資產階級有發表意見的自由；或是二、只允許發表從根本上不侵犯資產階級利益的意見的自由。前者是限制發言者的身份，後者是規定言論的性質。不過，這種情況其實都叫言論不自由，而不叫什麼「資產階級的言論自由」。衆所周知，在當今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國家裡，這兩種情況都不存在，既然如此，認爲有一種與之相對立的「無產階級的言論自由」又是從何談起呢？

在一個稍有現代國家觀念的人看來，當權者對持不同意見者的鎮壓乃是最粗暴地濫用權力，即使這個人堅決反對那個不同意見者的觀點，然而，照那些受封建專制主義影響太深的人看來，當權者對持不同意見者的鎮壓是最自然不過的權限之內的應有之舉，即使他私下對被鎮壓者的觀點深表同情，他們也傾向於肯定這種鎮壓是「合理的」。可悲的是，不少同志頭腦裡，根本沒有關於任何權力都應受制約這種最起碼的認識，根本不懂得什麼叫公民權利，不懂得政府權力只能用來保護公民權利，而決不允許用來侵犯公民權利。尤其是有些人還把這種幼稚的見解貼上馬克思主義的標籤，用含糊混亂的詞句代替對複雜事物的深入分析。一方面，他們並不很懂得什麼是資產階級的；另一方面，他們則又把他們所不懂的一切統統冠以資產階級之稱。所謂「資產階級言論自由」與「無產階級言論自由」的杜撰不過是這種偏執閉塞的一個典型的表現而已。

12 關於資產階級民主的欺騙性

那麼，我們應該怎樣去認識資產階級民主的欺騙性呢？必須看到，民主，正如列寧所說是一種國家形式，決定國家實質內容的是它的經濟結構，是它的生產關係，簡言之，是它的生產資料所有制，資產階級民主的欺騙性就在於它用形式掩蓋了內容。法國進步作家法朗士有句名言，頗爲辛辣地揭示了這一點，他說：「我們的法律是平等的，百萬富翁和叫化子都不准在橋洞下過夜。」從形式上看，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國家裡，勞動人民和資本家一樣享有各種政治權利；然而，從實質上看，由於廣大勞動人民身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剝削，就使得他們的政治權利沒有真正堅固的物質保證，顯然，一個失業者事實上是沒有辦法競選總統的，雖然他名義上享有這種權利。

民主制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則，例如言論自由，本身並無所謂「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之分。資產階級民主制與無產階級民主制在某些形式上有類似之處，否則，爲什麼都稱爲民主制呢？但是，由於它們所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完全不同，所以一個叫資產階級民主，一個叫無產階級民主。另外，民主的某些原則，如言論自由，固然是伴隨着資產階級革命而得到傳播，但它本身是全人類的共同的精神財富，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優秀成果。我們不能把這筆遺產拱手相送給資產階級。事實上，在民主革命時，我們就把爭取言論自由作爲一個艱苦任務；新中國一成立，我們就把言論自由毫不猶豫地寫進了共和國的憲法，可見言論自由本身是正確的。不要忘記，馬克思在登上政治舞台的最初幾篇論文中，就有兩篇以上論及言論

自由和出版自由。誠然，當時，他還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是，沒有一八四二年，就沒有一八四七年，（註一八四二年即是馬克思發表出版自由問題論文的年代，一八四七為「共產黨宣言」發表年代。）一個僅僅停留在堅持言論自由這一觀點上的人，當然還不夠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如果一個人連這一立場都未曾達到，甚至還反對言論自由，他就更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畢竟，馬克思主義產生於資本主義西方，作為深受東方封建專制主義薰陶的中國知識分子，往往很容易理解和接受這個學說中對西方文化的批判和否定的部分，不容易理解和接受其中的繼承和肯定的部分。在共和國成立三十週年後的今天，我們還不得不對封建專制思想進行一次再掃蕩，這個嚴重的教訓難道不足以提醒我們，有必要從更全面的角度出發去進一步認識馬克思嗎？

13 言論自由不是 封建社會的廣開言路

正如上節所說，言論自由原則主要是通過資產階級革命得到深入傳播的。由於中國沒有經歷過成熟資本主義形態，致使不少人們對言論自由的真正含義缺乏理解。事實上，某些同志所理解的民主，不過是一種開明的專制，他們所理解的言論自由，不過是封建社會的進諫納諫、廣開言路，這裡我們有必要指出這一點。封建社會的進諫納諫之說，並非真正的言論自由，因為臣民的言論範圍實際上是被帝王的意志決定的。由於各個歷史條件的不同及各個帝王個性上的差異，這個範圍有時稍寬，有時極狹。但無論如何，這種界限畢竟是存在的。一個國家有無言論自由，不在於當權者是不

是願意傾聽和容忍批評意見，而在於他們有沒有權力懲罰那些持反對意見的人。

有些帝王，出於草創基業的廣攬人材，出於初坐江山的兢兢業業，出於慮及後世的遠見卓識，出於聲威顯赫時的寬大心懷，都可能對批評意見甚至某些反對意見表示寬忍。但是把這種態度稱為實行言論自由，那就是犯了實質性錯誤。這只是開明的專制而已。某些帝王能夠比較明智地使用權力，並不會改變封建帝王權力的無限性這一本質，並不意味着人民已經享有了不可剝奪的言論權利。這種開明專制在漫長的封建社會裡始終是罕見的例外。而且，它們幾乎總是一種極端的專制破產後的結果，同時又總是下一場極端專制來臨前的準備。風箏飛得再高也不是自由的，因為線的另一端控制在放風箏者的手裡。專制下的言論路子再寬也不是自由的，因為控制言論的權力在帝王手裡。

只有在當權者沒有權力懲罰持不同意見的人時，才有了真正的言論自由；只有在人們的言論權利無需乎善良開明的君主保護也能獨立存在時，才有了真正的言論自由；只有在人們學會了抵抗權力對言論的干涉企圖時，才有了真正的言論自由。

14 毛澤東同志關於 言論自由的論述

毛澤東同志對於言論自由問題有過不少正確的論述。這裡，我們打算再一次引證它們，以喚起更多的注意。

毛澤東同志指出，要讓人講話。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只要是不違反紀律，不組織秘密集團的，都要允許人家講話，講錯了也不能罰，不能搞「一言堂」，要搞「群言堂」，要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

，聞者足戒」，要實行「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義。他明確指出，即使對於發表了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的人，只要無破壞性行為，仍要給予言論自由。意識形態上的割毒草是一回事，整人是另一回事。如此等等。並且，他還對實行這些原則的意義作過很多說明。然而，遺憾的是，長期以來，這些原則未能實行，其中既有理論上的混亂，又有心理上的原因，很值得玩味。

理論上最大的混亂在於：我們不給反動派言論自由，而發表反動言論的人就是反動派。下面我們將會談到，這種說法實際上包含着邏輯上的循環論證，它必然導致「強權即真理」。多年來，善良的中國人民却幹起了自相殘殺的蠢事，整個政治文化生活中經歷了一場空前的浩劫，上述那套似是而非的邏輯實在是起了莫大作用，批倒這一謬論實際上是論證言論自由的一個焦點。

心理上的原因就在於所謂「恐右症」。留心這些中國政治生活的人們不難發現這麼一種怪現象：毛澤東同志的某些話，即使片言隻語，被人們熱烈地視若神明，連懷疑一下都是大逆不道；而他的另外一些話，即使是三令五申，也被人視若無睹，連討論一下都是自找倒霉。一般說來，凡是比較左的，凡是可能被人用來很方便的顯示自己「革命堅定性」的詞句，屬於前一種命運；凡是比較中肯的，凡是可能被人反擊為「立場有問題」的那些話，則屬於後一種。「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最高指示」未能阻止住全面內亂，言者無罪的精神沒有減少「思想犯」、「言論犯」的龐大數目。在言論自由問題上，至今仍是不甚了了，此說彼說，莫衷一是。還是有些人違心地發表贊成言論不自由的主張。這不能不使人想起安徒

生童話「皇帝的新衣」那裡面，人們由於怕被別人說成「傻子」而寧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在我們這裡，人們則由於怕被別人說成「立場不穩」而寧肯不相信自己的理智。歷史毫無例外的證明，除了過分強大的外敵入侵外，任何一個民族災難都含有自作自受的成份在內，而有意地違背自己理性的呼聲則構成悲劇的開端，但願我們今後不要重蹈覆轍了。

15 必須全面闡明言論自由

引用權威的言論，目的有二：一是證明某論點出自某權威、或證明它為某權威所首肯；二是用權威的地位，喚起對方對論點的重視。但是，引用權威的言論不一定能代替說理，我們不能也不應該指望靠權威的名字去使對方心悅誠服。簡言之，權威並非論據。因此對於言論自由問題，我們還必須給以進一步的論證。這決不是向風車宣戰的多餘之舉。事實上，它是一個非常現實非常迫切的理論任務。我們深知，有不少人，其中包括一些很有頭腦並肩負責任的人們，從內心深處對言論自由是不以為然的；在那些喜歡言論自由的人們中間，對於這個原則所憑藉的理論根據和實踐基礎不一定就了解得很充分；最後，在言論自由的熱烈贊同者裡，對於這一原則的致勝之道即它的力量來源，也未必都很明確。為此，我們將充分重視他人的一切考慮，力求作出一個詳盡無遺的論證。澄清一切可能的混亂，說服一切可能的論敵，這肯定會使文章變得很長。但是鑒於這個問題的嚴肅意義，讀者也許會有看完它的耐心。為了使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後代再也不會因言治罪的恐怖所威脅，為了徹底撤掉這座壓在中國人民精神上的罪惡之山，我們倒是擔心

，恐怕我們還議論的太少，太不充分了吧。

16 言論不是法律懲罰的對象

首先，言論不是法律懲罰的對象。這是實行言論自由的第一個原因。我們在一段時期內剝奪某些人的言論權利，那是根據他們剝削或壓迫別人的行為，根據他們破壞法律的行為，並不是根據他們的思想或言論。法律只能懲罰外部的行為。馬克思指出「凡是不以行為為本身而以當事人的思想方式作為主要標準的法律，無非是對非法行為的公開認可。」「對於法律來說，除了我的行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對象。我的行為就是我為之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領域，因為行為就是我為之要求生存的權利、要求現實權利的唯一東西，而且因此我才受到現行法的支配。」他還指出，那種追究傾向的法律，即那種「懲罰我所想的，不管我的行為如何」的法律，是「對公民名譽的一種侮辱，是威脅着我的生存的一種陰險的陷阱」。經驗告訴我們，懲罰思想的法律實際上是把一切公民都看作嫌疑犯。一個人誠心誠意地追求真理，但是他無法擔保自己就不會陷入謬誤。他可以在行為上謹慎，卻不能在思想上不大膽。有人說，思想解放無禁區，有界限。這些人忘記了，思想本身就是無限的，像宇宙一樣，當你發現了界限，就意味着你已經超越了這種界限；這些人忘記了，認識界限便意味着要對界限兩個方面加以思考；這就是說，我們必須思考，什麼是不應該思考的。各種原則，不論正確與否，只能是思考的結論，不可能作為思考前的先天戒令。懲罰思想的法律企圖給思想劃一道界限，本身就是自相矛盾，其結果只會導致思想的僵化與窒息，所謂「

守法」就是在法律範圍內行動，這是辦得到的。然而，難道可以要求一個人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思考嗎？難道可能做到禁止人們想其所想嗎？思想是自由的，它不可能不是自由的。「我想」就是說「我想我要想的」，「我想我所想的」，就是說：「我想怎麼想，我就怎麼想」。這與「我想怎麼幹，我就怎麼幹」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每一種行為都來自一定的思想，但是，每一種思想却不一定都導致一定的行動。古人云「三思而後行」，語言是思想的外在表現，不一定都是行動的信號。人們越是充分運用語言工具自由地交流思想，越是能達於正確的認識以支配較為理智的行動。因此，鎮壓言論往往不是防止錯誤的行動，倒是防止了深思熟慮的行動。其結果必然是，假如壓力有足夠大，人們則消極被動；假如壓力變小了，人們就任性亂動。這就是說，限制言論並不是限制行動，而是限制了思想。嚴格說，是限制了思想的交流，限制了思想的成熟，限制了思想的發展，從而扼殺了理性。

既然懲罰言論並不是懲罰行動而只是懲罰思想，那就是認定某種思想有罪。如果有反動思想就足以判罪，那麼我們為什麼只以公開發表的言論為依據呢？為什麼不可以一切家庭中安放竊聽器？為什麼不可以拆閱私人信件、檢查個人日記？另外，思想有時還可以通過語氣，通過表情，或是通過沉默來表示，為什麼不可以懲罰那些「非法的哭」？「別有用心」的笑」和「反動的一言不發」呢？的確，這一切法西斯醜行在全面專政旗號下都發生過，實行過。因為它們確實都是懲罰思想的合乎邏輯的引伸。這一切劣績昭著的做法，不過是「思想有罪」這條蜥蜴身上的尾巴，只要我們

保留了「思想有罪」的軀體，那麼儘管我們一次又一次地砍掉那條可惡的尾巴，它還是要再長出來的。無怪乎年輕的馬克思對於「思想罪」這一套是那麼憤慨了。

同時，言論不像行為那樣便於事後查證，除非是見諸文字。捏造事實進行誣告還可以核實，捏造某句話進行誣告幾乎永遠無法確證。前些年間，因誣告某人說過什麼話而將他人判罪的冤案那麼多，即便實行了「反坐法」，我們也不能搞清楚這類事情是否屬於誣告，其結果只能是繼續增加冤案的數目。

也許，有些堅持要懲辦言論的人會說，我們要重證據，我們反對對個人生活的非法監視，我們只是要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公開發表反動言論的人處罰。誠然，這樣做會較少地激起人們的反感，但是它所依據的理由，如果被說穿的話，是加倍的可恥。首先，如果思想反動就必須專政，那麼放棄對個人生活的監視檢查便是十足的失職。其次，按照這種做法，我們所懲罰的並不是一切思想反動的人，而只是懲罰了那些願意公開地、願意負責任地發表自己反動觀點的人。我們懲罰老實的人，却放過狡猾的人；懲罰那些多少還相信我們的人，放過那些完全敵視我們的人；懲罰那些願意講道理，因而便可能承認真理的人，放過那些拒絕一切對話的人。事實上，我們是鼓勵了人們搞陰謀，慫恿人們當兩面派。這難道不是更應當遭到譴責嗎？

17 即使言論可以懲罰，其標準也無法確定

其次，懲罰言論還有一個它無法解決的難題，即確定標準的問題。注意這個標準不是用來鑒別是非，而是用來區分敵我。所以「六條

標準」顯然不適合這個目的。再者，這是一個付諸刑罰的法律標準，所以就不能使用意義不確定的政治標準。換句話，我們必須確保，違反這個標準的必定是自覺的反革命；還要確保人們在使用這個標準時不會發生歧義。

制定這個標準，可以有兩種考慮：一種是使它趨於嚴格、確定，另一種則是使它趨於靈活、全面。前者拘泥於字句，後者則追究傾向。可惜的是，這兩種方法都不中用。

按照第一種考慮；我們明確地規定那些字句是禁止的，否則便是反革命。這種方法的優點是執行起來不會有歧義，因而可以避免權力濫用和造成寬、假、錯案。缺點是太死板，很容易被人們鑽空子，幾乎完全不能起到禁止的作用。人類的語言是那麼富於變化，奧妙無窮，躲過幾個字的忌諱，避開幾句話的障礙，人們照舊可以表達一切思想；不同的詞句可以表達相同的意思；一樣的詞句可以造成不同的效果。因此，若是根據這種標準去實行，便注定毫無用處。

第二種方法同樣經不起推敲。一個追究傾向的標準，其本身必定是不具體，不確定的，它必須通過執行者的理解能力來實現，這就導致了人治而取消了法治。衆所周知，曖昧模稜的法律不成其為法律。如果同是真心擁護法律的人們對於同一法律的含義可以作出各種各樣的解釋時，法律就會無效了。

譬如說，我們規定：禁止一切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言論。這似乎是不錯的，但，怎樣判斷一種言論是否屬於這種類型呢？除非是一個人直言不諱地表明這一點，不過那可能不是極罕見的。因此，他們必須根據他們的認識能力對各種言論加以鑒別。可見，多數的意見未必就是真理的標準，領導者也不是絕對正確

的上帝，在衆說紛紛的情況下，誰有資格充當至高無上的仲裁人呢？歸根結底，只有那些人數更多、權力更大的一方把自己的判斷強加於對方，這就是「強權即真理」的邏輯。且不说壞人掌權，指鹿為馬，就算是好人掌權，僅僅是一時的鑒別不清，就足以造成扼殺真理的可悲後果。事實上，不管我們怎樣真誠地表示，我們要禁止的是那些真正反動的言論，然而我們實際上所禁止的，總是那些在當時當權者看來是反動的言論，未必就是真正的反動言論。在這裡，主觀上的良好願望、負責精神都是不相干的，只要我們承認還沒有窮盡真理，還不是全知全能，那麼就沒有任何理由採取這種武斷的態度。

現已證實，在過去二十年間，我國曾經有過驚人數量的寬、假、錯案，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因言治罪所致。這些錯誤的嚴重後果遠遠超出一般人的估計。古人說：「殺一儆百」，現在看來不對，殺一實在可以做千、做萬，以至更多。天安門事件不過錯抓了三百人，還不及全國十億人口的三百萬分之一，就足以造成全國性的白色恐怖！從過去的錯誤中，我們應當吸取什麼教訓呢？至少有一點，那就是再也不要搞因言治罪了。

18 續前

不過，有少數人不這麼看。他們說今後只要注意更加嚴格地區分就行了。這種議論實令人啼笑皆非。這豈不是說，過去所以發生那麼多寬、假、錯案，都是由於當時人們主觀上就不想「嚴格區分」造成的嗎？是的，要幹工作，難免不犯錯誤，不能因為可能犯錯誤而不去幹工作。但因言治罪不在此例。實行因言治罪

並不是革命的必要。取消因言治罪也並不意味着取消思想鬥爭。「殺敵三千，自傷八百」，在革命事業中，自己隊伍的戰士遭受一部分犧牲也是常事。但犧牲有兩種，一是死於前方的鋒矢，一是死於後方的冷箭。如果那些衝在最前面的勇士，僅僅是被猜想為其間可能混有幾個壞人，後方自己營壘中便向他們發出一陣毫不留情的掃射，這難道也是可以辯解的嗎？

19 給言者判罪的正當意義

有些人力主對言者判罪，但是很少去考查這種判罪的意義。在本節中，我們不妨對此也略作分析，或許有助於加強言者無罪的論據。一般來說，判罪是爲了起到以下作用：或是抵償，或是改造，或是隔離，或是威脅潛在着的罪犯。

殺人償命，貪污罰款，這是抵償，但是，抵償總是以相同的性質的事物相抵（除了在沒有相應的事物時）。據此邏輯，對於一種言論的抵償就應該是另一種言論。既然如此，在一個各種意見都可以自由發表的地方，既允許批評，也允許反批評，那就不再存在用其它手段進行抵償的根據了。把說了某種話的人抓到監獄裡顯然就不是爲了抵償。可見，從抵償的角度出發，因言治罪是沒有道理的。

談到改造，言論屬於思想問題，只能說服。通過判罪強行壓服絕不能真正改變人的認識。須知，改造的理論立足於通過改變壞環境和生活方式而達到促成思想轉變的目的。因此，它只對於生活在必然產生壞思想的那些壞環境及壞的生活方式的人們才適用，這對一個從事正當職業，過着與平常人一樣生活方式而僅持有不同看法的人就毫無意義了。

至於隔離，由於言論一經發生，便具有獨立的生命，而判罪只能隔離言者，不能隔離他已經發出的思想。一個見解倘若被衆人所擯棄，隔離言者就沒有必要，倘若被人接受，隔離言者就沒有用處。有人說，隔離言者能夠防止他把某種思想進一步擴散，所以還是有意義的。然而，錯誤思想不是毒氣，不是子彈，它們不能主動地傷害別人的意識。除非一個人認爲某種見解確有道理，否則這種觀點對這個人就毫無影響。特別是，這裡所涉及的見解都是不佔支配地位的「非正統」見解，它們就完全沒有強迫他人注意和接受的勢力，如果這種處於劣勢地位的見解也能引起影響他人意識的作用，那必然是別人在將它們與官方的意見仔細比較後，確實爲前者所說服，這往往是該見解含有新鮮真理的標誌。換句話，真正荒唐的言論無須乎防擴散，而那些倘不禁止就會征服人心的思想往往是正確的思想。

當然，有人會說，群衆大多有一種好奇心，所以特別容易對非正統的見解感興趣。但是，我們要說，除非是在一種「一言堂」的氣氛下，人們才會專對任何一種不同意見格外重視。只要各種意見都能自由發表，人們就不會專去注意那些反對意見了。必須看到，那種依靠刺激人們好奇心而取得影響的意見，是建立在他們缺乏正常發表機會的前提下；一旦反對意見的發表成爲習以爲常的事情時，人們對它的好奇心就自然消失了。因此，有人指出，壓制不同意見往往是替它們作反宣傳，並非沒有道理。

再者，防擴散的意圖無非是禁止人們接受錯誤思想，它完全是出於把群衆當成阿斗的監護人立場，出於把群衆視作孩童的「父母官」立場，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能培養出一批單

打一，見不得世面的教條主義。也許有人會說：我們還是願意讓群衆接觸一些反面東西的，以增強免疫能力。不過它們必須經過我們的選擇，同時，我們還是必須把發表反面意見的人抓起來。可是，如果他們選出來讓群衆提高認識能力的反面教材，先就印上了「供批判用」的字樣，那麼他們這種可嘉許的意圖就差不多沒法達到了。單單爲了駁斥一個人的觀點而去讀他的著作是不會有什麼收穫的，那正像看一場錯綜複雜的反特電影，事先就告訴了觀衆誰是特務，結果對觀衆的思維推理能力不會有任何幫助。尤其是，假如我們同時又把發表了反面意見的人抓起來，效果就會更糟：那不是在啓發人們辨別什麼思想正確，什麼思想不正確，其實是在警告人們，什麼是你們可以想，可以說的，什麼是你們不准想、不准說的。那不是在解放思想，而是在設立禁區；不是在提高認識，而是在壓抑理智。所以，實行隔離的政策不僅必然會壓制真理，而且必然會促使廣大人民智能衰退。

事實上，有些人一直欣賞一種「善意的」愚民政策，出於一種自稱是爲了人民好的願望，採取一切力量進行控制人民思想的愚民工作。爲了使人民思想純正，寧可使他們頭腦簡單。其結果，只能造成一個停滯、呆板，起碼是進步特別緩慢的社會。這樣一個貧乏、單調、靜止的社會形態，也許正是某些人心目中的「理想國」。但是，人民是不會喜歡它的，並且，它必將在今天這種高度變化飛速發展的世界中遭到無情的淘汰。

最後，我們再考查一下，對言者判罪是不是爲了威脅潛在的罪犯。如果正是出於這種目的，那無異於默認以下幾點：一、當權者認爲自己是唯一神聖的，它把一切批評它的人都視

作「罪犯」。二、當權者們不僅把自己奉行的
一套方針看作是絕對正確、唯一正確，而且它
還認定，每一個人對這種正確性都會自然而然
地有堅定的信仰，乾脆說，那應當是與生俱來
的天賦觀念；因此，凡是對這一套加以思考、
懷疑，加以探求、討論，產生不同或相反意見
者，必然都是居心叵測，怙惡不悛。所以除了
以重刑伺候，恐怖威脅外，別無其它選擇。三
、當權者們承認，有一個相當數量的人們是反
對自己的。至少他們認為，如果允許反對意見
公開發表，那麼很可能就造成一個相當的多數
。所以有必要使這些潛在的敵人感到恐怖而實
行殺一儆百。四、當權者們對於和反對意見展
開辯論，贏得人心方面，沒有自信心，所以才
採取這種不訴諸於伸張理性而乞靈於封鎖理性
的手段。這裡的主要之點在於：這種恐怖所施
加的對象是言論，是思想，因此它就絕對不能
證明自身是正當的。一個當權者鎮壓了某種行
為，怎樣判斷這個鎮壓是否正當呢？可以根據
人們贊成或反對意見之多寡來衡量；但是如果
所鎮壓的不是一種行為而是一種觀點，那就無
法證明了。一切不同意見者都被看作潛在的罪
犯和罪犯的幫兇，他們正是被叫去看殺雞的猴
子，只有贊成者才可以直抒己見，在這種前提
下，指鹿為馬又有什麼做不到的呢？不錯，這
種恐怖有時確能鞏固權力者們已有的地位，但
它不是通過擴大人民對自己的信賴與忠誠去達
到這一目的，相反，它則是以增加人民對自己
的隔閡與敵意去達到目的。所以，這種政策，
對於那些立志與人民為敵的政權來說，可能是
必須的，儘管其效果等於飲鳩止渴。但是，它
對於一個真誠地為人民謀利益的政權，就是完
全有害的，哪怕在某些時候，這種手段似乎不
失為一種快刀斬亂麻的應急措施。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對言者判罪的做法，完全不同於對於犯罪行為的懲罰，是完全沒有任何理論根據的。

20 實行不實行言論自由的利弊比較

下面，我們將對實行言論自由與不實行言論自由各自的優劣利弊作一全面的比較。

20-1 實行言論自由有利於認識真理

首先，實行言論自由有利於認識真理，發展真理。這又包含兩層意思，其一是說，在實行言論自由的條件下，新真理不會因多數人的一時反對而扼殺在搖籃中；其二是說，在各種言論自由發表的地方，人們會更樂於思考，思想會更敏捷發表，因而更容易發現新的真理。

任何真理，在成為眾人的認識之前，往往先以少數人的認識開始。真理發展，並不像竹子，新長出來的竹節總是承續着舊竹節；它倒像灌木，常常要從側面生出枝條，有時甚至從地裡另冒一叢，因此，即使對於一個掌握了許多真理的人，他也不能武斷地宣稱，從今以後的一切新真理，必然都是他們所掌握的舊真理的簡單的向前延伸，所以，他也無權充任衡量真理的最高法官。因此，壓抑一種我們認為錯誤的意見，可能是在壓抑新鮮的真理。

有人說，真金不怕火煉，真理是禁不住的。這話不一定正確。須知，真理像火一樣，是完全可以撲滅的，只不過它又可以重新被點燃而已。歷史上有的是真理被封鎖而使人類文明倒退的悲慘先例。尤其是，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根據真理最終會戰勝迫害為理由，證明

迫害「獨特見解」是正當無害的，似乎迫害成了一個篩子，似乎對一切我們一時認為反動的觀點予以禁止，只會消滅掉那些該消滅掉的毒草，並不能消滅有生命力的真理，甚至還有助於讓真理發出更大的光芒。這顯然是一種詭辯，是一種對暴政的阿諛。不錯，人類進步的趨勢是不可阻擋的，但是，我們不僅關心進步，而且還更關心進步的速度。任何導致阻滯、延緩進步速度的事物，都必須堅決反對。

只有在對真正的反動言論也不判罪的情況下，新真理才有茁壯生長的可能。真理的天鵝在其初期常常被人視為醜小鴨。如果我們一方面鼓勵人民暢所欲言，一方面又宣佈對「惡意攻擊」者嚴懲不貸，那就好比一個司機，一隻腳踏油門，另一隻腳同時猛踩剎車，西漢路溫舒說得好：「鳥驚之卵不毀，而猛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此處的誹謗作批評、攻擊解，不應與法律概念中的誹謗相混。）這是很辯證思想的。那些堅持要給言論定一界限的人，不論其動機多麼虔誠，也無論這個界限本身多麼正確，它也必然會壓抑言論，封鎖真理，扼殺理智，阻止進步。

二、勤於用腦和勤於用手一樣，是習慣的產物，有賴於長期的鼓勵與培養。在因言治罪的氣氛下，唯不動腦筋者最安全，這本身就意味著對理性的懲罰，對理想的懲罰。它極大地束縛了智力的發展。在最理想的情況下，它所能達到的也無非是造就一大批頭腦簡單，思慮薄弱，缺乏創新精神的好人而已，依靠這種人是千秋萬代也搞不了現代化的，是遲早要把整個國家弄到「開除球籍」的地步的。

試想一下，假如有這樣兩個不同的社會。在一個社會裡，人們唯恐不能標新立異，唯恐在發現新真理上落後於人；而另一個社會則相

反，人們唯恐發表了什麼與眾不同的見解，唯恐思想走在人前而被人非難打擊。在前一個社會，即使最膽小的人也不在乎坦率地說出自己的見解，在後一個社會裡，就連最勇敢的人在發表自己最有把握的新觀點時，也不得不猶豫再三。那麼，哪一邊會百花齊放？哪一邊會百草凋零？哪一邊會生氣勃勃？哪一邊會死氣沉沉？哪一邊人們會越變越聰明，哪一邊人們會越變越麻木？豈不是再明白也不過了嗎？

實踐證明，凡是實行因言治罪的國家，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停滯與腐化。其程度恰與因言治罪的程度成正比。這些年來的人類智慧的絕大多數新成果，大至科學中的新理論，小至服裝上的新樣式，都誕生於言論自由的國度。這不能不引人深思？

20-1-2 實行言論自由 有利於真理發展

第二，實行言論自由，真理可以從與謬誤的鬥爭中吸取很多有益材料。

衆所周知，一個基本上謬誤的思想，其中也可能包含有部分的真理，至少它常常含有能引起進一步思考的有價值的因素。不同思想間的相互影響關係，有時是非常奇特、事先難以料想的。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恐怕不是真科學，可是它却是刺激達爾文發現自然選擇原理的一個誘因。拋磚可以引玉，謬誤可以引出真理，唯心主義可以引出唯物主義，反動思想可以引出革命理論。這一點在哲學史、科學史上屢見不鮮，人們都是承認的。不過某些同志似乎有一種奇怪的邏輯，即這種向對立面吸取和補充自己的情況只發生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之前（因為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在批判地吸取西方資產階級理論後創立的），似乎從一八四七年馬

克思主義正式誕生後，全世界的資產階級便一齊成了傻瓜，再也拿不出半點有價值的思想來了。這種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是包含未來世界一切答案的天書，顯然是宗教崇拜的一種表現。事實上，革命導師歷來都是提倡向資產階級學習、向資本主義學習，當然不是學習他們的一切，而是學習其中有價值的東西，包括對錯誤的東西加以分析批判。但是，不實行言論自由則顯然會失去這些好處，這些年來，我們閉關自守，似乎真理都在我們這裡，幹了不少蠢事，走了不少本來完全可以避免的彎路，不正是

一個深刻的教訓嗎？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的國家，就是在研究馬克思主義方面都落在了別的許多國家之後，這應該怎麼解釋呢？

一是由於不實行言論自由，不讓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有正常表現的機會，從而使馬克思主義失去了向不同思想汲取、補充和激發自己的種種好處；二是由於不實行言論自由，把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新闡釋、新理解，更不用說對某些觀點的重新評價，統統斥之為修正主義，壓於陰山之下，其結果是常常混淆了是非，敗壞了信譽，從根本上窒息了馬克思主義的無限生機。

20-1-3 實行言論自由有利於 造就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第三，即使對於我們深信不疑的某些真理，也應當允許別人批評，這正是造就真正馬克思主義的途徑。

就人類的認識過程而言，不存在着任何天賦自明的真理。任何一個理論在沒有充分研究以前，就聲稱你信仰它，顯然是自欺欺人。接受真理必須經歷一個懷疑、比較和研究的階段，毛澤東同志早期相信過無政府主義，魯迅當

初欣賞過尼采，人們都不覺得奇怪，那麼，我們又怎麼能要求今天的人們從一開始就信仰馬克思主義呢？憑什麼根據可以斷言，那些對馬克思主義表示懷疑、動搖甚至提出反對的人，尤其是青少年，就一定不是出於認識上難免的錯誤，屬於正常認識的必經階段，而必然都是罪大惡極，反動透頂，非加以判刑以至處死不可呢？

知識不能遺傳，信仰不能遺傳，前一代人通過長期實踐而獲得的知識，通過正反兩方面經驗而建立的信仰，就算它們完全適合於下一代，但下一代人倘要接受，也必然經歷一番先輩們經歷過的那種探求過程。在先輩經驗的幫助下，這個過程可能會短一些，但無論如何不會不存在。然而，因言判罪恰恰就是某些人把他們所認識到的真理，強迫那些尚未認識到的人，強迫後來的子子孫孫，作為一個先天性的公理加以無條件地接受，這既不符合客觀的認識規律，又很難不引起理性尊嚴的反抗。評劇「劉巧兒」就是一個有力證明：巧兒反抗她父親包辦的婚事，並不是因為她父親指定的對象柱兒不好。其實，巧兒後來自己選擇的愛人不是別人，恰恰就是柱兒。巧兒反抗的是父親的包辦做法。即使父親是出於好心。即使父親指定的對象是好人。這種包辦的做法也是完全錯誤的。並不是巧兒不尊重她父親，而是她父親完全不在尊重巧兒。包辦態度下，只有那些懦弱無能，毫無主見，注定了沒有出息的人們才會一味順從。真理也是如此，強迫別人接受真理，強迫別人無條件地接受我們自以為正確的信仰，必然會引起理性的反抗，破壞真理的聲譽，使真理走向自己的反面。人類認識事物自有其客觀規律，無視這種規律，不論出於何等真誠善良的動機，也是要遭到懲罰的。

我們要造就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這就要求真正實行言論自由。人們只有在充分了解不同見解之後，才能確立對真理的信仰。人們只有在能夠與錯誤思想進行平等論戰中獲勝時，才算是真正掌握了那門理論。剝奪了對方的發言權後再去批判對方，很難避免武斷、簡單化與強詞奪理。這不但有損於堅持真理，有損於批評謬誤，更重要的是它會徹底破壞人類的理智能力，戕害人類追求真理的崇高意向。失去個把真理並不那麼可怕，然而，失去了獲得真理的能力就太可怕了。這並非故作危言。事實上，我們已經造就了一批自己長着腦袋但都需要別人塞進「思想」的人，他們只習慣於「一言堂」的空氣，一旦各種不同意見都擺在他們面前，他們就會無所適從。因為這時候沒有一個至高無上的權威出來宣布哪一方是真理，而他們自己則從不懂得用自己的頭腦來思索。這些人既沒有興趣去真正理解上邊規定的信仰、觀點究竟是什麼意思，甚至連它是對是錯都懶得去問，只要是佈置一套唯一的教義就好；只怕有不同觀點的爭論，一見爭論，便驚呼「思想搞亂」了，似乎那倒是頭號的罪過。去年的一期「歷史研究」不過是刊登了兩篇觀點對立的學術文章，立刻就有人深感不安，寫信抗議道：到底以哪一篇為準呢？

英國大詩人密爾頓說得多好！「在聖經裡，真理被比喻為一道潺潺的泉水；假使她的水不許永恆的流動，那水就會腐化為一個順從和因襲的泥潭，一個人在真理的上面可能是異端者，假使他相信事物，僅僅因為他的牧師是這麼說的，或者因為國會是這麼決定的，再也不知道別的理由了，那麼雖然他的信仰是真實的，他所堅持的真理本身就也就變成了他的異端。」

朱熹詩云：「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真理之樹必須深扎於現實的土壤之中才能永葆生氣。人類社會是一種生長性的肌體，穿不得一件束縛發展的緊身衣。作為正確反映社會發展規律的真理也必然是不斷發展的，精神自由、言論自由則是保證這種發展的一個基本前提。

有人說，芸芸衆生並不需要深明哲理，但是他們却必須有正確的信仰，為了使他們的信仰正確，我們就應該把一些原則作為不容懷疑的公理教給他們；為了使他們信仰堅定，我們就應該禁止那些敵對的觀點。這種說法至少有三重錯誤：一、它藉口遷就那些落後的，對真理不求甚解的群衆，而壓制和打擊那些願意探索真理的先進群衆；它不是把落後的人民盡量爭取到先進的人們的水平，而是強迫先進的人們降低到庸人的水平；它不是促進人民不斷成熟，而是封閉了人們走向成熟的一切道路。二、它意味着把人們分成兩部分，一部分佔有一切真理，另一部分則只應張開嘴巴來接受，它讓我們懷疑大多數人的認識能力，却又讓我們必須無限信賴一小部分人的絕對正確。三、它認為了解反面意見只會動搖正確的信心，認為反動的思想比正確的思想更有力量。要純正必須無知，要正確必須愚昧，要堅定必須痴呆。這種觀點與馬克思主義絕無共同之處，這是一種純粹的愚民政策。寧夏共產主義自修大學的青少年為什麼慘遭毒手？就是因為他們願意研究共產主義學說，而照那裡的「紅衣主教」看來就是大逆不道！共產主義不是真理嗎？信仰就是了，何須研究？既然想研究，一定是別有用心，這便是某些人的邏輯。不錯，世界上確實有一批懶得思考，寧願把終生信仰什麼

學說的選擇推卸給他人代庖的人。這種謝惠敏式的人，倘生在中國便自稱信仰毛澤東思想，倘生在蘇聯便會擁護勃列日涅夫主義，倘生在印度就會是一個佛教徒，倘生在利比亞就會是一個穆斯林。這類人雖然未必都是廢物，至少算不得精華，即使不會盲目從惡，起碼不能自覺為善；可能無須乎譴責，但絕不應當提倡，如果根據他們的長度製成克羅克拉斯提之床，理智就完了，真理就完了。沒有頭腦的人將搖頭晃腦，有頭腦的人倒會失去腦袋，殘酷的清洗將永無休止，文明的進步將遙遙無期。

真理無敵，真理的標準之一便是它能在與謬誤的鬥爭中獲得勝利，贏得人心。贊成言論自由的人都是出於這種對真理的力量無限信任的樂觀主義。這也是古往今來一切具有民主主義思想的人們的共同觀點。墨子說：「光至影亡。」傑弗遜說：「真理是偉大的，如果聽其自然，它也會傳播開來的……當真理得以任意對抗錯誤時，錯誤就不再具有危險性了。」當初，萊茵省會中反對出版自由的辯護人有過這樣一種論據：他們認為，壞的出版物有如「萬惡所宗的妖女之歌」，能對群衆起強大作用；對好的出版物而言，「它如果不是絕對不可克服的障礙，至少也是很難克服的障礙。」對此，馬克思辛辣地諷刺道：這豈不是說，好出版物是無能的，壞出版物則是全能的；好出版物和無能的出版物是一個東西，這豈不是說，好就是無能或無能就是好嗎？另外，衆所週知，馬克思還有句名言：「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

結論是很清楚，如果我們不實行真正的言論自由，不允許對馬克思主義真理進行批評，我們就不能造就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20-4 實行言論自由 有利於國家的統一

第四，實行言論自由有利於國家的統一，反之則有害於這種團結統一。

馬克思早就指出：「追究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所以它不是團結的法律，而是一種破壞團結的法律」，乍一看去，這正好與某些同志的常識相反，人們不正是出於加強團結和統一的目的，才去懲罰異端邪說的嗎？不少同志一向認為國家要統一必須有賴於人民的信仰一致。這種觀點並不正確，首先它不現實。馬克思主義者不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在人口中只是一個少數，社會主義方向被大多數人所擁護，但不能說毫無例外。一個國家倘若堅持用信仰與非信仰去區分公民與敵人，勢必縮小自己的基礎，無異於為淵驅魚。如果我們把不信列為首惡，那麼自然要把清洗看作必須。文化大革命中人們打派仗，有一個錯誤的支配思想，那就是不承認不同觀點的人們可以和平共處。歷史證明，凡是否認持不同政見的人們有可能在法律的基礎上共處，勢必造成分裂和內戰。就這點而論，文化大革命中的派仗倒很有些類似於中世紀的宗教戰爭。在安定的目標下，導致了連年的混亂與內戰；在統一目標下，導致了日甚一日的分裂與內訌。最後的結局，不但沒有促進人民堅定一致的信仰，反而造成了多數人對一切教義信條的懷疑、厭倦和漠不關心。這一點肯定是發起者始料未及的吧。

團結，本身就是說要和不同意見者團結。統一，倘就其廣泛意義而言，並不強求信仰上的一致，而只是要求對一個共同法律的服從。必須看到，一個守法的不同政見者於整個社會

的統一有時甚至有積極意義，至於它所帶來的消極意義，如果硬要用強權予以鎮壓，無疑會得不償失。培根說得好：「有時醫療比疾病還壞。」事實一再證明：鎮壓言論，且不說它絲毫無助於改善不同意見者的思想，完全無補於贏得中間派的人心，單以這種行為在自己營壘所引起的爭論就足以說明它是促成分裂、猜忌而不是促成團結統一的了。最糟的是，鎮壓者爲了平息自己隊伍中的批評意見，常常不得不進行進一步擴大鎮壓的範圍，形成一種在濫用強權方面逐步升級，欲罷不能的危險趨勢。這

種起先以鎮壓不同信仰的有限打擊，常常演變到鎮壓不同策略的地步。它所造成的分裂與破壞，比起最初幾個不同政見者的批評來，不知要大多少倍。人類社會，尤其是現代社會，是異常複雜的，凡是想憑藉強權的力量取締一些我們看不順眼的事事物物，非陷入難以自拔的泥潭不可。所以，實行言論自由，其實有利於國家的團結與統一，不實行言論自由，反而有害於團結和統一，事物的辯證法就是如此。■

(未完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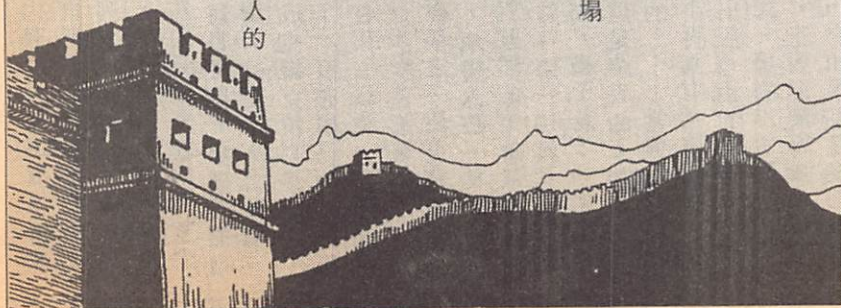
●文藝園地●

長城的復活——給郭城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西圓

長城渴了，吼聲
從太平洋另一岸傳來
一條繩索，從生命中懸下
你毫不猶豫地伸出手
接過——
麻木的月亮
把最後一抹沉默
葬去，在死之殘存的呼吸背後
折射出彎曲的方向
一顆燃燒的橡樹
伴着你，朝着監獄的鐵門
堅定走去，一路上
荊棘叢林的回聲
預示着
你們帶去的一把板斧
當汽球，注滿了鮮血
升向天空，你的一行脚印
在黑色午夜
布滿古老的長城
潮濕中，沒有火炬
你從來不能呼吸

白衫白褲
在泥濘中閃過
一群矮人在樹洞中
向你打着手勢
郭城，你跑向哪裏？
那副黑眼鏡的背後
宣布着：舊長城的倒塌
一雙攥緊的鐵拳
在屬於人類的土地上
築起一座全新的長城
長城復活了
你，帶着繩索和板斧
帶着一顆清白的心
在長城鍍金的希望中
放出一群，屬於所有人的
銀色鴿子



民主縱橫談之五

■王炳章

先從尊重隱私權開始

由旅美華人學者王正方自導自演的電影「北京人」(英文片名叫 GREAT WALL)，有這樣一幕：一位十多歲的北京姑娘的家裏，接到一封寫給她的信。她的母親「理所當然」地拆開看了之後，才把信交給自己的女兒。而這位北京姑娘，並未對母親的行為表示異議。從美國探親來的表兄，則對這個女孩子說：妳媽不該拆妳的信，妳有妳的隱私權！「北京人」在很多細微之處，就這樣鮮明地反映了東西文化上的差異的確，中國人缺乏隱私權的觀念。我問過大陸同學，也問過台灣同學，幾乎每個人都有私信被別人拆看或偷看的經驗。看來，不尊重他人隱私，已成了中國人的通病。在這方面，香港同學的經驗似乎好些，可能這是受英國殖民文化的影響吧。

什麼叫隱私？記得一位外國男孩會對「性是不是骯髒的」做了這樣的回答：「性是隱私的事，不是骯髒的事。」(SEX IS PRIVATE, NOT DIRTY)，從這個很有智慧的答案可以看出，隱私就是不願公開的個人之事。任何人都使個人的事物不被他人知道和干預的權利，這就是隱私權，隱私權屬於最基本的人權。

記得出國時，曾被告知：「到外國後不要問人家的年齡、工資和婚姻。」這種出國前的「隱私權ABC」教育，正好說明了中國人不注意、甚至不知道隱私權。

中國人不尊重隱私權的表現是「多采多姿」的：

一、審訊員作風：與人談話，喜歡刨根問底。上至祖宗三代，下至妻子兒女，都願問個一清二楚。

二、偵探作風：如果當面問不出來，則以側面打聽，尤其好打聽人家的私生活。到別人家裏坐客，東翻翻，西看看，趁主人不備，還常拉開抽屜，以期發現點秘密。至於到了男朋友和女朋友的住處，更要尋機地毯式搜查一番。

三、警察作風：問問、聽聽、看看別人隱私，後果尚不十分嚴重。嚴重的是用行動干涉別人的隱私，到了這一步，就成了警察作風了(當然是中國的警察!)。例如，有人對「捉姦」興致十足(我原來的國內單位也發生過這種事。)深更半夜，爬梯翻牆，破窗而入，抓雙審訊。事後還繪聲繪色地講解驚險場面。

這種警察作風，多是掌權者干涉無權者隱私的表現。這方面的情形

，在中國異常嚴重——小則找你談話，讓你向組織交心；中則截獲私函，尋找證據；大則盯梢抄家，甚至私設公堂。

隱私權在中國未受到尊重，原因是複雜的。文化傳統上，自漢之後，中國的「重羣體主義、輕個體主義」的文化被逐漸推向極端，以至衍變成抹殺個體的絕對羣體主義傾向。「存天理、滅人慾」、「破私立公」、「大公無私」、「狼門私字一閃念」，都是抹殺個體的說教。此外，極權專制者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不允許老百姓有半點隱私。他們自己不可告人的壞事幹得太多了，不自主地患起疑心症來——懷疑別人願公開的事都屬於陰謀之列。到了共產黨統治，消滅隱私就更理直氣壯了，共產黨，還要「私」幹什麼？

不尊重隱私權，很容易傷害別人。筆者曾聽到不少華僑抱怨，大陸的親戚朋友來家客居，什麼都打聽，什麼都翻看，往往鬧得很不愉快。至於手裏有了權，再去干涉別人的隱私，問題就大了。說不定會毀掉人家一輩子前途，甚至鬧出人命來。

今年第三期「青年一代」雜誌上，披露了一對二十歲的大學生因偷情而被開除出校的事。據說，就在倆人在教室裏卿卿我我時，護校隊員守衛在外，偵察他們的行踪。等到「好事」發生，護校隊一舉成擒。人們不禁要問，這樣做的目的何在？如果真的為了這兩位小青年「好」，為何不早一點「警告」他們？

侵犯他人隱私還會導致更悲慘的結局。一位朋友曾告訴我，他認識一個很有才氣的知識份子，因不小心失落私人記事簿而遭了殃。政工幹部在記事簿中查出了不少「糜爛的資產階級思想」和「反動言論」。於是，大會批，小會圍，一直把他整得冤死九泉。在大陸，很多人不願記日記，就是怕被別人發現而惹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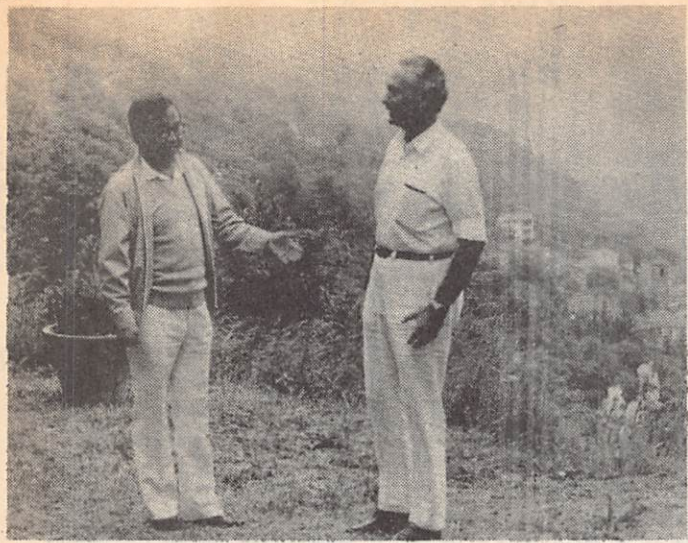
情侶的相愛與結合，個人記錄下心得與要事，完全是他們的隱私權，與學校、與其他他人毫不相干。他們並未因私事而影響學業和工作，何有行政處分 and 人身迫害之理？如果說違法亂紀的話，最大的違法並應受到制裁者，當屬那些侵犯隱私、斷送他人前途和性命的人。

在中國，衛道士們一貫以批判「腐朽、落後的資產階級思想」為干涉別人隱私的合理依據，豈不知，真正腐朽、落後的，正是這些衛道士們。他們還陷於封建主義的古墓之中，尚未進化到「資產階級」的階段。民主的意義在保護人權。不尊重最基本的人權——隱私權，就不能建立起民主社會。如果說，建立民主制度是一項艱苦的事業，那麼，尊重別人的隱私權則是很容易辦到的。我一貫欣賞這句話：民主從本身做起。就讓我們從尊重隱私權，從不做「審判員」、不做「偵探」、不做「警察」開始做起吧。

中國薩哈羅夫方勵之：

應該丟棄馬克思主義

「西德明鏡周刊」



方勵之與西德明鏡周刊記者鄧天諾

編者按：西德的「明鏡周刊」七月廿七日刊出了一篇方勵之教授訪問記。方勵之是在今年五月份在意大利期間接受「明鏡周刊」訪問的。採訪者是曾被北京政府驅逐的、「明鏡周刊」前駐北京記者鄧天諾先生。

一般認為，這篇訪問記是方勵之講得最徹底的一次，他甚至公開宣稱：馬克思主義如同舊衣爛衫，應被完全揚棄。讀了這篇訪問記，才能真正體會到，方勵之不愧為中國的薩哈羅夫。

在以下的文中，「明」代表西德「明鏡周刊」記者；「方」代表方勵之。

明：方教授，對中國學生而言，你是個英雄，而國際新聞界也視你為中國的薩哈羅夫，鄧小平則稱你為一個「壞份子」；中國共產黨聲稱你已受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瘟疫所感染，你真是如此嗎？

以使命感投入社會

方：每一種批評多少都有一部分是對的。基本上我只是一個天體物理學家。「自然科學是我的信心」，愛因斯坦就曾經這麼說過，雖然從前我並不了解他這句話的意義。我認為我們科學家有一種信念及理想，我們對社會有一種責任。當科學發現了某一項真理，而社會尚不能接受時，身為科學家的我們就必須要投入其中，伽利略就是如此，我就是以這種使命感來投入社會的。

明：你對中國有怎樣的使命感呢？

方：民主化。沒有民主就不會有發展，不承認有獨立的人權，就不會有真正的民主。在中國，人們並不了解民主的基本涵義。我們必須向民主邁進，我們必須了解，民主並不是由領導人所施捨給我們的。上級所賜予的民主，不是民主。那只是控制的寬鬆而已。這只會引發出激烈的對抗，然而這是無法避免的。

馬克思主義已經不靈

明：你起先只是批評地方上的黨政機關，然後是北京市委，最近則批評到了中共的政治局。那一個會是你最新的批評目標呢？

方：馬克思主義。

明：你倒是進行的相當迅速。

方：馬克思主義已經不靈，這是一個事實。它不能自圓其說。身為一個科學家，我可以證明，馬克思對有關自然科學方面的解釋，很多是錯誤的，這是無可置疑的事實。馬克思對自然科學方面的見解，體現在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這一本書中，人們幾乎可以在這本書

的每一頁中發現不實際或全然錯誤的地方。

明：比方說？

方：在六十年代，中國及蘇聯曾經多次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批判當代的科學成果。批判的對象包括了生物學的基因說、物理學中的相對論，以及從宇宙論到電腦的發展。然而其中沒有任何一個批判是正確的。因此，我們如何可能在今天還說馬克思主義應該領導科學的發展？這種態度根本是錯誤的。

明：你所說的僅適用於自然科學嗎？

方：不。文化大革命所暴露出來的種種問題，人們可以知道馬克思主義已經失去他在社會問題上的權威了。我只是那些首先公開宣稱疏離馬克思主義人士中的一份子而已。

明：你現在仍然信仰馬克思主義嗎？

方：我不知道如何再能！在解放（一九四九）初期與五十年代，我對馬克思主義是堅信不疑的。在一九五五年當我剛加入共產黨時，我的確相信馬克思主義是每一個國家的希望，而共產主義絕對是好的。

在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期間，我被驅逐出黨。我曾經誠摯地做過自我批評。我那時是因為指責黨的錯誤行為而被劃為是右派份子。現在共產黨是第二次開除我的黨籍，但是這一次，我知道我並沒有任何錯誤，我因此拒絕做任何的自我批評。

明：鄧小平在一九七九年依照憲法稱：每個國民都必須接受四項原則的指導：社會主義路線、人民民主專政、黨的領導以及馬列毛思想。

應揚棄馬克思主義

方：馬克思主義是歷史的產物。它是用來



為毛澤東紀念堂舉行奠基儀式

了解上一個世紀的問題的，而不是當今的事物。牛頓在三百年前發明出了他的理論，它雖至今仍非常有效用，但是並不能幫助解決現在的問題，像電腦科技。馬克思主義屬於一個特定的文化階段，而這個階段早已過去了。它就像一件破舊的衣服，人們應該脫下來棄之一旁。

明：依你所說的，人們一定會認為：這一次共產黨有理由將你踢出黨去了，你可有自組一個新政黨的構想？

方：我曾自問過這個問題。但是在目前這種形勢下，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也許在三十年之內吧？也許當我們有跟台灣一樣的環境時，我們就可以組黨。台灣現在不只有一個政黨。

明：四個堅持是否會限制着中國，使得民主無從發展。

方：當四個堅持嚴格地被遵守時，民主不可能的。但是領導階層曾經說過，必須要發展馬克思主義，這句話就刊在人民日報上。我會經駁斥過這句話，當我們想要發展它時，就不可能同時堅守它。

明：但是如何才能讓現存的政治體系達到全面性的改革呢？

方：人們可以保留外在的形式而改變它的內涵。西方的新教會對舊教做過宗教改革，可是仍然使用相同的一本聖經。在中國我們也可以這麼做，人可以在店內懸掛羊頭，但是在店內出賣狗肉。

中國最有希望

明：你認為共產主義體系是可以改革的，但是至今還沒有一個成功的例子。

方：這當然是非常困難的。但是如果有一

個國家有這種機會時，那一定是中國。

明：甚至比在戈巴契夫統治下的蘇聯還有希望？

方：當然。我們有許多比他們優越的條件。簡單的來說，蘇聯共產黨在過去尚有一些建樹，像在國防上與科技上。他們的知識份子也有較多的自由，正像我們才剛獲得的一樣。與蘇聯相反，中國共產黨沒有任何成果可以自我宣揚。在過去的三十年來，他們的領導從未正確過。每一級的幹部因此都會有所領悟，連最高階層的幹部都承認過去沒有正確的領導。這是蘇聯所未經歷的情況。

明：中國共產黨真的沒有一件成果值得提議嗎？

方：你所謂的成果是什麼呢？乒乓球跟排球？那只是努力的成效，在別的領域裡就沒有這種表現。現在社會中的每一個階層對改革的要求已經是相當強烈了。人們對黨的信心已經是消磨殆盡，尤其是年輕的一代。

我有一個老朋友，他也是個物理學家。在解放之前他就是共產黨員，而且從事地下工作。在一九五七年，他被打成右派。但是他從來沒有對此抱怨過。不久前，他公開地說：「我一生從來都堅貞地相信共產黨。到今天我才覺悟到這只是一場夢。」許多知識份子都跟他有同樣的想法。

知識份子應有責任感

明：你一直說知識份子應該是社會的前鋒。這不就是柏拉圖所說的哲學家同時是管理衆人的政治家的觀念嗎？

方：知識份子並不是皇帝，然而他們當然是主要的力量，他們應該獨立而且自主，他們

負有重大的責任。

明：目前，共產黨已經肯定了知識份子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時，知識份子被貶為社會九個階層中最低下的一級。現在鄧小平的統治下，知識份子又被提昇到第三級，僅次於農工。但是知識份子仍然不能獨立。

方：是的。毛澤東曾對知識份子的獨立性做過這樣的描述：毛必須附在皮上。不改變這種情況，知識份子便會被視作工具一樣地被使用。現在正是知識份子展示他們力量的時候，沒有人應該受到威脅，這才是民主。如果我們不能做到這樣，中國很難成爲一個真正的開發國家。

魏京生的話是對的

明：在一九七八年曾有人說過這樣類似的話，魏京生曾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他因此被判了十五年的監禁。你，方教授現在仍然是自由之身，是不是因爲你是個著名的科學家，而魏京生只是個電工？

方：是的，在中國就是這樣。一個犯了禁的工人是很容易被處理掉的，政府並不憂慮工人階層的騷動，它很容易就過去了。在過去有不少這種騷動，然而它們並沒有被公開過。在國外，人們並不知道這些事，因爲工人們沒有國際性的聯繫。

明：對知識份子而言，這種情形是否就不同了。

方：學生的示威會讓政府擔憂，政府當局不敢掉以輕心地來處置學生，我因此堅信知識份子的力量是相當大的。我常對我的學生說：「有知識的人才具有影響力。」政府必須尊重這股力量。我告誡我的學生，重要的並不是大聲

疾呼，而是盡力的讀書，能在學業上有所成的人才能大聲說話。

我今天所說的就如魏京生在十年前所說的，再過十年興許會有更多的知識份子也會這麼說。人們應該無畏地批評他們的領導人，這是民主的一個表徵。難道因爲胡喬木是政治局的一員，我就不能批評他嗎？他們在上面的人就說過：毛主席是一個人而不是上帝。

明：有關胡喬木的事是怎麼一回事？

方：在一九八六年，我寫了一篇有關量子宇宙論的論文，胡喬木對我的論文提出了批評，他說我是個主觀的觀念論者。他用馬克思的



北大學生焚毀「北京日報」

觀點來批評我論文中有關宇宙是有限的、是可以掌握的觀念。他的理由只是因為恩格斯曾經在他某本書的書頁上寫過「宇宙是無限的」這句話。

我接受任何有敵意的批評。然而胡喬木了解一點宇宙論嗎？如果他了解一些有關宇宙論的東西，我會很樂意地跟他討論，要不然這根本就沒有意義。遺憾的是，胡喬木對此避口不談。

中國的人權比蘇聯還差

明：人權在中國的情形如何？

方：討論人權是很危險的一件事。人權在中國仍然是個禁忌，我們的情況比蘇聯還要糟很多，魏京生就是一個例子，然而還有千百名人士和魏京生有一樣的遭遇，只是他們的名字不為人知就是了。在蘇聯被列入黑名單的人士很少，我們不是，我們連個名單都不必有。

明：對國家的進步來說，民主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嗎？像台灣、南韓、新加坡和香港都沒有真正的民主，然而在經濟上仍然有極大的成就。

方：首先，那些你所提到的地方施行民主的程度都遠比中國高。其次，這些國家都在美國的保護之下，美國希望他們的經濟有進展。中國的情況不同，在中國政治上的民主及經濟上的民主是難以分開的。

明：鄧小平的看法則不同，他對中國人民說：富起來，富有是光榮的事。其餘的由黨來照料。

方：在我們那裡，黨不僅領導政治事務，別的任何事情也都在它的控制之下。它決定人們的生活方式以及思想。工廠應該由專業人士

來管理，可是管理權仍在黨幹部手中。農民是受惠於自由市場的開放，然而幹部却向他們說：你們仍然需要我們的許可，你們必須經常付錢給我們，腐化貪污的根源就在這裡。在中國，爲了要達到經濟上的民主，我們就必須廢除掉政治上的管制，這正是共產黨所害怕的事。

鄧的改革極為有限

明：鄧小平不是在經濟改革上有所開放了嗎？他難道也不民主嗎？

方：不，鄧的改革只是短期地穩定了現有的體系，鄧所避免的是整個體系的崩潰。共產黨正處於進退維谷之中，當他們進行改革時，他們的控制力量就會減弱；可是如果不進行改革，他們會更迅速地失去他們的力量。

明：鄧小平是西方人士心目中的英雄，一九八五年時代雜誌選他爲年度風雲人物，西方視他爲國際政治上的一個盟友。

方：我認爲西方對中國的認識非常膚淺。

鄧小平曾上過「時代雜誌」封面



明：鄧難道不是一個有見地的人嗎？他對一個新的中國不是也有一些未公佈的措施嗎？

方：不，鄧沒有一個整體的計劃，中國好像盲人想渡過一條急流一樣，只能一步一步地摸索前進。我們並不知道這條河就貿然強渡，而且也沒有回到原來的起點去。

明：鄧不能逆轉他的改革方向？

方：我不認爲可能，這樣一來，經濟會整個崩潰，共產黨也會跟着解體。在一九六二年，有數百萬名中國人因爲經濟上的錯誤措施而餓死，整個國家僅靠毛的個人威望來維繫。如今已經沒有人能有這種威望了。

明：然而鄧的許多改革確實很有成效。

方：很多人，尤其是外國人都認爲如此，在農業上是有增產上的成果。但是在中國，工業方面的改革根本沒有真正開始，薪金與獎金改革根本沒有成效。

全面進步方是進步

明：你總不能不承認中國民衆的生活現在是比較好吧？

方：冰箱與電視是比較多了。改革的確增加了通貨與消費品。

明：這難道不算進步嗎？

方：當然是，但是社會的進步應該是全面的，經濟固然是一個重要的發展指標，但是它並不是唯一的一個。阿拉伯國家是非常富有的，但是他們的社會並沒有進步。我認爲教育與文化的水準是先進社會的一個重要的辨認指標，糧食固然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對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更是如此。但是同樣重要的是：人必須了解他是個人。

明：中國現在的目標是要在公元兩千年時

，讓國民平均所得達到美金八百元。這難道不是大家的意願嗎？

方：當貧窮時，變得富有當然是比較好的，然而這並不是全部的目標。

明：爲了要加速現代化，中國輸入了西方的科技，你認爲這樣是對的嗎？

方：當然是。但僅是從這裡那裡進口一些西方的物品，或是買進一些電腦，這樣是不夠的。爲了要真正地現代化，中國必須引進西方的科學精神。中國文化雖然擁有許多深刻的洞察力，然而卻沒有邏輯。爲了我們的發展，我們必須接受西方文明的精髓。

明：中共當局譴責你受到西方思想的毒化，而且贊成全盤西化，是這樣的嗎？

方：我們必須全面地開放，至少，能引進有益的事物。但是我們不能失去自己有價值的事物。我從不認爲我們應該打擊中國的優良傳統，我極端反對中國社會中的封建關係。它們應該徹底地被剷除。西方的道德觀的確跟我們的不同，然而這並不表示它一定不差。

存在軍閥割據的危險

明：當你要求共產黨對整個體系進行改革時，這不是在要求共產黨自尋解體嗎？

方：沒有人能夠要求共產黨放棄權力，他們緊緊地握著權柄不放。我們應該考慮是否有迂迴的方法。難道權柄不會在短時期內自行瓦解嗎？

明：當這個權力結構崩潰了之後，中國必須有另一種形式的權力結構。你不認爲這樣會造成無政府狀態的混亂以及軍閥割據的危機嗎？

方：這種危機一直存在於中國。



中國電腦操作人員

明：當鄧死後，中國會是怎樣的一個局面？

方：在短期內局勢恐怕會逆轉，但就長期而言該會更好。很可能在鄧死後，毛的教條就不再有效力了。我們也能徹底地將過去三十年來的各種問題提出來討論。胡耀邦在今年一月提出不應該再到處懸掛毛的遺像了，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然而毛的思想仍然統治著我們。

軍中有人支持民主

明：軍方會在未來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嗎？

方：軍方一直是中國社會中舉足輕重的一股勢力。然而它也不是不能動搖的。每個階層的軍人有每個階層的觀點，舉例來說，我就收到許多軍人的來信。

明：有多少封？

方：好幾千封。那些通常是附有寄者姓名的明信片。這在中國是一種很勇敢的行爲。其中有一封明信片寫著：「如果這張明信片不能

寄達，那麼中國就沒有民主。」當我出境經過海關時，有一名警察走過來對我說：「你是方勵之嗎？你的問題都解決了嗎？你可以出國旅行了，真是太好了。」

已有被捕的心理準備

明：你確信當你回國時不會被捕，或者被下放到邊區去嗎？

方：我已經有心理準備了。

明：你能夠移民……

方：從前我會嚴肅地考慮過。現在我則不作此想。如果我離開了，我等於背棄了我的友人及學生。黨的高階層雖然在批評我，我仍然留在國內。雖然高幹子弟多在外國唸書，他們卻沒有遭到任何批評。

明：那些參加示威活動的學生，將會有怎樣的命運。

方：據我所知，尚沒有著名大學的學生被捕。但是我們知道，他們全都被拍照了。他們的名字也被列入黑名單了。過不了好久，共產黨就會開始有所行動了。

明：還會有何所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嗎？

方：從反資運動，我們一方面可以看出反對改革勢力的頑強；另一方面也顯示我們低估了他們的實力。我們太樂觀了。但是有愈來愈多的人了解到改革的必要性。我們不再革命，革命首先是極困難的事；其次它不一定會帶來好的結果。所以中國所能走的路就只有改革了。教育與知識份子的自由化是達成改革不可或缺的條件，沒有這種自由化，中國或者以及共產黨都沒有未來。

明：方教授，謝謝你接受我們的訪問。

王若望的風骨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娜欣

衆所周知，由於中共掀起的歷次政治運動

，皆以知識分子爲主要整肅對象，而毛澤東又洋洋自得地自稱勝過「焚書坑儒」的秦始皇一百倍；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在中共的嚴密的控制和無情的打擊下，似乎成了唯命是從、唯唯諾諾的軟骨群體。在人們的印象中，教授的稱號雖然使人羨慕，但在政治上却是極其軟弱的。一個小小不然的黨支部委員，便足以使一位學貫中西、馳名世界的大學問家噤若寒蟬。現在，這種狀況已有所改變。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等敢言之士對中共統治下的種種腐敗現象口誅筆伐，一申中國知識分子的浩然正氣，可欽可佩。而今年年初，當鄧小平這座左右搖擺的朽鐘擺到左方的時候，這三位知識分子便頓時遭到清算，這是順理成章之事。

可貴的是，方、劉、王三位並未被來勢洶洶的惡浪壓倒。最近，王若望在上海對一位美籍華人的談話，充分體現了這位著名作家的凜然風骨。

據法新社報導，王若望說：「中國貧窮落後的根源，是中共領導的錯誤。在中國，極左影響將繼續存在，直到重新評價已故中共主席毛澤東。」

作爲「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主要批判對象之一，王若望依然堅持己見，並直言不諱地觸犯「四個堅持」之天條，這種勇氣是難能可貴的。

王若望說：「我老了，沒什麼好害怕。我

要把話說出來，骨硬在喉，不吐不快。」

我記得，八〇年秋，影壇巨星趙丹患癌去世之前，曾發出最後的吼聲：「黨管文藝，文藝就沒有希望！」這條消息曾在當時的「人民日報」發表，獲得廣大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好評。同時他還表示，死期將至，他什麼都不怕了（趙丹死後，文藝界的中共黨官粗鄙而刻薄的罵道：「趙丹臨死還放了個屁。」）。

兩相對照，何其相似！

●兩岸風雲●

中國大陸將發行新彩票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張金梅

彩票，這種利國利民聚集游資的辦法，長期以來一直被中國大陸當局視爲「資本主義社會的腐朽事物」而不取。在這一點上，中國大陸似乎比其它共產黨國家走得更遠。人們知道，即便是在斯大林時代的蘇俄，當局也發行了形形色色的彩票。

六十年代初期，毛澤東倡導的所謂「三面紅旗」搞得天怒人怨，哀鴻遍野。被推至第一綫收拾殘局的劉少奇，爲挽救國民經濟的危機絞盡腦汁，曾提出發行國家彩票以利用鈔票回籠的建議，然而不僅未曾付諸實行，反倒成爲他在文革中遭到清算的一大罪狀。

近年來，大陸當局在發行彩票問題上態

關於他目前的處境，王若望說：「我被開除出黨後，沒有受到公開的騷擾。但我的家受到監視。今年六月十八日，我寫了關於上海學生遊行示威的文章，在香港發表後，公安人員馬上來查問我，搜查我的住所。原來我寫文章的草稿紙被媒姆賣給收廢紙的人，收廢紙的人看見我的名字，就向公安局報告。」

王若望還透露，他文章中寫到的兩個研究生，已被學校開除了；上海一家報紙的編輯因發表了他的文章而被停職。今年四月，一名青年幹部登門探望他，結果降職了。王若望在兩年前創建的演藝學校關門了，因爲學生們都害怕受到牽連……

在這種逆境之中，王若望不改初衷，爲億萬黎民仗義執言；如此風骨，較古聖先賢亦無愧色！

度搖擺不定，時鬆時緊。即以北京而言，最寬鬆時官方發售過一次馬拉松比賽有獎入場券，每券人民幣一元，獎品爲對大陸老百姓極具吸引力的大彩色電視機。發售之日，售票處排開了長龍陣，警察出動維持秩序，但是以待業青年爲主力的黃牛黨仍然十分活躍，以牟取暴利。是日也，本來引不起觀衆多大興趣的馬拉松比賽竟成了全市人民注目的大熱門，北京工人體育場人山人海，座無虛席。抽獎之前，廣播聲反復響起，告誡中獎者勿過於興奮，最好不要聲張，以免壞人垂涎，發生意外事件……

我出國前，幾乎各商店均有變相彩票。

為置辦出國用品，手頭積下一大疊變相彩票。但不久人民日報便發表社論抨擊這股「不正之風」，因而變相彩票全部作廢。

最近，國內將以籌集社會福利基金、興辦支助殘疾人、老年人、孤兒的社會福利事業為由，發行有獎彩票。為此，國務院四十四個有關部委負責人成立了「中國社會福利有獎募捐委員會」。前民政部長、現全國政協副主席程

●兩岸風雲●

台灣留美學生將有醫療保險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李建華

報載：為照顧台灣留美學生，北美事務協調會駐美代表處文化組，已與美國一家著名的保險公司達成協議，將於今年九月一日起推行留學生醫療保險計劃。

據文化組組長李慶平表示，鑒於許多留學生無法獲得妥善的醫療保障，一遇疾病或意外，往往陷於困境，所以特與保險公司接洽，為留學生提供一項價格低廉，但受惠甚多的醫療保險計劃。凡持中華民國護照、具有留學生有效簽證的學生及其眷屬，均可投保。

如果研究一下該項醫療保險計劃的細則，我們發現它確實是台灣留學生的福音。除牙齒之外，一切疾病均在保險之列。每月保險費二十多美元，最高理賠二十五萬美元。分娩補助近兩千美元，如投保人覺得有必要返台就醫，則保險公司依協定支付高達五千元之旅費：

過兩種不同的醫療保險。先是在領事館教育組

子華任該委員會名譽主任委員，現任民政部長崔乃夫任主任委員，鄧小平之心殘志堅的長公子鄧樸方等任副主任委員。有這樣一大批冠蓋壓陣，想來發行彩票之事可以大張旗鼓地進行了。

有趣的是，崔乃夫主任委員在號召群眾積極購買有獎彩票的同時，又稱應該抑制發行彩票的消極方面。所謂消極方面，係指彩票容易

參加合作醫療保險。每月交二十美元保險費，看病買藥則憑單據填寫表格，經本校大陸留學生聯誼會負責人簽字後，寄給領事館教育組負責人。數星期後，可以收到一張相當於醫藥費總額百分之九十五的支票。很明顯，由於美國醫藥費高昂，這種合作醫療只能應付小病小災，若是一場大病，這百分之五的費用豈是窮學生所能承擔的？

今年開始實行一種新的醫療保險制度。中國大使館與一家「實力雄厚、對我友好」(大使館介紹書中的原話)的保險公司合作，實施「中國留美人員醫療保險」(OSIP)。這種保險制度除牙齒外一切疾病全保，每月僅付二十元保險費，家屬亦可加入。

過了不久，中國大使館又來一信，謂：「中國大使館要求留美人員積極踴躍參加本項保險。由於該項保險為保健性質，是為全體留學人員服務的，希望大家能維護本項福利事業，互相支持。因美國醫療費用極為昂貴，希望大

助長人們的投機取巧的心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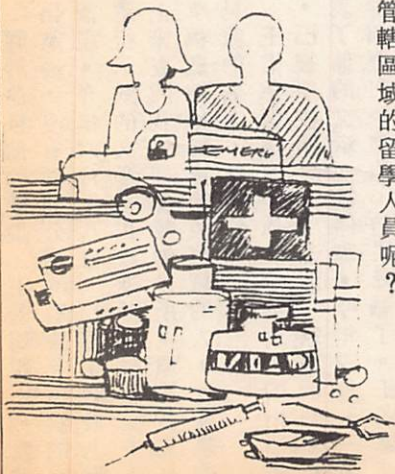
其實，彩票之所以對群眾有吸引力，正在於利用常人難免有的「投機心理」。否則，直言號召人們為老弱病殘慷慨解囊即可，又何必發行有獎彩票？崔部長這番想吃魚又怕腥的表白，正是所謂「社會主義現代化」理論與實踐相脫節的又一例證。

家注意健康，一般不宜因小有不適就去看門診，以免不必要的費用超出，影響全體留學人員醫療人員醫療保險費用的積累，以致在少數留學人員發生重病情況下，造成整個費用超支。

很顯然，這種說法與最初的宗旨已有些出入。

我有一個想法：既然設在北京和台北的兩個政府以「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自居，那麼，可否考慮將各自駐美機構實行的醫療保險制度使來自海峽彼岸的留學人員也受惠？

兩岸留美人員都是中華民族的精英，他們必將對未來中國做出重大貢獻。有鑒於此，兩個對立的政府是否有寬容的胸襟，造福來自對方管轄區域的留學人員呢？



老虎屁股也得摸

——大陸文壇有人批評郭沫若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周健

在中國大陸文壇上，郭沫若為天字第一號「不倒翁」，同時，又被人列為「四大不要臉」之首。縱觀其一生，早年投身新文學運動及革命活動，創作了許多震驚文壇的優秀作品。當革命進入低潮時，他又潛心於書齋，致力於甲骨文和前秦史的研究，頗有建樹。他是一位為各階級、各黨派所公認的大學問家，著作等身的文曲星。然而，他又是一位惹人非議的人物，以其「三八作風」(三次脫離中共、八次結婚或同居)被中共黨內外人士傳為笑談。

郭沫若的文學地位曾被認為是顯赫、不可動搖的。但是在其汗牛充棟的著作中，精品與莠草並存，也是人所共見的事實。遺憾的是，鑒於郭沫若官居高位(先任副總理，後當人大副委員長)，在大陸文壇竟無人敢道郭老夫子半個不字。

最近，這種不正常的現象終於被打破了。在今年第五期的「江漢論壇」(湖北省社會科學院主辦)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題為「郭沫若新詩成敗初探」的文章。此文作者單槍匹馬地闖入禁區，對郭沫若晚期的文學活動進行了尖銳的批判。筆者認為，這是繼去年有人直言批判魯迅之後，大陸文壇出現的又一可喜現象。

文章說，郭沫若的新詩創作道路，包含着豐富的 success 經驗，也具有深刻的失敗教訓。特別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後，郭沫若生活在社會的最上層，物質生活優裕，十年動亂以前，精神生活也一



郭沫若

直處於順境，加之公務繁劇，年事漸高，對下層人民的疾苦接觸了解較少，因此，對人民的喜怒哀樂，就相當隔膜了。他主要從報紙、電台、會議文件上認識生活，從走馬觀花式的參觀訪問旅行休養中體察民意，因而創作的作品，反映不出時代的脈搏。

文章還說，郭沫若把藝術當作政治的「留聲機」，到了一九五八年以後，這情形達到登峰造極，沒有任何詩情畫意了。

筆者完全贊同上述觀點。放浪形骸的左派文人郭沫若，於中共立國後成爲首席御用文人完全背棄了早年的文學革命道路，淪爲舞文弄墨借以自保、取寵的頭號文丑。斯大林在世時，郭沫若曾用肉麻至極的「詩句」大捧之，是同類詩文中爲最者。

對於混世魔王毛澤東，郭沫若更是着力吹捧，唯恐後人。他曾爲老毛在飛機裡工作的照

片題詩，稱：「艙裡艙外兩個太陽。」對於老毛的三面紅旗政策，亦採用順口溜一般的短詩進行歌頌。若非標題之側確鑿無誤地標出「郭沫若」三字，人們很難想像這些順口溜出自「女神」等不朽詩章的作者之手。

郭沫若是極善於辯觀風向以利生存的。文革爆發前夕，這條變色龍率先發表聲明，說自己的全部著作都應該燒掉。這一嘩衆取寵之舉再加上周恩來在毛澤東首肯下的力保，使他在文革初期沒有吃什麼苦頭。

及至文革中期，郭沫若拋出一本奇書——「李白與杜甫」。這是一本用現代政治觀點強姦古人作品代表作。在這本書中，杜甫被說成是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而遭到輕浮的、不能自圓其說的貶斥；而李白則被抬舉到了九霄雲外。李杜二人之所以得到不同的評價，原因無它，只是爲了迎合老毛「揚李抑杜」的古怪心理。只是，郭沫若昧着史家良心寫作此書時，已經全然忘記在數年前，他曾在成都杜甫草堂題詞，將其稱爲「詩中聖哲」的事實了。

中共立國後，郭沫若一直過着養尊處優的貴族生活。他的地處北京市什利海的豪華寓邸，令所有有幸入內參觀、逗留者驚嘆不已。順便提提，筆者少年時有位朋友是個不務正業的纨绔子弟，經常出入郭府。一日，他生了盜心，携帶鐵錘、繩索等作案工具，在傳達室登記姓名後進入這座大院落，然而正當他撬開一間密室準備大顯身手時，警鈴大響……結果他被送往西城公安分局。在中國大陸，身爲文人而家中警戒如此森嚴，郭沫若爲唯一者。詩人之心，在這種高高在上的特權生活中消失殆盡，五四以來最重要的大詩人郭沫若自一九四九年後再也沒有寫出值得注意的作品，也就不足爲怪了。

數學家張廣厚之死

和大陸中年知識份子問題

(美洲) 柯奇

中國著名數學家張廣厚於今年一月廿六日因肝硬化去世。他的合作者，現任數學研究所所長楊樂，悲痛地對記者說：「我在主持向張廣厚遺體告別儀式時，我不願意相信這就是他的遺體。張廣厚剛剛五十歲呀！正是才華橫溢，奮發有為的中年時期，却過早地離開了人間。」

張廣厚和楊樂是繼陳景潤之後在數學某一領域內發現定理的年輕一代學者，他們的成果受到國外數學界的高度重視，中共報刊會大量予以介紹和宣傳。為什麼張廣厚像許多中年知識分子那樣，過早地夭折呢？其原因何在？據今年四月六日「體育報」採訪政協委員楊樂的談話，及香港「大公報」五月十一日轉引「中國婦女報」的消息，楊樂痛陳原因說：「中年知識分子都是科技、教育文化、衛生等部門第一綫打頭陣的排頭兵，但長期以來生活條件不好，負擔過重，待遇偏低，造成他們身體支出不大於收入的超負荷運轉，久而久之，便積勞成疾，過早逝世。以張廣厚為例，大學一畢業就趕上三年困難時期，他在讀研究生時已有一個小孩，每月四十元錢，寄回二十五元，自己只有十七元的生活費。一個科研人員愛書如命，去掉買書的錢，每月所剩伙食費就少得可憐了。一九六七年畢業後工資調到六十九元，第二個孩子又出世了。作為長子，還要給老家的雙

親寄去二十元，這六十九元的工資延續了十幾年直到一九七七年，生活是十分困難的。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都是這樣過來的。」楊樂透露說，張廣厚去世後，二月份應用數學研究所一位五十歲的研究員因患感冒引起心臟病發作，突然死亡，聲學所最近有兩位中年知識分子去世，軟件所去年也有中年知識分子去世，計算技術研究所幾乎每年都有一至二名四五十歲的中年知識分子病故。中年知識分子的一張張訃告，一份份死亡通知書接踵而至，怎能不引起人們的深思呢？因此楊樂呼籲：「請關注中年知識分子的身體健康。」

共產黨政權是一個敵視和反對知識分子的政權。「毛選」中雖然也說了些如「革命需要知識分子」的好聽話，但在實際上根本不承認知識分子對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否認知識分子的獨立性，甚至把知識分子當作敵人看待。無論「解放」前或「解放」後的知識分子，也無論其出身如何，一直把知識分子列入資產階級的行列，都必須到工廠當中去，改造思想和世界觀。

四人幫垮台後，中共新統治集團面對崩潰的經濟，總算在知識分子問題上頭腦有所清醒，開始認識到知識分子的作用，特別是主持過科學院工作的胡耀邦，對解放知識分子更加盡力。七十年代末開始給知識分子摘帽加冕，也

就是摘掉資產階級的帽子，加上無產階級的桂冠。八十年代初，對知識分子的評價直線上升，報刊上指出，五十年代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尤其珍貴，可視為「國寶」，聶榮臻老師（他曾掌管過科委系統）親自撰文闡述國寶的涵義及作用。既稱「國寶」，大概和熊貓同等貴重，理應受到稀有動物所應有的保護。但實際情況是只打雷不下雨。好不容易盼到加工資，名額有限，那些黨棍領導人先照顧了自己和親信，該加的卡住不給加。知識分子的工資一向低於同類工人的工資，自五十年代初到文化大革命前，一共只調過兩三次工資，每次僅調一級，約六元人民幣。以筆者本人為例，五十年代初畢業於某名牌大學，基本工資五十六元，進某研究所時調過一級，六十二元，到六十年代初調一級六十九元，這六十九元工資一直拿到八十年代初還不能再調一級。而一個同時進工廠當工人的小學或初中畢業生，從五十年代到文化革命前，已經可以拿到八十多元，甚至更高的工資了。這是相當普遍的情況。

據前引「體育報」記者的採訪報導，「楊樂讚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說，黨的知識分子政策使知識分子的工作和生活的困難得到相當的緩和，這幾年知識分子感到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但總的看，中年知識分子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條件仍低於社會平均水平。」

他說：「根據公佈的數字，北京人均收入九百三十元左右，四口之家每年收入就是三千七百元，月收入在三百元以上。而四十五至七十歲左右的知識分子呢？副教授、副研究員的基本工資、職務工資加工齡工資和獎金每月約一百四十元，講師、助理研究員約一百二十元。一個中年知識分子家庭按一個副研究員、一個是講師、兩個孩子計算，四口人每月收入二百六十元，低於上述的平均收入。知識分子大多數沒有過多的要求，但是這種低於平均收入水平的情况會挫傷他們的積極性。」

楊樂談到的情况是令人吃驚的。迄至今年，中年知識分子，甚至有職稱的，家庭平均收入仍不及社會平均收入，更不用說跟農村的萬元戶相比了。從橫向看不及社會平均收入，而從縱向看仍不及過去建國初期有同樣職稱的收入。從講師到副教授，從助理研究員到副研究員，其臨界工資約為一百四五十元，現在一個副教授和副研究員，除基本工資外，還要加上其他種種名目，最後才能得一百四十元，實際比過去下降，基本工資最多不過一百二十三元。在物價高漲的今天，這點不穩定的錢，維持基本生活都困難，怎能談得上改善生活？筆者的朋友，兩口子都是副研究員，每月總收入接近三百元，一個孩子上大學，連學費帶伙食每月得花一百多元，一個人的工資就全部報銷，餘下一人工資兩人花，且不談還要養老人的錢了。

楊樂又說：「張廣厚的肝炎是一九八三年普查身體時發現的。對於他的病，中國科學院和數學所都非常重視。為給他治病，院裡撥出專款，並和所裡幫他聯繫住過北醫三院、協和醫院、通縣結核病醫院和中日友好醫院等。但總的看，知識分子看病、住院比較困難，有的

同志有重病難入院，有些研究員甚至學部委員要住八個人一間的病房，這樣就難以保證他們的病得到及時、認真的治療。

「知識分子身體狀況差的另一個原因是缺乏必要的身體鍛鍊。但這在客觀上也存在一些困難。早先中國科學院在中關村有個大操場可以活動，但現在這個場地早已不能作鍛鍊用了。至於研究所，連辦公室都很緊張。十六平方米的房子坐有六、七個人，哪裡有活動的地方呢？」

看病難，住房難，這是大陸普遍的情况，對於無權無勢的知識分子說，二者自然是難上加難。在科學院系統，無論辦公用屋和居住用房長期十分緊張，嚴重影響工作和生活。社會科學院亦是一樣。因為缺屋，有的所室的研究所人員只能住在辦公室，以所為家，過道上擺着一座又一座爐子，烟囪林立，一住就三年五載，甚至十年八年，有的至死也沒有分到一間住房。至於其他的福利待遇和文娛享受，愈往下就愈少，最後幾乎等於零。

中年知識分子的待遇問題，這幾年報刊上時常有機會提到。中年知識分子因生活條件差和過度勞累而早逝的事例亦時有披露，如前幾年大加表揚的蔣築英和羅健夫。但看來至今仍在使用多而關心少，幾年過去了中年知識分子的生活條件並沒有得到真正的改善，死亡率也未下降。此外還要指出，在各層領導人中過去年輕視和忌恨知識分子的心理仍然存在，有時表現出對知識分子的壓抑和排斥，使知識分子心情不舒暢，影響到健康。

正值筆者撰寫這篇文章時，得到消息說筆者的一位親戚、某學院教授，年僅五十出頭的中年知識分子因病去世的消息。筆者謹在此對那些早逝的中年知識分子一併表示哀悼。

連郵費每本\$8.75美金
劉添財

十年一結——「新台獨真相」補序

十年前我把有關台獨問題的文字集結出了一本「台獨真相」。光陰似箭，匆匆又一個十年了，整理了一番出了第二集「台獨真相」名之為「新台獨真相」。再過十年還會整理出第三本「台獨真相」將名之為「新新台獨真相」，那第三本將是最後一本了。

本人這一生與台獨結下了不解緣，由其始觀察到其終，做了一個忠實記錄。住在台灣的人應該對這些記錄最感興趣，可惜的是第一集第二集都無法進入台灣，都受到當道的封鎖。若說它的封鎖是死我為敵也非事實，當道的心態只是一種駝鳥主義，只希望能避開談這個問題拖一天算一天而已然而今日的內外形勢已不允許它再迴避掩飾推拖了，島內台獨人士已經公然喊出獨立口號寫出獨立標語了，

再不好好處理這個問題，台灣這條船就會沉沒！

大家要冷靜的理智的把這個問題攤開來談，配合台灣解嚴、開放黨禁、報禁等一連串民主做為，讓我們也把這個關係台灣生死存亡的大問題解決。筆者十七年多來親自觀察並筆掃匹馬參與台獨活動，可謂有第一手的了解，雖然未遭狂激「小台獨」人士之暴力毒手（多謝手下留情），現在想起來也不免冒一頭冷汗。如此得來之資料甚為可貴，為討論台獨問題及台灣前途問題所不可或缺。更可告慰者，台獨人士愈來愈了解筆者是他們的誼友畏友而不是他們的敵人，因此也對筆者愈來愈友善，真是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將來繼續發展下去「小台獨」有可能漸漸變為「大台獨」，那麼他們就會成為我的同志了，讓我們共同來為台灣打拼吧！

10年來的綜合性報導

台灣禁書
新台獨真相
劉添財著

每本零售美金8元

郵購另加郵費0.7元，
共\$8.70元

支票抬頭請開 T. LIU 寄 P. O. Box 7586 Rego Park, NY 11374

老美科學家給中共出難題

(中國大陸留學生·美國) 草民

今年六月美《科學家》半月刊第十四期刊登以《中國阻攔直言物理學家訪美》為題的署名文章，報導方勵之回信加州大學桑塔克魯茲分校校長羅伯特·辛舍默，稱「純因政治上的原因」，謝絕老美同行對他訪美講學科研的邀請，方勵之之所以謝絕邀請，蓋因中共官方認為「方此行有可能引起在美的中國學生的不穩定」。稍瞭解中國國情和關心近半年來中國政局變化的人都明白，中共此舉是意料中事，不值得大驚小怪。老美科學家們可能是對幾萬萬光年之外的星球研究得太多，無心顧及地球上「不懂中國規矩，按共產黨的話叫做『沒有腳踏實地』。中國有不少又紅又專的科學家，如錢學森、周培源等，由你數吧，你們請哪一個不行，偏偏要請老方，真是哪壺不開提哪壺。難道不知道他是被我們黨清除出去的不光彩人物，全盤西化、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頭子，批判的對象？知道他不能來就得了，你們還不罷休，竟稱要再次延長邀請，這不是存心和我們黨過意不去嗎？經過這半年的鬭爭，老方的那些貨色在國內已沒了市場，他真到了這美國，萬一又放毒可怎麼辦？雖說在國外相信老方那一套的僅是一小撮人，雖說我們黨最相信群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都願跟黨

走，而且黨也最能理解能拿博士、碩士學位的並不都是傻瓜，多少有點分析能力，但我們畢竟留學多年，身在海外，環境不同，學習工作緊張，加上各院、系、班又無黨支部書記一元化領導，思想改造肯定抓得不夠緊，萬一有那麼幾個學生又上當受騙，這責任你們老美負得起嗎？誰不知老方盡是花言巧語，說起話一套套的，欺騙性可大了，大學生遊行不就是他挑動起來的嗎？

文章還報導說，該校一位天文學教授格羅斯·林亦對此事表示不滿，此公甚是直言坦率，指責「中共言行不一，限制老方學術自由」，稱中國形勢「變幻莫測」。整篇文章為老方叫屈，好像我們黨做錯了什麼事。你看看，雖然名為「科學家」報，但到底還是資產階級的宣傳工具。其實要說這次虧待了老方，那可真太沒歷史知識了。想當年，毛主席搞「引蛇出洞」，設「陽謀」反右派整肅老九，知識界那領頭的著名六教授，有哪個不丟官降職的？全國各地揪出的大小右派幾十萬（老方那時只是一名普通右派，當時右派裡比他有名望，本事大，天資高的才子不知有多少），哪一個有好果子吃？降職降薪，開除黨籍公職，批鬥挨整

，誅連九族，這些事太不值一提了，像電影《牧馬人》的主人公那樣流放大西北還算好的，多少人妻離子散進大牢，有八把命都搭進去了。其實這也不能怪他老人家，是你們老九自找的，誰讓你們提意見，向黨「進攻」。你可能會說老人家只是對黨外老九愛發點脾氣。不對，他老人家可無偏見，他對來自五湖四海的共產黨員同志也一點不含糊。反右勝利之後，老九不敢吱聲了，老人家又扛起三面紅旗，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糧棉畝產天天放衛星，創奇蹟，大鍋飯，人人管飯吃；全國砸鍋煉鐵大躍進，超英趕美，熱火朝天，準備迎接共產主義了。這時候，和老蔣、東洋鬼子、西洋鬼子打仗屢建軍功，曾被老人家稱為大將軍的老資格中共戰將彭德懷元帥，却呈上萬言書，婉言相勸，要老人家少說幾句大話空話，多少實事求是一點。哪知一下子把老人家惹火了，人家正在興頭上呢，你不鼓掌叫好反倒潑冷水，為大好形勢抹黑就是反黨，結果廬山會議定罪彭黃張周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本來嘛，老人家得了天下後成天所聽的是「萬歲」、「大救星」，要是真實事求是了，哪還有什麼萬歲呀。結果，老彭被撤了職，終日軟禁，在老人家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革中，在江青授意下，老彭被紅衛兵殘酷鬥爭，受盡了屈辱，最後被革命紅小將給整死了。其實，這位一時的三軍統帥，唯一的罪過就是因為冒老人家的天不韙，為百姓說了幾句大實話。你說冤不冤？

反右過去三十年了，這次鬭爭（不搞政治運動），老方當了頭子，鬧民主自由，搞「全盤西化，不要四個堅持，而且竟然在公開場合點趙紫陽、張百發、胡喬木這些大官兒的名字，揭他們的短兒。憑這滔天般的罪行早該被打翻在地，再踏上幾萬只腳，讓他永世不得翻

身了。可人家黨中央的處理真是夠意思。誰都
得承認，老鄧真比他老人家開明，寬容，有肚
量和胸懷，到底是在文革中也挨過整的人，知
道不好受的滋味。這回老方福大命大造化大，
沒被抄家隔離，沒剃頭戴帽遊行，也沒嘗噴氣
式，甚至萬人批鬥大會都沒開，僅僅是丟了黨
票和烏紗帽，非但沒流放大西北，反倒進了京
城，在北京天文台當上了研究員，開了個夫妻
團圓。這還不說，老方被老鄧一點名，可真露
了臉，建國後中國老九是沒人看得起的下九流
，今兒可好，大報小報、電台、電視全國上下
反擊資產階級自由風，僅十幾天的工夫，一個
無名老九轉眼成了風雲人物，知名度超過了副
總理。對一個沒有改造好的老九兼老右這麼抬
舉和照顧，當時大伙聽了都一楞，這要是讓現
在還在北京十四陵裡輪着的那老人家知道了，
還不得氣得活過來。你們大家好好想一想，反
右到現在僅僅三十年，在這麼短暫的時間裡，
中國的政治生活發生了多麼巨大的變化啊！僅
從這一點也可看出黨的偉大進步，「中國人民
今天享受着空前的民主」這該真是一點不假，
你老方自己也拍拍良心，好好想想當年，比比
現在，憶苦思甜，你不磕響頭、燒高香，還等
什麼？！

那文章最後報導，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亦
打算延長對老方的邀請，竟稱「門尚未關死」
，仍盼老方能來。老美科學家死心眼兒，政治
上太簡單、幼稚，沒有階級觀點，不懂黨的方
針政策。實際上老方訪美難以成行，有兩個原
因。一是老方堅持「反動立場」，如果他認錯檢討
，事情也就好辦了，黨對犯錯誤的同志的一貫
政策是給出路的政策。其實老鄧當年也向他老
人家認過錯，你老方何必那麼認真呢！快給人
家張百發賠個不是，說句好聽的，人家老張來

美開高能物理學會有什麼錯？方你當時還是黨
員，連我這基本群眾都懂，這叫黨的領導幹部
知識化。你老方生下來就懂天文？不懂就學嘛
，別拿你那北大畢業嚇唬人，華羅庚是哪個大
學畢業的？愛迪生上過幾天學？誰不是從無知
到有知？從外行到內行？你老方有什麼了不起
，別把人都看扁了，說不定過幾年，大英皇家
學會還要請老張去演講試管嬰兒，保不準五角
大樓的溫伯格還要向副市長同志請教星球大戰
計劃呢，這些誰能說得準？「在共產黨領導下
，什麼人間奇蹟都能創造出來」。可老方不懂
這個理，老牌右派，老百姓叫「鐵了心了」，
共產黨叫「不可救藥，死不悔改」，不願低頭
認個不是。

第二個原因是在美國學習的兩萬多大陸學
生不好管治，真有那麼幾個留學生吃了兩天不
要糧票的漢堡包生了豹子膽，敢寫，敢簽聯名
公開信，上書中央。白面書生們也是健忘，跟
當年的老右學，給黨提意見。其實要在國內，
別說兩萬，二十萬，二百萬又怎麼樣，中央一
句話，滿街鬧民主的學生還不是都回學校反思
去了。可這裡是資本主義世界，總不好把遊行
時那些把學生帶離現場的武裝警察同志也調到
美國來吧，老方難改，留學生不聽話，決定了
老美科學家的邀請無法實現。

其實我倒有個主意，如果你老美真心誠意
想合作搞科研，而不是存心和我們黨找麻煩，
扛着望遠鏡到北京去不好嗎？美國的月亮又不
比中國的圓，地球自己會轉圈，星星在哪不是
看，再不行，約老方去一個沒什麼中國人的地
方，北極洲或南極島，最後實在不靈，乾脆約
他去遠離地球的空間觀察站，保險沒中國人。
你猜怎麼着，弄好了，說不定老鄧真能批准呢

天心針灸診所

主治內、婦、傷科各種疑難雜症尤對急性慢性腰
背肌勞損、風濕病、過敏性鼻炎、陽萎、月經
不調、子宮肌瘤、乳房腫塊、經痛、更年期綜
合症、各種頭痛、面神經癱瘓、胸背腰腿膝踝
疼痛麻痺癱瘓、車禍後遺症、高血壓、胃腸潰
瘍等有顯著療效。

收費低廉，接受醫療保險

581 ELLIS ST., S.F. CA. 94102
地址：760 Market St. # 718, S.F. CA. 94102

- 留學生憑學生証
半價優待
- 接收藍十字保險卡
- 近BART車站

歡迎電話詢問、預約：
TEL: 415-788-7866
415-474-3442

Polo Tours & Travel Co.

天下
旅遊

洛杉磯：202 S. Lake Ave. # 250
Pasadena, CA. 91101
818-356-7533 (24小時)
舊金山：209 Post St. # 702
San Francisco, CA. 94108
415-982-0186

天下
旅遊

- 加州各地旅行團 ● 廉價機票 ● 親切服務 ●

AGA Warehouse Inc.

- 進口傢俱、禮品及各項擺飾、玩具
- 提供留學生打工機會
- 供給灣區各Flea Market貨源
- 提供San Jose大市場創業資訊

有意者，請電：415-258-9792, 258-9902

天天電腦工作介紹中心

- 您快要獲得電腦學位嗎？
- 您對目前電腦工作待遇不滿嗎？
- 您天天煩惱找不到工作嗎？
- 您希望找個能辦綠卡的工作嗎？

請寄 Resume 到 P.O. BOX 4249
Highland PK, N.J. 08904

台灣需要民權

不要民拳

(台灣新移民·美國) 鄒國仁

民主自由與法治是一體的兩面，是每一個現代的中國人都明白的淺顯道理，在台北一些

爭民主的人，更是掛在口中講個不停。但是自從台北開始宣布要解除黨禁和戒嚴法以來，一些「伸張民拳」的事件就不斷出現，等正式宣佈解嚴之後，社會上更出現了一些令人憂心忡忡的事。早在正式解嚴之前，台北就有人表示，解除戒嚴之後才是真正緊張的開始，如今打開報紙大家只為國際間對台灣的民主進展表示讚揚感到欣喜，但我却為一些「伸張民拳」的事感到心憂。理由再簡單不過了，在「民拳」之下是不可能民主自由的，誰的拳頭大誰就有自由，那是一個弱肉強食的社會，民主也將變成一句騙人或自我安慰的口號。

法國羅蘭夫人臨上斷頭台之前說，「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名而行！」台北如果走上「民主、民主，多少民拳假汝名而伸張」的道路，誰敢擔保不會出現小說「雙城記」的情形。

造成今天這種情形，執政的國民黨、反對

派的民意代表，尤其是激進分子，加上一些盲從的民衆都應該負責。

國民黨由於長期執政的結果，在要求民主浪潮的衝擊下，有些應變措施並不恰當，造成種種今天一一顯現出來的後遺症。例如中壢事件，這是國民黨到台灣之後受到的第一個重大打擊，為了怕把事情鬧大，警察奉命「罵不還口，打不還手」，結果在以後的高雄事件，以及今年六·一二以後社會上發生的一連串種種群眾性街頭運動，維持秩序的警察成了一些別有用心和盲從分子打罵的對象。

就以今年八月五日台南市的青少年飆車事件為例，就可看出別有用心的人如何在利用「罵不還口，打不還手」。

所謂飆車，就是騎在摩托車上，風馳電掣的在公路上比賽，這在台灣的交通規則下是不允許的，因為這些超速、蛇行、佔用快車道甚至戰備公路的行爲，對公眾的生命財產是一種威脅。八月五日凌晨，台南市警察局交通隊在取締飆車時，引起了暴亂，群眾用磚塊攻擊警察，打傷了二十四人，連高級警官督察長劉再

松的下顎也被擊中，流血不止。一批青少年不但將警方的福利社洗劫一空，還縱火燒警車，燒警方的檔案資料，最後不但燒掉了交通隊，連旁邊的民房也跟着遭殃。

警方在事後逮捕了一些嫌犯，他們供稱當時有一名民意代表在場「聲援」，聲稱警察不敢打人，他們才放胆砸警車。這名民意代表說，「警察如果你打你一下，我們可以打他十下。」另外還有人說，「沒關係，警察不敢抓人」

難怪一名警察事後撫摸着被砸凹陷的護頭盔，輕嘆着：「這就是解除戒嚴後所追求的民主嗎？」

「罵不還口，打不還手」本是不得已的權宜之計，一旦成了「常規」、「慣例」，群眾養成了對執法人員打罵的習慣，社會將永無寧日。誰的拳頭大，拳頭硬誰就可為所欲為，而且還處處披着民主的外衣，時時喊着自由的口號揮舞着拳頭，升斗小民的身家性命保障何在？最近從台北來的朋友，提起民進黨及反制團體在台北的街頭運動中，一些壯漢動輒追打反對他們的人，仍心有餘悸。連在場的採訪記者也受到被毆的危險。

一些社會上的激進團體和分子，也目無法紀，動不動就要以「私刑」對付反對自己的人。例如「反共愛國陣綫」的成員周慶峻，七月二十五日在高雄中信飯店受到「超宇宙滅共大同盟」的圍毆，強迫周慶峻寫「悔過書」，並強迫負責現場指揮的高雄市警察局副局長張鵬程，在「悔過書」上簽名見證。大批群眾包圍中信飯店，造成中信飯店營業的重大損失。

警方事後將高雄門市議員朱星羽等人依妨害秩序、煽惑他人犯罪、公然侮辱及妨害自由、恐嚇等罪嫌，函送高雄地檢處偵辦後，有立法委員張俊雄者，於七月三十日上午前往地檢

處拜會首席檢察官鍾曜唐，表示對這一事件的關切，請檢方慎重處理。鍾曜唐隨即表示，保證以超然態度處理該案，絕對客觀、公正依法處理。我認爲立法委員的關切、首席檢察官的保證都是多餘的。

所謂關切，實際上就是聲援朱星羽等人。檢方辦案應客觀、公正依法處理，何須保證？

群眾在抗議時，動輒要警方或對方「把人交出來」，這是非常可怕的現象，充分顯示了群眾完全沒有法的觀念。台南市的飆車青少年，說是警車在取締時沒有開車上的警示燈，使飆車手撞上警車致死，在包圍警方交通隊時，要警方把兩名警員交出來（事後證明，警車並無撞痕，是兩名飆車手看見警車慌張，自己互相碰撞的）。飆車手在快車道上已屬違規，但還是別的車子擋住了他們，有的放火燒人家的車子，有的把別人車子推到公路外的排水溝，發生擦撞之後，還仗着人多，強迫對方賠錢。高雄煉油總廠的三名職員，開車撞倒了抗議群眾的旗桿，群眾也是叫嚷要「把人交出來」。法律如果不能保護每一個人，尤其是守法的無辜者，任憑拳頭大的人予取予求，後果的嚴重性無需在此多言。

台灣的群眾運動，可以說是由民進黨和另外一批反對派在近年內搞起來的，現在是國民黨的頭痛問題，不久的將來就會成爲民進黨的頭痛問題。

現在民進黨的一些立法委員，縣市議員因爲在罵人、打人之後成了名，變成了許多盲目群眾、是非不分者心目中的英雄，他們以後會逐漸去競選縣市長，而且一定會有人當選。等他們主持了一縣、一市的政務後，我絕不相信他們的每一件施政或措施都會令所有的人滿意，那時他們將成爲群眾抗議的對象，群眾會要

他們「把人交出來」，群眾會把當初從他們那裏學來的辦法，用在他們身上。

民進黨的人應該看到「自力救濟」的可怕後果，應該設法消弭都來不及，何能繼續加以鼓動、運用？民進黨過分相信群眾運動，以後會被群眾運動反噬。

國民黨的許多作法不當，助長了自力救濟的氣焰。

台北市的果菜承銷人因爲不滿營業稅的微收，先是由兩個立場溫和的公會和市政府交涉，沒有結果，最後由激進派領導的罷市，使台北市在七月二十三和二十四兩天的果菜供應大減，台北市政府終於在七月二十五日向抗稅屈服，一九八六年十月至十二月分的一千八百萬新台幣營業稅（以台幣三十兌一美元計算，相當於六十萬美元），全部由台北農產運銷公司承受。

這件事情發生後，連國民黨的中央日報都說，公權力受挫，社會公理與正義何在？納稅是國民應盡的義務，這個惡例一開，以後任何團體都可以用罷市來達到抗稅的目的。應該繳稅的有一千零三十一人，有四百多人在最後一刻去繳了稅，對這四百多名守法者，中央日報在特稿中說，「無異是赤裸裸的上了一課：守法者必然吃虧，笨蛋才去繳稅。」

七月二十六日的中央日報海外版還報導，在獲悉市府讓步的決定後，果菜業者喜形於色，在拍賣場上，正在舉行說明會，一名業者高聲的說，「以後大家一定要團結，十三年的問題一次都解決了。」然後承銷人笑咪咪的開着小發財貨車、賓士轎車離去。中央日報的記者在特稿中問：「他們真的沒錢繳稅嗎？」

任何事都有傳染作用的。果然，到了八月上旬，基隆、台中、高雄關的報關業者，爲了

出口貨物課徵商港建設費的問題，連續兩天採取不投單、不報關的抵制行動，使台灣的海運大癱瘓，出口貨物呈現停頓，各地貨櫃場雖然擠滿了等待結關的出口貨物，却因此使定期船公司無貨可裝，被迫空船開航或延長停靠碼頭時間。出口商也因此不能押匯，資金周轉發生困難，遭受重大的損失。

政府沒有妥善的辦法，甚至自毀立場，民間事以情緒化的方法來達到目的，反對派領袖教會了群眾走上街頭，使得社會上完全沒有法治可言。沒有法治的社會是不夠資格談什麼民主、自由的。

如果不確立法治的基礎，台灣不管今後再有多少次選舉，都不會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

徒法尚且不足以自行，何況台灣今天還有許多法律是不合時宜的，加上在朝在野的人目中無法，在那裏玩法，民間一些黑社會分子無視於法律的存在，公然向公權力挑戰，使得台灣社會上暴戾之氣有增加的趨勢。以前還有一個戒嚴法在那裏，對一些黑社會分子多少還有一些嚇阻作用，如今戒嚴法取消，一些管訓中的流氓、黑社會分子一個個的放出來了，他們一回到社會之後，不但成了同伙中的英雄，爲非作歹更加明目張胆。在華文報上看到黑社會分子向工商界敲詐勒索的情形，令人心驚。不法之徒可以公然亮出兇器，到一些工商界負責人的辦公室去勒索，而且還表示「一看得起你才來拜訪。如果報警，只要你計後果，儘管請便」，許多工商界人士，尤其是建築界，因此不願再作投資。

解嚴是件好事，中外都表示歡迎，但解嚴之後如果法律、執法機構不能保護善良的百姓，會爲社會種下亂源。建立健全的法治社會，是台灣今天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

台灣應在政治上對大陸實施反燒法

(華僑·美國)周立仁

不久前，紐約的世界日報刊登了一則消息，說是大興安嶺火災時，台灣的森林學教授提出了反燒法的救火方法，中共採用了這種方法。反燒法就是火從你前面來，你在自己背後也放一把火，燒掉部分地區，火到了你身邊已經無物可燒了。

台灣在大興安嶺森林大火中，提出了反燒法有效的建議。其實台灣在政治上有許多地方也可實施反燒法。眼前就有一個絕佳機會：將對美留學生、學人及眷屬的保險，擴大到大陸留學生。

據七月廿八日和八月八日的紐約華文報章報導，國府教育部駐美文化組，已洽妥美國最大的保險經紀公司 PENTECO，從九月一日起，受理台灣留美學生、學人及其眷屬的保險。內容是：凡是六十五歲以下的中華民國公民，在美國大專學校接受教育或從事研究工作者均可投保，學生眷屬或子女居住美國境內者，亦可投保。保險費單身學生每月美金二十七元，學生及配偶每月六十五元，學生及全家（包括配偶子女）每月八十元，由留學生自由申請參加保險的給付項目包括：

1. 主要醫藥給付：被保險人因疾病或意外受傷，所需醫藥費用，第一個美金一萬元由保險公司全額給付，超過一萬元部分由保險公司

給付百分之八十，最高給付金額為美金二十五萬元。

2. 懷孕分娩最高給付額美金兩千元。
3. 被保人因疾病或意外受傷須送回國內或他處接受治療，保險公司可給付最高金額至美金五千元，以供支付機票及隨行護士或醫生費用。

4. 學生意外死亡給付美金一萬元。
5. 被保人死亡，遺體運回國內，其棺木及運費，最高給付額美金五千元。

從這些資料看，條件是相當優厚的，如果大陸留學生也能享受，對他們是非常實惠的福利，台灣何不把範圍擴大，把大陸留學生也列為對象。而且保險是自由申請參加，並不增加台灣的負擔，但却可收到極大的利益。因為在對大陸的競賽中，國民黨的「三不」不但不反對付「三通四流」的善策，而且現在連「三不」也守不住了，必須另謀上策，而在政治上實施反燒法（也許這個名稱並不是很恰當的），是可以一試的。

和平統一中國是國共兩黨共同的主張，也是十億中國人中，絕大多數的希望。中國統一之後，不管由那一個黨來執政，都需要一批受過現代教育，有民主法治思想的人來建設國家。毫無疑問的，海峽兩岸的留學生，都是受過

高等教育的社會菁英，他們在受過西方社會的民主、自由和法治洗禮，以及親身體驗過西方社會的科技進步後，加上與自己的社會比較，對中國需要些什麼，應該比別人知道的多一些。中國自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加上以後共產主義思想的傳入中國，在近百年的大變局中，左右中國命運的，留學生佔的分量不可計算。即以台灣海峽兩岸的最高領導人來說，蔣經國是留俄的，李登輝是留美的，鄧小平是法國勤工儉。兩岸下一代的接班人，留學生更比比皆是。預料在今後的中國政治中，留學生的地位只會增加。

國民黨把眼光放大，把這一保險擴大到中國大陸的留學生，有政治上和實質上的雙重大作用。

國民黨現在對大陸的口號是「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是一句很抽象的政治號召。雖然台灣的學生從高中開始就有三民主義的課程，大專入學考試，甚至任何重要的考試如高考、普考，都有三民主義或國父思想等必考科目，但是不妨試試看，隨便找幾個台灣來的留學生問問「如何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看看有幾個能立刻說出具體的作法。

但是把保險的對象擴大到大陸留學生，却是一項極具體的作法。抽象的政治號召需要以

具體的作法落實才會有效，否則徒然被人譏為不切實際。

如果中共讓大陸留學生參加這一保險，即使由台灣負擔一部份費用，台灣有六百二十億美元的外匯儲存，這區區之數的保險費，不會形成對台灣的負擔，但是幾萬大陸留學生和他們的家屬、親友，對台灣的向心力却會增加，這是多少錢都買不來的。

尤其是中共的國家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何東昌，五月份率領了一個代表團到美國來，向各地的留學生講解了國內政局演變，也宣佈了一些新的政策（見中春第五十一期），但是留學生的反應並不好，在中共對留學生採取種種限制之際，台灣如果適時推出這一作法，在政治上會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如果中共不准大陸留學生參加這一保險，所造成的人心向背結果如何，更不必多說了。

萬一中共對留學生說，「你們不必接受台灣的保險，我們自己也可以辦。」這樣也很好，反正都是為了嘉惠下一代的中國青年，由誰來辦都一樣，何況這是由台灣先提出來，迫使中共不得不也加強對留學生的照顧，一反以往只由中共下戰書，台灣不願應戰的情形。

因此，不論中共對這件事如何因應，台灣都是站在絕對主動的地位。

台灣在作這件事的時候，似可盡量減少對大陸留學生的限制，不必要求他們公開譴責中共，也不必要求在口頭上感謝台灣的德政，只要認同民主、自由、法治的炎黃子孫，都是這一計畫的對象。大陸留學生還有家人、親友在大陸，許多人在學成之後非回去不可，爲了他們以後的處境，應該保護他們。

不要怕這筆錢會白花（如果要花的話），人人心裏都有一把秤。共產黨常說的「人民的

眼睛是雪亮的」，用在這件事上也恰當。

大陸留學生也不應坐待台灣的這一保險，應該以台灣照顧留學生的例子，向教育當局提出要求，迫使中共也採取嘉惠下一代青年的辦法。中共十月份就要召開十三大了，大陸留學生應把握這個時機向國內反映，形成壓力。

從這一件事情看來，證明台灣今天在對大陸無論是從事民主競賽或統戰，手上有資本和籌碼的，台灣實在沒有什麼好害怕的。我願在此再舉一個例子，作爲本文的結束。

國民黨已在考慮開放住在台灣的民衆，除了公務員和現役軍人外，都可經由第三地前往大陸探親。甚至還有人提議，退伍老兵要返鄉探親，如有財務困難，應由退休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提供協助，以達成他們的心願。

國民黨新上任的秘書長李煥甚至說，如果有人願意回到大陸定居，他也不反對。

中共會真的歡迎一些沒有生產力的人回去定居嗎？在香港出版的「九十年代」報導，有幾百名在台灣退伍的老兵，不久前返回福州要求定居，並希望能分配房舍，但是大陸現在自己的住屋尚且不夠分配，那有餘力安置他們。「九十年代」還說，中共對台工作小組已訓令各地，對此保持警惕，中共擔心會有太多老兵回大陸定居，便說老兵「返鄉運動」是國民黨的陰謀，並打算對返鄉老兵設若干限制。

中共以前因爲認定國民黨會死抱住三不，所以成天在那裏叫，有少數人回去落葉歸根，也成爲中共對海外的宣傳資料。現在國民黨肯讓這些人回去了，却輪到中共採取關門政策了。國民黨應來個反統戰，要求中共基於人道，接納這些人返鄉定居。國民黨這樣作不但可以堵住中共的嘴，堵住反對黨的嘴，也可收安撫人心之效。

● 巴士飛機旅行團權威 ●



NEW GOLDEN HORSE TOURS INC.

電話：(212) 964-6664

40 BOWERY 2/F N.Y. 10013

華埠包厘街40號二樓（孔子大廈對面北美銀行右隣）

——營業項目——

- | | |
|---------------|------------|
| ①美東加拿大旅行團 | ④歐洲旅行團 |
| ②西岸、南加州旅行團 | ⑤代售國內外廉價機票 |
| ③台灣、香港、東南亞旅行團 | ⑥代訂國內外酒店 |

※最新豪華大巴士 MC-9出租歡迎各社團、學校、教會、衣廠、餐館惠顧。

春風化雨·薪火相承

國府教育改革開始邁出第一步

(台灣研究生·美國) 凌天鳳

近二個月來國府的教育界有股欣欣向榮的氣氛。先是頗孚衆望「勇於嘗試，敢於創新」的原清華大學校長毛高文先生，自李煥手中接下了教育部長的棒子。接着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長改由原交通大學的教務長陳龍英接任。教育部訓委會常委也由政治大學教育系的楊極東教授出任。隨後，台灣大學、師範大學、交通大學、成功大學、輔仁大學等幾所高校，相繼更換了訓導長。這一連串的人事異動，似已意味大學學府在開始着手改革了。

國府的新任教育部長毛高文先生，出身台灣大學，後入美柏克萊大學獲化工碩士，再入卡內基大學攻讀博士，學成後返回台灣，任教於清華大學，後相繼出任工學院院長及校長職務。

他是一位「擇善固執」的典型人物，也是一位較能保持純學術風範的學者。在清華大學校長任內，就已顯露出他有改革的魄力和創新的精神。例如，在清大設有獎勵研究的辦法，不以酬庸或安撫來「分配」獎額，他提倡由學生自己來評鑑，這一辦法是相當正確的。教師授課是否盡責，只有親身受教的學生知之最詳。

評鑑的結果雖不能達到百分之百的正確，但總比動輒由學校組成所謂的幾人評審小組，或其他不夠超然的方式來評鑑較能客觀。連帶的，這一制度對於大學教師致力於研究，多少也起了一種刺激的作用。當然也改進了一些老教授們十年不換講義的弊病。

毛高文先生更能從善如流，在上任的首次記者招待會上，就表示要全面修訂「大學法」，並預定在八月底邀集學者專家及各院校長，共同研討修訂方向。九月初，各大學院校開學後，「大學法」的修訂諮詢小組並將分台灣北、中、南三區，與各大學院校師生面對面座談，主動徵詢意見。這些做法無疑已為「大學法」修訂，帶來了一個好的開始。

國府這幾年政治環境變動相當大，大學的環境也受到了不小的激盪，幾所校園不斷升起求新求變的火焰。學生要求變，教師也要求變。學生提出求變意見，教師往往是幕後的支撐者。要想有效解決這些事，大概只有從「大學法」着手。

國府的「大學法」，是在一九四八年制定的。中間雖曾有過二次重大修正，但是對基本



的制度却沒有變動。根據現行的「大學法」規定，每個大學的發展重點及方向，要由教育部來規劃，在執行上也由教育部核定後才能實施。公立大學的校長由教育部延派，私立大學的校長人選雖然經過各該私立大學董事會通過了，也得報到教育部經過核准才能正式聘用。如此一來，大學的獨立性已被剝奪，大學的獨立性也受到了教育行政部門的嚴重干擾。

另外，在大學內部的行政組織及運作，又全都操在由校長任命的行政主管手裏。教師的聘用也與各系主任有密切關係。因此，大學校內很難實行自治，也很難有民主原則。

立法委員林時機在毛高文提出修訂「大學法」之前，就在立法院對修正「大學法」一事提出了修正草案，同時對這個草案連署的還有其他三十幾位委員。這是自台灣大學李文忠事件以來，大專院校要求「教授治校」、「學術自由」、「學生自治」、「軍訓人員退出校園」等種種風潮以來，對大學的改革所提出的一個比較具體的要求。當然也是立法委員針對大學弊端，不畏繁難，主動發揮專長所提出來的。一個法案。不但打破了立法機關長久以來沒有充當政治上決策領導的詬病，也逐漸使立法委

員們不再坐視一些窒礙難行的法規，而任其造成貽害大學學府的弊端。

這個修正案的提出，是立委們看到近來許多大學的學生，紛紛以修改「大學法」為他們活動的主要訴求，立法委員能審視事實，適時提出修正法案，在內容上當更能切合實際。它的改正重點落實在大學自治，學術自由的理想，貫徹大學內的民主化，給予教師身份合理的保障，軍訓人員職權與角色的單純化等。

毛高文先生是由大學的教師做起，對大學院校內的一些事情，應該知之甚詳。他不但對大學的問題熟悉，似乎對中學問題也有過研究。像中學生們整天埋首書本，在學校和補習班之間打轉，他也很不以為然。二年前他就曾向台灣的大學聯合招生委員會提過建議，取消非選擇題的比例，讓學生們不要專為了應付考試死背選擇題，以導正學生注意思考的學習方式。現在他才上任二個月，對「大學法」的修訂問題，已經列為第一要務，不論是形勢所趨或是出自主動，我們都樂見能踏出教育改革沉疴的第一步。

大學的組織與運作，關係到整個國家民族的文化與學術前途，對國運的興衰自有其決定性的影響。現在台灣已處在一個大變動的時候，政治在變，社會在變，人民的知識水準也在變。如果職司教育的人的心理或法規不能跟着變，一切依舊停留在官僚體系的窠臼裏，長久下去，教育將會萎縮，百年大計的薪火，將無以為計。

在未來修訂的「大學法」，我們希望條文力求明確，對各校不必做過多的限制，使教育更能自由化。因為只有在教育自由的精神下，才能有學術自由、思想自由，才能培育出自由思想的國民。

其次，教師的聘用問題應予合理化。尤其要尊重教員的人格。如要學生尊重教師，除了教師本身要具備教學以及人格風範條件外，校長或系主任，或學校的行政人員也應該尊重教師。不要怕學生與教師打成一片，更不要因為某位教師受學生歡迎，就要給予「特別待遇」。我們也希望聘書不再是校長或系主任的「利手鐮」。請給作育英才的教師們一個合理又能安心的研究環境，讓他們發揮所長，真正樹立師表的典範。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大計。學生在校除了要吸收知識外，也要養成他們獨立思考、明辨是非的能力，這樣才能健全發展學生堅強的人格，不要處處限制他們。最聽從命令的學生，站在學校的立場固然可以減省許多麻煩，但是任人擺佈的學生，將來未必能成才，而雄才善辯的未必就是壞學生。請把眼光放遠，教育的目的應該不是以教育一些任人擺佈的學生為滿足。因此對青年學子們，要尊重他們是校園的一份子，肯定他們也有參與學校事務的權利。加強與他們溝通，開放表達意見管道，將學生的熱情與社會的變動理性地結合在一起，那樣將會給校園帶來更祥和更自由民主的新氣象。至於純屬於學生活動範圍的事，學校只在他們需要協助的時候去協助他們，不必做過多干預，給學生們充分的自治權利。

當台灣的政治結構發生急遽變化後，知識份子對社會及政治的認知也產生了一種使命感。當一些知識份子真正投入政治行列後，為了堅持理想，必定會和原來的政治權力結構起「衝突」。知識份子的一些與革意見，也必定會損害到政治權力既得的利益者，在這個時候，如果知識份子不能秉持自己的理想與信念，在嘗到名與利的滋味後，就會迷失了方向，而放

棄了當初的理想與信念。

在此，我們寄語毛高文先生，請保持你的純學術風範及獨立人格，大刀闊斧去改革國府的教育，我們不希望看到被「同化」或「妥協」的情勢發生，讓教育的就純歸教育。

去年歲末發生在中國大陸的學潮，中共當局干預過度的結果，使得人心惶惶，都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再度來臨。有鑒於此，能不提高警覺嗎？如果台海兩岸是在競爭，誰能贏得勝利，除了政治及軍事等因素外，教育，無疑是一個絕對可以決定的因素。

國府當局，讓我們共同期待新的「大學法」吧！

同心橋

幸福婚姻！

請找 李太太擇友中心 通國台語

“家庭式”富於親切感，負責介紹
到成功為止，會員費\$100

請先來電洽詢或寄簡歷照片電話號碼

李太太擇友中心

婚姻介紹、相親、見面交談
免費供應茶點

良緣

P.O. BOX 78, Bayside, N.Y. 11361 TEL: (718) 229-9369

「民主才是我的終點」

——記郭城在奧市與洛城

●本刊記者●雪映

酷熱襲人，郭城嘴角潰爛

郭城已於七月廿四日安抵奧克拉荷馬市。南方的酷熱未曾動搖郭城為民主、自由而長跑的決心。「我們可以想像他千里迢迢由達拉斯獨步到奧克拉荷馬市時，忍受的不只是身上巨大的汗珠和內心的孤寂所帶來的痛苦，而且郭城的口腔和嘴角都有潰爛的現象，可能是天氣太熱和長期缺乏菓蔬的關係。」在奧市以南六十公里的一個小鎮接待郭城的一位華裔會計師方先生如是說。

翌日郭城應邀至當地華人家與數十位華人座談，並於廿六日參加華人浸信會主日崇拜，參加人數有一百多人。廿六日下午，郭城離開奧市前往克靈頓市。由於克靈頓市中國人極少，郭城僅出席當地的一個小型座談會，參加此會的人數僅十餘人，但却有三名來自台灣的醫師。他們不但分別捐款，且提出他們對於台灣應否獨立的看法，以及害怕大陸獨裁政權的心態。郭城表示：「大陸與台灣有同樣的文化淵源，如果大陸民主了，還是大家在一起好。」在場的人士幾乎一致贊同郭城的看法。

奧州最大報 THE DAILY ARMORETTE 刊登了郭城在該市七十七號公路北行進的一幅巨照，並且以 ACROSS AMERICA WITH

A MESSAGE 為標題，簡短報導了郭城的信念：「我喜歡耶穌基督，」郭城說，「我相信耶穌基督，我不相信毛主席。」

與郭城「空中交談」泣不成聲

郭城於八月九日抵達洛杉磯，受到當地華人熱烈的歡迎。中華會館於洛城唐人街為郭城舉行進城歡迎儀式，儀式進行中，有兩輛摩托車開道，高舉「為民主、自由長跑」的標語，並且有十數位華人團體和宗親會的人士伴跑，場面十分熱鬧感人。郭城在中華會館成立三十六週年紀念大會上發表了演說，說明他長跑的目的和宗旨。當晚在金龍酒家的餐會上，洛城各大報的記者皆應邀出席。

八月十日早上，郭城拜會了蒙特利市市長，獲頒榮譽獎狀和市鑰匙，當天下午和市長進行了愉快的會晤。十日晚間應洛城女獅子會邀請參加週年紀念會，郭城在會中引吭高歌，賓主盡歡。

八月十一日至十三日，郭城和李信接受「中華之聲」電台邀請，分別在「空中交談」和「溫馨時刻」接受訪問，並和觀眾在電話中交談。當談到反右運動時，郭城說，他那時才讀

小學，「由於父親被打成右派，原本在一起玩耍的小朋友一下子都變了。大家唱歌諷刺我父親，我不懂跟着唱，直到被母親打了一個巴掌，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有位女性聽眾聽了郭城的談話後，打電話到「空中交談」，但沒說幾句便已泣不成聲，因為郭城的事使她想到自己的親身遭遇。此外，打電話向郭城表示欽佩和支持的聽眾也很多。

八月十四日，郭城拜會了華裔議員胡紹居，接受款待和訪問。八月十六日由中華會館主席黃振華以中華會館名義邀請郭城參加反奴役大會。到此，郭城在洛城的活動就告一段落。八月十九日郭城離開洛城前往此次長跑的終點——舊金山。但舊金山不是他最後的終點，郭城說：「我願為中國的民主跑遍全球。如果中國民主運動不能得到勝利，有一天我會宣佈絕食跑，一直跑到死！民主才是我的終點。」

郭城的行囊



請大家都來促銷中國之春英文版

中國之春英文版已克服重重困難出版了四期(雙月刊)，獲得了英文讀者的好評。美國權威報紙「紐約時報」專門為中春英文版的出刊發了長篇報導。

中國之春英文版是中國大陸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在海外創辦的第一份英文刊物，目的是向英文讀者介紹當代中國，着重報導官方故意掩蓋的某些事實真像。

中春英文版的發行尚存在問題，亟需諸位中文讀者協助推廣促銷，方法有：

- 一、向你所認識的外國教授、學者、學生、朋友推薦訂閱；
 - 二、向你所在學校的圖書館推薦訂閱；
 - 三、向當地報攤、雜貨店推薦代銷；
 - 四、向所在大學附近的書店推薦代銷。
- 你的幫助，就是對中國民主運動的貢獻。

中國之春英文版編輯部
一九八七年八月

- *Do you know that CHINA SPRING(Chinese edition) reported Hu Yaobang was at risk of losing his post as Party General Secretary as early as 1985?*
- *Do you know that CHINA SPRING was the first to report on the role of Prof. Fang Lizhi in the current democracy movement?*

Now, you can get the same insider informatio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CHINA SPRING digest.

China Spring Digest

SUBSCRIPTION FORM

Name _____

Address _____

City _____

State _____

Zip _____

Subscrip. fee, one yr. 6 issues

Regular : US \$12.00

Students : US \$ 8.00

Contribution of \$150.00 or more entitles you to become permanent subscriber

Overseas Postage: US \$ 8.00/air

US \$ 5.00/sea

Canada Postage: US \$ 3.00/air

Make check payable to: **China Spring Research, Inc.**
P.O. Box 4873
New York 10185, USA

● 迎接中國民聯第三次代表大會 ●

中國民聯總部募捐呼籲書

親愛的僑胞、讀者們：

中國形勢蘊育着巨大的變革。鄧小平死後、甚至在死前，中國形勢將有巨變。中國大陸結束專制制度並向民主政體起步的時機正在逐步成熟。

在社會大變革的時代，亟需一支獨立政治力量的興起。中國民聯就是在這一背景下成立的。成立三年多以來，民聯已在中國大陸和全世界建立了廣泛的組織網絡。在去冬震撼全國的學運中，民聯發揮了一定作用。

再過四個月，民聯將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研討形勢，制訂策略，選舉新的協調機構，提高民運的理論和組織水平。

參加民聯代表大會的很多代表是留學生，旅費仰賴各界捐款協助。為使這次大會順利召開，我們呼籲各界解囊相助。

您的捐款，可獲減稅。支票抬頭請寫：CHINA SPRING。亦歡迎捐款者與我們個別聯絡。

凡捐助者，我們將致以感謝狀，歷史將記錄下您對中國民運的貢獻。

中國民聯總部

一九八七年九月一日

民主 ● 法治 ● 自由 ● 人權 ● 多元

■ 主 辦：中國民主團結聯盟
(CHINESE ALLIANCE FOR DEMOCRACY)

■ 編 輯：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 通訊處：(美洲) P. O. BOX 4873, NEW YORK, N. Y. 10185, USA

(香港) 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 611 號萬隆大廈 1206 室

(日本) 東京都小金井市小金井郵便局46號信箱

(歐洲) ALLIANCE CHINOISE POUR LA DEMOCRATIE

B. P. 169 77315 Marne la Vallée Cedex 2, France

(澳洲) G. P. O. BOX 376F, MELBOURNE (3001) AUSTRALIA

■ 電 話：(美洲) (718) 429-6777 ; (718) 507-6442 《香港》3-7710410

■ 零售價：(美) 2.00 美元 (加) 2.50 加幣 (港) 8.00 港幣

≡ SECOND CLASS ≡
≡ POSTAGE PAID ≡
≡ FLUSHING N. Y. ≡
≡ ISSN 0735-8237 ≡

POSTMASTER: Please send Address Changes to China Spring 67-17 Woodside Ave. Woodside, NY 11377